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呂春盛 先生

漢晉之際名士結構的演變

研究生：趙文義 撰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摘要

受到時人的重視、賞譽，且彼此間相互標榜、品評的名士群體，在東漢末至西晉初的發展歷經了幾度浮沉：東漢末勇於對抗宦官的黨錮名士，在黨錮之禍時遭受嚴重打擊；在曹魏時期引領玄學風潮且欲有所改革的正始名士，則是受挫於與司馬氏的政爭；竹林名士在魏晉之際動盪的政治情勢下，最後分別走向了不同的結局；西晉中朝名士雖歷經顯位，但在政局的混亂與鑑於名士群體自東漢末以來受到種種打擊的情況下，只能以「無為而治」的方式尋求一條安身立命的道路。

漢晉之際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劇烈變動，名士結構在這段時間也呈現出明顯的變化。東漢末的黨錮名士成員出身多元複雜，並不侷限於某一階層；然而到了曹魏時期，名士結構發生改變，正始名士與竹林名士大多由曹魏政權的上層士族或宦官之家的子弟組成，出現了「上層化」的傾向。到了西晉，中朝名士有半數是三代以上仕宦的高門士族，甚至出現了「名士家族」的現象，呈現出名士結構的「貴族化」。而漢晉之際名士結構的這種發展趨勢，也同樣反映在他們所交遊往來的友人圈之中。

漢晉之際名士結構轉變的原因，可由思想與士風的改變、人物品評圈的內縮、九品官法的保障這三個方面做探討。這三個因素並非單獨發生作用，而是動態地交織影響，最後導致名士結構再也難以見到出身低微、貧賤的人物，一步步走向了「貴族化」的趨勢。

關鍵詞：漢晉之際、名士、黨錮、竹林七賢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課題的提出.....	1
第二節 研究史回顧.....	5
第三節 本文「名士」之清單.....	9
第四節 章節安排.....	10
第二章 漢晉之際名士的發展.....	13
第一節 東漢末黨錮名士的活動.....	13
第二節 曹魏名士的沉浮.....	27
第三節 西晉「中朝名士」及其風貌.....	40
第四節 結語.....	48
第三章 漢晉之際的名士結構.....	51
第一節 東漢晚期黨錮名士的複雜性.....	51
第二節 曹魏名士的上層化.....	62
第三節 西晉貴族名士.....	72
第四節 結語.....	79
第四章 漢晉之際名士結構轉變的因素.....	83
第一節 思想與士風的改變.....	83
第二節 人物品評圈的內縮.....	87
第三節 九品官人法的保障.....	92
第四節 結語.....	94

第五章 結論.....97

徵引書目.....101

表次

表 2-1-1 東漢末黨錮名士.....	22
表 2-2-1 曹魏正始名士.....	30
表 2-2-2 曹魏竹林名士.....	37
表 2-3-1 西晉中朝名士.....	42
表 3-1-1 黨錮名士之家世背景.....	52
表 3-1-2 黨錮名士之活動事蹟.....	54
表 3-1-3 黨錮名士的交友圈.....	60
表 3-2-1 曹魏(正始、竹林)名士之家世背景.....	62
表 3-2-2 曹魏名士父祖輩任官經歷.....	65
表 3-2-3 正始名士的交友圈.....	69
表 3-2-4 竹林名士的交友圈.....	70
表 3-3-1 中朝名士之家世背景.....	72
表 3-3-2 中朝名士父祖輩任官經歷.....	73
表 3-3-3 中朝名士的交友圈.....	74

圖次

圖 3-3-1 中朝名士品評關係.....	78
-----------------------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課題的提出

在《世說新語·文學第四》中，載有東晉時袁宏著《名士傳》一事：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箸書。」¹

而其後，蕭梁時的劉孝標注曰：

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²

可見在袁宏的《名士傳》中，乃是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三人為「正始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七人為「竹林名士」；裴楷、樂廣、王衍、庾敳、王承、阮瞻、衛玠、謝鯤八人為「中朝名士」。雖然《世說新語》中提到這是謝安在與眾人提及江北人物事蹟時，「特作狡獪」的結果，亦有學者對「竹林七賢」的稱呼有所懷疑，³但從史料中來看，上述諸名士的確是當時士人中的一時之選，可以視

¹ 劉宋·劉義慶 著，蕭梁·劉孝標 注，余嘉錫 箋疏，周祖謨、余淑儀、周士琦 整理，《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下，〈文學第四〉（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239。

²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下，〈文學第四〉，頁 239。

³ 如陳寅恪認為事先有「七賢」而後有「竹林」。參見陳寅恪 著，萬繩楠 整理，〈清談誤國（附「格義」）〉，《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2 漢晉之際名士結構的演變

為曹魏、西晉時期名士群體的代表人物。如何啟民便認為何晏有倡導正始談風之功，而王弼則為談論奠定理論基礎；西晉元康時期以王衍和樂廣為當世談宗，晉室南遷後則以衛玠最值得注意。⁴這些作為時代佼佼者的名士，大多是以擅長清談玄言為特徵，因此若就袁宏《名士傳》所收錄的人物來看，「名士」這一群體的共同特徵，便是善於「雅詠玄虛」。

5

然而，在《後漢書》中，也有著另一批不同風貌之「名士」存在。《後漢書·黨錮列傳》中稱：

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⁶

據此，則東漢末年第一次黨錮之禍後，「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人也被視為「天下名士」，而這批名士乃是以勇於對抗宦官、抨擊時政著稱，很顯然地與《名士傳》中「發言玄遠」⁷的名士有很大的不同。

關於「名士」一詞，最早可見於戰國晚期的著作中，如《呂氏春秋·季春紀》中便提到季春之月時，天子要「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2007)，頁 43。何啟民則認為「竹林七賢，名屬後起」，是後人將此七人組合在一起。參見何啟民，《竹林七賢研究》（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頁 12。

⁴ 何啟民，《魏晉思想與談風》（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7），頁 84、168、183。

⁵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 43，〈王戎傳附從弟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1236。

⁶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後漢書》，卷 67，〈黨錮列傳序〉（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2187。

⁷ 《晉書》，卷 49，〈阮籍傳〉，頁 1361。

⁸同書在其他篇章中亦有出現「名士」一詞，其意涵均為深具影響力的有名之士。像這樣將「名士」視為「有名之士」的用法，亦出現在《史記》中，因此至西漢時期，此一概念似乎已被普遍接受。到了東漢，由於「士」作為「知識階層」的概念已然確定，⁹因而「名士」一詞在「有名之士」的基礎上，增加了「強調學術、德行優異」的意涵，如東漢高誘為《呂氏春秋》、《淮南子》作注時，便將兩書中的「名士」解釋為「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¹⁰凸顯名士所具備的美好德行。至東漢末，鄭玄、蔡邕在上述名士意涵的基礎上，又增加了「隱居不仕」的界定。如鄭玄認為「名士，不仕者。」；¹¹蔡邕亦提出「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絕、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¹²然而在以往的史料中，並未強調名士「不仕」的一面；甚至在東漢末時，另有一批以方術見長的名士存在。《後漢書·方術列傳》中，作者范曄認為：「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¹³據此，則東漢末的「名士」中，亦有「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事實上，東漢末最著名的名士，便是上面曾提及的黨錮名士諸人，其行動也並非是「隱居不仕」，而是活躍於當時的朝野，力圖打擊宦官勢力。如此看來，時至東漢末，「名士」一詞雖然同樣意謂著「有名之士」，但其個別行為、活動上已出現不同的差異；「名士」這個稱呼在意涵、內容上已有分歧，兩個同樣被稱為名士的人物，其行為事蹟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從史籍中來看，「名士」頻頻出現於《後漢書》、《三國志》、《晉書》

⁸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清·畢沅校正，余翔標點，《呂氏春秋》，卷3，〈季春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44。

⁹ 李清筠，《魏晉名士人格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頁8。

¹⁰ 《呂氏春秋》，卷3，〈季春紀〉高誘注，頁44。

¹¹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卷15，〈月令第六〉收錄於《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303-1。

¹² 《禮記》，卷15，〈月令第六〉孔疏引蔡邕之言，頁303-2。

¹³ 《後漢書》，卷82上，〈方術列傳論〉，頁2724。

4 漢晉之際名士結構的演變

這三個時代連續的史書中，夏曾佑便認為「由三國至唐，名士時代也。」¹⁴可說是漢晉之際相當活躍的一個群體。但從上述的情形來看，可以發現被稱為「名士」的這一群體，自東漢末便有著「不仕者」、「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打擊宦官者」等不同的差異；而到了曹魏，乃至於西晉時期，「名士」則具有「發言玄遠者」之意涵，顯然這中間歷經了很大的轉變。¹⁵因此令筆者不禁好奇，從東漢末到西晉，「名士」這一群體究竟出現了什麼樣的演變？

以往對於「名士」的研究，大多著重在以名士追溯魏晉士族、貴族的源流，或是名士與政權的關係上，¹⁶對於「名士」這一稱呼所代表的成員、身份階層及其轉變卻較少提及，實為可惜。此外，若是僅從「有名之士」這個角度去理解「名士」，則顯得較為片面而不仔細，無法釐清名士在不同時期的活動與特色，僅是一概而論；或有論者引東晉王恭「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¹⁷之言，認為名士不務政事，乃至對於名士往往有「清談誤國」之印象。¹⁸然而王恭所言只能說明東晉時的名士風貌，而不能概括漢晉時期的名

¹⁴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410。

¹⁵ 如孔毅即認為「魏晉名士承襲了東漢名士的某些餘風，卻又與東漢名士風貌迥然有異。」參見孔毅，《魏晉名士》（成都：巴蜀書社，1994），頁2。

¹⁶ 可參見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5-52。（日）渡邊義浩，《三國政權の構造と「名士」》（東京：汲古書院，2004）。劉蓉，《漢魏名士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

¹⁷ 《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上，〈任誕第二十三〉，頁660。李清筠認為王恭所言的這三項事情可視為魏晉名士的人格特質。參見李清筠，《魏晉名士人格研究》，頁138-188。

¹⁸ 由於西晉的滅亡，使東晉儒學之士多批評清談誤國，此後歷代儒士亦多有批判，明末清初的顧炎武便認為西晉是因為清談而「亡天下」。近人則有陳寅恪認為由於西晉執政者不厲世務，崇尚虛無，導致誤國亡國；日本學者岡村繁則認為清談是六朝士人「怯懦與虛榮」的表現。可參見鄭欽仁等編著，〈魏晉南北朝的清談與玄學〉，《魏晉南北朝史》（台北：里仁，2007），頁409-411。萬繩楠整理，〈清談誤國（附「格義」）〉，《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頁50-52。（日）岡村繁著，陸曉光譯，〈六朝貴族文人的怯懦與虛榮——關於「清談」〉，《岡村繁全集·第參卷·漢魏六朝的思想 and 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士群體，如黨錮名士便以勇於針砭時政聞名；在西晉為「一世談宗」的王衍，在擔任元城令時也能做到「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¹⁹因此「名士」一詞事實上意涵著漢晉時期各種層面的士人風貌，不能僅是以「有名之士」的概括性觀點視之。因此，筆者針對漢晉之際被稱做「名士」的人群之演變，試圖提出以下的研究方向：

- 1、探究漢晉之際「名士」群體活動的脈絡。
- 2、漢晉之際的「黨錮名士」、「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等名士群體，在其身份、階層、思想、行為等方面各有何異同？
- 3、若東漢末到西晉時，「名士」的內涵發生了變化，那麼使其變化的原因又有哪些？

筆者希望透過本次研究，能夠釐清漢晉之際「名士」群體變化的脈絡，論述漢晉名士在各個時期所呈現出的不同行動與風貌，並試圖解釋其轉變的原因，還予漢晉名士群體較真實的面貌，為漢晉之際士人活動的相關研究提供一些微薄的淺見。以下先回顧以往學界在這方面的一些研究。²⁰

第二節 研究史回顧

自袁宏著《名士傳》後，其對於魏晉名士所提出的「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之分類，已成為後世探討魏晉名士或相關研究時

2002)，頁 396-411。

¹⁹ 《晉書》，卷 43，〈王戎傳附從弟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1236。

²⁰ 此處之研究史回顧為避免過於龐雜，只限於討論與本文主題相關性較高之研究，至於本文各章所涉及的其他相關研究，另見於各章內容。

6 漢晉之際名士結構的演變

的基本參考資料，²¹因此學界在研究魏晉名士時，大多以袁宏《名士傳》的分類為基礎，或直接沿用，或加以擴展，如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即直稱何晏、王弼、夏侯玄三人為「正始名士」，阮籍、嵇康等人為「竹林名士」；²²孔毅在探討魏晉名士事蹟時，便以袁宏之分類法作為其著作區分章節時的標準。²³湯一介、孔繁、高晨陽、周滿江、吳全蘭、康中乾等人在探討魏晉時期的玄學思想時，亦是以此分類去分別論述各時期的名士思潮。²⁴李修建則在論述魏晉名士之生活美學時，將之分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西晉名士及東晉名士，此外還認為正始名士應包含親曹派與親司馬派；西晉名士則應包含二十四友、四友、八達。²⁵

一般來說，由於魏晉名士與當時的玄學、清談風潮密不可分，因此學者們在研究魏晉玄學思想時，除了上述以《名士傳》為基礎的分類法外，亦有以玄學思想內容之不同為基準，提出自身一套的魏晉名士分期，如錢穆認為「魏晉之際，玄學再興，言其派別，大率可分三宗。一

²¹ 張蓓蓓，〈袁宏新論〉，《臺大中文學報》，14，2001，頁79。收錄於氏著，《魏晉學術人物新研》（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頁155-229。

²²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魯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523-553。本文原為魯迅於1927年7月23日、26日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之演講稿。

²³ 孔毅，《魏晉名士》，目錄頁。

²⁴ 上述幾位學者的分類方式稍有不同。分別參閱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37。湯氏將魏晉名士分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元康名士、東晉名士。孔繁，《魏晉玄談》（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頁1-7。孔氏將魏晉名士分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西晉（中朝）名士。高晨陽，〈論魏晉玄學派系之別與階段之分〉，《山東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頁1-5。高氏將魏晉名士分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元康名士。周滿江、吳全蘭，〈崇尚自然、關注現實：玄談的發展與曹魏興亡〉，《玄思風流——清談名流與魏晉興亡》（濟南：濟南出版社，2002），頁69、99-165。周氏與吳氏將魏晉名士分為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王衍與樂廣。康中乾，《魏晉玄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48。康氏將魏晉名士分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西晉名士、東晉名士。

²⁵ 李修建，《風尚——魏晉名士的生活美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頁46-49。

曰王何，二曰阮嵇，三曰向郭。」²⁶錢穆於正始名士中提出王弼、何晏，排除夏侯玄；於竹林名士中提出阮籍、嵇康，排除山濤等人；不提中朝名士，而另外提出原屬竹林名士的向秀及郭象。其他與錢穆相似，以思潮發展作為魏晉名士分類基準的學者，還有湯用彤、蕭筆父、李錦全、方立天、馮友蘭、許抗生等人。²⁷上述諸位學者乃是著眼於對魏晉玄學發展具有影響力的重要人物而論，其判別標準多半是依據重要理論或著作的有無，但卻忽略了當時在士人群體中真正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如「不修敬而人自敬」²⁸的夏侯玄、「器重朝望」²⁹的山濤、「聲名藉甚，傾動當世」³⁰的王衍等人，因此較為遺憾且不完整，難以全面性地觀察魏晉時期名士群體的動態與發展。

除了上述將問題意識著眼於魏晉時期名士或玄學發展並將其區分類型的研究外，亦有將視野擴展至東漢末，對東漢末名士做出分類者。如王葆玟將東漢末名士分為方術名士與黨人名士；³¹賀昌群則依據《後漢書》中〈黨錮列傳〉、〈方術列傳〉、〈逸民列傳〉之人物類型的不同，

²⁶ 錢穆，〈記魏晉玄學三宗〉，原著於1945年，後收錄於氏著，《莊老通辨·下卷》（台北：東大圖書，1991），頁345。

²⁷ 上述幾位學者的分類方式又略有不同。分別參閱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131。湯氏將魏晉名士分為正始名士、元康名士、永嘉名士、東晉名士，忽視了竹林名士的影響力。蕭筆父、李錦全，《中國哲學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368-371。蕭氏、李氏將魏晉名士分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裴頠與樂廣、郭象。方立天，〈玄學的範圍、主題和分期〉，《文史哲》，1985年第4期，頁41-42。方氏將魏晉名士分為何晏與王弼、嵇康與阮籍、裴頠與郭象。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40-42。馮氏將魏晉名士分為正始名士、中朝名士（崇有）、中朝名士（獨化），竹林名士被包含於正始名士之中，而中朝名士則有裴頠的「崇有論」與郭象的「獨化論」之區別。許抗生，《魏晉思想史》（台北：桂冠，1992），頁27-29。許氏將魏晉名士分為何晏與王弼及夏侯玄、嵇康與阮籍、向秀與郭象，與錢穆的觀點相似。

²⁸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上〉，頁373。

²⁹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下，〈政事第三〉，頁146。

³⁰ 《晉書》，卷43，〈王戎傳附從弟衍傳〉，頁1236。

³¹ 王葆玟，《正始玄學》（濟南：齊魯書社，1987），頁35-68。

將東漢末名士分為黨錮名士、虛名名士、高蹈名士。³²

在漢晉名士發展之相關研究方面，唐長孺、黃偉修、安部聰一郎著眼於魏晉士族源流的溯源；³³何啟民、余英時、王曉毅等人留意到了當時士人思想風氣的演變；³⁴渡邊義浩、劉蓉則是從漢晉士人的政治立場切入，探討其集團的形成與立場的轉變。³⁵除了上述的政治、思想層面外，馬以謹從「名」的內涵、³⁶李修建從美學風尚³⁷等不同角度亦探討了東漢末至魏晉時期的名士發展，其中黃偉修提出了名士發展走向「狹化」的觀點；劉蓉的研究直指黨錮名士與曹魏名士的傳承、聯繫；李修建點出了東漢末名士與魏晉名士在內涵上的差異，對於筆者著眼於漢晉之際名士群體發展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啟發與幫助。但黃氏大多著力於敘述名士在先秦至魏晉時期的發展情況，對於其「狹化」觀點並沒有進一步的說明及論證，李氏亦並未論及名士差異的轉變，只是說明現象，甚為可惜。

此外，由於筆者在討論名士群體時，亦會將其交友圈納入一併討論，而在名士的交友方面，近期有張瑀琳的〈遊與友：漢晉名士交往行

³² 賀昌群，〈英雄與名士〉，《魏晉清談思想初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 92-98。

³³ 分別參閱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 25-52。黃偉修，〈「名士」——魏晉以前歷史上一個特殊知識階層之發展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5）。（日）安部聰一郎，〈清流・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中國史學》，14，2004；同氏，〈黨錮の「名士」再考〉，《史學雜誌》，111-10，2002。

³⁴ 分別參閱何啟民，〈魏晉思想與談風〉，頁 18-45、173-175。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1980），頁 205-327；同氏，〈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329-372。王曉毅，〈正始名士雙重人格特點及其形成〉，《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 年第 4 期，頁 20-25。

³⁵ 分別參閱（日）渡邊義浩，〈「名士」層の形成〉，《三國政權の構造と「名士」》，頁 71-85。劉蓉，〈漢魏名士研究〉，頁 44-51、54-112、130-188。

³⁶ 馬以謹，〈漢末至南朝間「名」之內涵和標準的移轉及其與士風之關係〉，《中國中古史研究》，6，2006，頁 23-44。

³⁷ 李修建，〈風尚——魏晉名士的生活美學〉，頁 16-19、25-31。

動探究)，論述了漢晉名士的交友觀念。張氏主要是針對漢晉名士對於交友的理念、觀念作深入研究，企圖理解漢晉名士在交友時考量與想法。³⁸由於張氏此文主要著重於思想性的部分，因此對於漢晉士人實際的交友網絡並沒有深入探討，無法解決筆者所欲探討的問題，實屬遺憾。

上述諸研究對名士的分期、分類可說是莫衷一是，眾說紛紜；雖然討論了名士在各時期的發展情況，但對於「名士」一詞皆是籠統且概括性的認識，並未指出「名士」在各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與意涵，對於名士發展變化的討論也多著重於思想，而忽略了其他的層面。因此，對於漢晉之際名士的發展及轉變，確實還有值得深入研究之處。

第三節 本文「名士」之清單

本文的名士清單來源，主要是《後漢書·黨錮列傳》中受到標榜的「天下名士」三十五人，以及袁宏《名士傳》中的「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三個群體共十八人。詳細的名士清單如下：

- 1、黨錮名士：《後漢書·黨錮列傳》中的「三君」：竇武、劉淑、陳蕃；「八俊」：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八顧」：郭泰、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八及」：張儉、岑晷、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廚」：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三十五人。
- 2、正始名士：《名士傳》中的何晏、王弼、夏侯玄三人。
- 3、竹林名士：《名士傳》中的嵇康、阮籍、山濤、劉伶、王戎、向秀、阮咸七人。
- 4、中朝名士：《名士傳》中的裴楷、樂廣、王衍、庾敳、王承、阮

³⁸ 張瑀琳，〈遊與友：漢晉名士交往行動探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8）。

瞻、衛玠、謝鯤八人。

本文的採樣清單除了上述名士外，亦會將與各時期名士交遊往來的士人納入考量，如同樣被列於〈黨錮列傳〉中的賈彪、何顥；與夏侯玄親善的陳本；與嵇康、向秀往來的呂安；與樂廣友好的楊準、楊髦等人，以求瞭解當時名士群體的整體面貌。雖然王葆玟、賀昌群二位學者認為〈方術列傳〉、〈逸民列傳〉中的人物亦可視為東漢末名士，³⁹但誠如川勝義雄、唐長孺、王曉毅、劉蓉等諸位前輩學者的研究所言，⁴⁰東漢末的黨錮名士與魏晉時期的名士有著許多方面的傳承與聯繫，因此本文在探討漢晉之際的名士群體發展時，在東漢末名士方面乃是以黨錮名士做為主體；然而事實上隱逸名士與黨錮名士多有聯繫，黨錮名士亦有終身不仕者，因此在探討黨錮名士活動時，若有涉及隱逸名士時，亦會將其納入一併討論。唯漢末方術名士雖有「名士」之稱，但與往後的魏晉名士較無傳承上的關係，因此本文並不將其納入討論的範疇中。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文除了第一章的緒論、末章的結論外，正文共有三章。

在第二章「漢晉之際名士的發展」中，欲討論從東漢末至西晉初被稱為「名士」之群體成員的活動，並從中瞭解名士在漢晉之際動盪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中之發展。漢晉名士在這段期間幾經浮沈，雖然受到時人的注目而享譽天下，然而同時也引來了殺身之禍。在本章的討論中，可

³⁹ 參見王葆玟，《正始玄學》，頁 35-68。賀昌群，〈英雄與名士〉《魏晉清談思想初論》，頁 92-98。

⁴⁰ 參見（日）川勝義雄 著，徐谷芄、李濟滄 譯，〈貴族政治的成立〉，《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3-17。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 25-52。王曉毅，〈正始名士雙重人格特點及其形成〉，《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 年第 4 期，頁 20-25。劉蓉《漢魏名士研究》，頁 27-53、54-58。

以發現漢晉時期的名士群體並非口吐玄言、不問政事的一群人，而是以其實際的作為，去因應著漢晉之際劇烈的政治與社會變動。

在第三章「漢晉之際的名士結構」裡，則從名士的出身結構中深入探討漢晉名士，試圖分析從東漢末到西晉初的名士群體之結構所出現的變化。隨著漢晉之際戰爭的頻繁、環境的變動，名士群體的結構也出現了很大的轉變；而這樣的轉變，也呼應了當時士族社會的發展。

第四章「漢晉之際名士結構轉變的因素」乃是對第三章的進一步探討，企圖從思想風氣、人物品評、國家制度三個方面，嘗試尋找漢晉之際名士群體結構轉變的原因。事實上，漢晉名士結構的轉變絕非單一原因所造成，而是因應著當時政治、社會環境的劇烈變動所形成的結果。

第二章 漢晉之際名士的發展

第一節 東漢末黨錮名士的活動

(一) 宦官勢力的興起

章和二年(88年)，東漢和帝幼弱即位，外戚竇憲兄弟專權於朝廷，使皇帝無法與朝臣接觸，進而總攬朝政。和帝遂聯合身邊最親近的宦官鄭眾等人打擊竇憲兄弟，成功取回政權，從此東漢朝廷便陷入了外戚專權與皇帝結合宦官打擊外戚的循環漩渦之中。事實上，做為幫助皇帝取回權力的協助者，史家對於東漢中期的宦官是給予正面肯定的。《後漢書·宦者列傳序》便認為「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¹然而，隨著皇帝與宦官關係的日益緊密，宦官所獲得的權力愈來愈大，其私欲亦不斷擴大，宦官地位的發展，最後成為了東漢帝國衰亡的病灶。

延熹二年(159年)，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小黃門史左悺、唐衡協助漢桓帝誅殺有「跋扈將軍」之稱的梁冀，功成後五人同日封侯，深受漢桓帝信任，並且握有大權，《後漢書》便言道「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²不久，單超病逝，其餘四人不僅在朝中握有權力，甚至安排兄弟、姻親在地方擔任官員，插手地方政務，時人稱之「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³意謂左悺有回天之力，具瑗驕貴獨坐無偶，徐璜有如臥虎，唐衡個性反覆不定，四人權勢窮極一時。馬良懷認為，東漢桓、靈時期的宦官發展與以往相較，出現了三項特點：1、干預察舉；2、親屬多參與政事；3、在爭奪權力的關鍵時刻，宦官集團具有使用武力逼迫制詔或自擬詔書的能力。⁴其中前兩項發展直接阻礙了東漢

¹ 《後漢書》，卷 78，〈宦者列傳序〉，頁 2510。

² 《後漢書》，卷 78，〈宦者·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傳〉，頁 2520。

³ 《後漢書》，卷 78，〈宦者·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傳〉，頁 2521。

⁴ 馬良懷，〈兩漢宦官考〉，《士人 皇帝 宦官》（長沙：岳麓書社，2003），頁 211-212。

末士大夫的仕途，引起朝野士人的不滿，「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⁵至此，朝堂官員與太學生對宦官的怨懟不斷累積，雙方衝突一觸即發，獲得輿論支持的中央或地方官員紛紛挺身與宦官勢力對抗，最後的結果便是爆發了第一次黨錮之禍。

（二）第一次黨錮之禍與黨錮名士的形成

延熹九年（166年），擅長占術的張成認為近期會有大赦，於是教子殺人，當時擔任河南尹的李膺馬上收捕張成之子。然而不久之後，殺人的張成之子竟獲得赦免，李膺在不滿的情緒之下憤而處死張成之子。由於張成與宦官有所往來，其占術亦頗受漢桓帝信賴，於是張成弟子牢脩上書誣告李膺等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⁶桓帝因此大為震怒，下令收捕李膺等人，牽連者達兩百餘人；永康元年（167年），尚書霍譚、城門校尉竇武上表為李膺等人請命，桓帝雖赦免其罪，但剝奪了黨人的入仕機會，將之禁錮終身，即為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後，當時的士人與太學生在對朝廷失望之餘，開始推崇他們心目中的優秀人物。《後漢書·黨錮列傳》言：

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⁷

如此意謂著東漢末士人、太學生在知名全國的「天下名士」中，選出了「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三十五人做為他們景仰的對象。「三君」，指的是竇武、劉淑、陳蕃三人；「八俊」，指的是李膺、

⁵ 《後漢書》，卷 54，〈楊震傳附子楊秉傳〉，頁 1772。

⁶ 《後漢書》，卷 67，〈黨錮列傳序〉，頁 2187。

⁷ 《後漢書》，卷 67，〈黨錮列傳序〉，頁 2187。

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八人；「八顧」，指的是郭泰、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八人；「八及」，指的是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八廚」，指的是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八人。關於這三十五人在第一次黨錮之禍前後時的活動事蹟，在此據《後漢書》分別簡述如下：

- (1) 竇武（？～168）。扶風平陵人，長女為桓帝皇后。年少時以經行著稱，教授弟子於大澤之中。竇武個性清廉，曾將朝廷賞賜散與太學生及貧民，甚得輿論支持。第一次黨錮之禍期間，竇武曾上疏諫桓帝，桓帝遂使眾黨人回歸鄉里，但禁錮不得為官。⁸
- (2) 劉淑（？～168）。河間樂成人，宗室之後。以對策天下第一拜任議郎，後歷任侍中、虎賁中郎將。曾上疏認為「宜罷宦官」，漢桓帝雖不用其議，亦不怪罪劉淑。⁹
- (3) 陳蕃（？～168）。汝南平輿人，三代仕宦。孝廉出身，曾多次向漢桓帝陳述時弊，桓帝雖賞識其意見，但往往不接納。第一次黨錮之禍時，陳蕃雖未被捕入獄，仍力諫桓帝。桓帝不滿陳蕃之言，假託陳蕃所辟召者為不適任的黨錮人士，將之策免。¹⁰
- (4) 李膺（110～169）。潁川襄城人，三代仕宦。個性簡亢，不輕易與人結交。孝廉出身，於擔任司隸校尉期間處死宦官張讓之弟張朔，因此與張讓結怨。李膺雖受漢桓帝詰問，但仍正色以對，得到桓帝敬重。李膺聲名日高，士人若被其接見，謂之「登龍門」。第一次黨錮之禍時被捕下獄，但其供詞中的同黨亦有宦官子弟，因此宦官請桓帝大赦，李膺得以免歸鄉里。¹¹

⁸ 《後漢書》，卷 69，〈竇武傳〉，頁 2239-2240。

⁹ 《後漢書》，卷 67，〈黨錮·劉淑傳〉，頁 2190。

¹⁰ 《後漢書》，卷 66，〈陳蕃傳〉，頁 2159-2167。

¹¹ 《後漢書》，卷 67，〈黨錮·李膺傳〉，頁 2191-2195。

- (5) 荀翌(?~170)。潁川潁陰人，兩代仕宦。曾任沛相，其弟荀曇為廣陵太守，兄弟二人「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宦」，對於宦官的支黨賓客，即使是極小的罪惡亦誅殺之。¹²
- (6) 杜密(?~169)。潁川陽城人。擔任地方首長期間，若宦官子弟為地方令、長而有姦惡事蹟者，輒捕案之。於第一次黨錮之禍時遭免官，回到本郡。與李膺並稱「李杜」。¹³
- (7) 王暢(?~169)。山陽高平人，兩代仕宦。家世豪右，舉孝廉而不就。以為政嚴明著稱，但坐事免官。後因太尉陳蕃之薦，復為尚書。不久轉任南陽太守，頗有政績。¹⁴
- (8) 劉祐(?~?)。中山安國人，宗室之後。孝廉出身，當時河東屬縣令多為宦官子弟，魚肉百姓，劉祐到任後「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後來因沒收宦官蘇康、管霸之田而惹怒漢桓帝，遷輸左校。大赦後復歷三卿，屢次以病辭。後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跡。¹⁵
- (9) 魏朗(?~169)。會稽上虞人。少為縣吏，為兄報仇而殺人後亡命出逃。後來跟從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入太學學習五經，受到李膺等人的景仰。魏朗在擔任彭城令時上奏宦官子弟在地方行非法之事，引起宦官不滿，於是被外派擔任九真都尉，之後歷任尚書、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復任尚書，於第一次黨錮之禍時免官歸家。¹⁶
- (10) 趙典(?~?)。蜀郡成都人，兩代仕宦。三為侍中，常將自己的俸祿施予貧民。後被漢桓帝任命為國師，但未拜即病卒。¹⁷

¹² 《後漢書》，卷 62，〈荀淑傳附兄子翌傳〉，頁 2050。

¹³ 《後漢書》，卷 67，〈黨錮·杜密傳〉，頁 2197-2198。

¹⁴ 《後漢書》，卷 56，〈王龔傳附子暢傳〉，頁 1823。

¹⁵ 《後漢書》，卷 67，〈黨錮·劉祐傳〉，頁 2199-2200。

¹⁶ 《後漢書》，卷 67，〈黨錮·魏朗傳〉，頁 2200-2201。

¹⁷ 此處據《華陽國志》載。《後漢書》言黨錮名士趙典「名見而已」(《後漢書》，卷 67，〈黨錮列傳序〉，頁 2190。)，但《後漢書》卷 27 中卻有〈趙典傳〉，則東漢似有兩個趙典。《華陽國志》中亦有一趙典，「與潁川李膺等並號八俊」，應是黨錮名士趙典。(《華陽國志》，卷 10 上，〈先賢士女總讚〉，頁 133。)然而，《華陽國志》

- (11) 朱寓(?~169)。沛人。第一次黨錮時為尚書，被捕入獄。後得釋。¹⁸
- (12) 郭泰(128~169)。太原界休人。家世貧賤，早孤。與李膺交好，名震京師，司徒黃瓊、太常趙典辟舉之，皆不就。郭泰雖擅長人物鑑識，但不涉及時政，因此即使朝中宦官擅政，仍不能傷害郭泰。第一次黨錮之禍時，士人多被牽連，唯獨郭泰與同郡的袁閎得以倖免。於是郭泰閉門教授學問，弟子數千人。¹⁹
- (13) 宗慈(?~?)。南陽安眾人。孝廉出身，公府徵辟之皆不就。後為脩武令，但宗慈不滿當時太守出於權貴，多取賄賂，棄官而去。又徵拜議郎，未到官而病卒。²⁰
- (14) 巴肅(?~169)。勃海高城人。孝廉出身，歷任慎令、貝丘長，但皆因不認同郡守而辭官。²¹
- (15) 夏馥(?~?)。陳留圉人。與同縣之富人高氏、蔡氏不合，受到此兩氏豪族仇視；而夏馥雖「不交時宦」，但其聲名卻受到宦官忌憚。²²
- (16) 范滂(137~169)。汝南征羌人。孝廉出身，任官皆與長官不合而去。回鄉後被汝南太守宗資命為功曹，委任政事。范滂嫉惡如仇，曾拒絕宦官唐衡的請託，但行事專斷，引起同僚不滿，稱其所用之人為「范黨」。第一次黨錮之禍時被捕下獄，獲釋後回到家鄉。²³

與《後漢書·趙典傳》中的趙典雖字號、籍貫相同，但親屬關係、事蹟略有出入。由於《後漢書》言黨錮名士趙典「名見而已」，〈趙典傳〉中亦未提與黨人之關連或黨錮事件，故筆者此處趙典之事蹟，依據直指「與潁川李膺等並號八俊」的《華陽國志》。參見晉·常璩撰，嚴茜子點校，《華陽國志》，卷10上，〈先賢士女總讚〉，收錄於《二十五別史》(濟南：齊魯書社，2000)，頁133。

¹⁸ 《後漢書》，卷69，〈竇武傳〉，頁2240。

¹⁹ 《後漢書》，卷68，〈郭太傳〉，頁2225-2226。

²⁰ 《後漢書》，卷67，〈黨錮·宗慈傳〉，頁2202-2203。

²¹ 《後漢書》，卷67，〈黨錮·巴肅傳〉，頁2203。

²² 《後漢書》，卷67，〈黨錮·夏馥傳〉，頁2201-2202。

²³ 《後漢書》，卷67，〈黨錮·范滂傳〉，頁2203-2206。

- (17) 尹勳 (?~168)。河南鞏人，家族世代仕宦。孝廉出身，三遷邯鄲令，五遷尚書令，因協助漢桓帝誅梁冀而封侯。後遷汝南太守，於第一次黨錮之禍時上書請求解除禁錮。²⁴
- (18) 蔡衍 (121~168)。汝南項人。孝廉出身，以裁決公正知名於鄉里。擔任冀州刺史時，不接受宦官具瑗要求讓其弟具恭舉茂才的請託；又彈劾宦官曹騰之弟河間相曹鼎貪贓千萬，遂與宦官勢力不合。徵拜議郎後，蔡衍還拒絕與外戚梁冀相見，遭到梁冀嫉恨。後來因上表拯救與宦官勢力對抗的成瑨，而遭到連坐免官。²⁵
- (19) 羊陟 (?~?)。泰山梁父人，家族世代仕宦。孝廉出身，曾上奏要求罷黜與宦官有姻親、賄賂來往的官員，然而不被接納。後轉任河南尹，「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於第一次黨錮之禍時遭免官禁錮，卒於家中。²⁶
- (20) 張儉 (115~198)。山陽高平人，兩代仕宦。受山陽太守翟超邀請而擔任東部督郵時，打擊宦官侯覽在山陽郡的勢力，並上表請求處死侯覽之母，因而與侯覽結仇。²⁷
- (21) 岑晷 (?~?)。南陽棘陽人，兩代仕宦。父親岑豫曾為南郡太守，但因貪叨而被誅死，故岑晷年少時被視為「非良家子」。後來受到宗慈的賞識入太學受業，並被南陽太守成瑨任命為功曹，處死與宦官有金錢來往的當地富豪張汎。張汎之妻透過宦官侯覽控告此事，引起漢桓帝震怒，逮捕成瑨並下獄處死，岑晷則亡匿於齊、魯之間。²⁸
- (22) 劉表 (142~208)。山陽高平人，宗室之後。《後漢書》、《三國志》之〈劉表傳〉中皆未提到劉表在第一次黨錮前後時的相關事蹟。²⁹

²⁴ 《後漢書》，卷 67，〈黨錮·尹勳傳〉，頁 2208。

²⁵ 《後漢書》，卷 67，〈黨錮·蔡衍傳〉，頁 2208-2209。

²⁶ 《後漢書》，卷 67，〈黨錮·羊陟傳〉，頁 2209。

²⁷ 《後漢書》，卷 67，〈黨錮·張儉傳〉，頁 2210。

²⁸ 《後漢書》，卷 67，〈黨錮·岑晷傳〉，頁 2212。

²⁹ 《後漢書》，卷 74 下，〈劉表傳〉，頁 2419。晉·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三

- (23) 陳翔（？～？）。汝南邵陵人，兩代仕宦。孝廉出身，年少知名，善於結交賓客。擔任揚州刺史期間彈劾宦官徐璜之弟吳郡太守徐參利用職位貪污，從此威名大振。於第一次黨錮之禍時被捕下獄，但因查無罪證而釋放，卒於家中。³⁰
- (24) 孔昱（？～？）。魯國魯人，孔子之後，家族世代仕宦。孔昱不應大將軍梁冀的徵辟，亦不應太尉府的察舉，但於第一次黨錮之禍時仍遭到禁錮。³¹
- (25) 苑康（？～？）。勃海重合人。年少於太學受業，孝廉出身，為政嚴峻。當時張儉於山陽殺宦官侯覽之母，侯覽之宗黨賓客逃至泰山者，苑康皆殺之，因此與侯覽結怨。侯覽遂誣告苑康，使之流徙日南。後因潁陰人及羊陟為苑康辯解，使苑康得以回其本郡，卒於家中。³²
- (26) 檀敷（？～？）。山陽瑕丘人。年少家貧，不受鄉里施惠。孝廉出身，公府徵辟皆不就，於鄉里立精舍教授學生。³³
- (27) 翟超（？～169）。出身郡縣不詳。於擔任山陽太守期間沒收宦官侯覽財產，因而遭受髡刑，輸作左校。³⁴
- (28) 度尚（？～166）。山陽湖陸人。年少家貧，因不修學行而不被鄉里推舉。後為宦官侯覽視田，得以擔任郡上計吏，歷任上虞長、文安令，為政嚴峻。延熹五年（162年），長沙、零陵賊人作亂，冀州刺史朱穆推舉度尚擔任荊州刺史平亂，數有戰功。然而，度尚復任荊州刺史時誣陷交阯刺史張磐放任賊人入荊州，導致張磐下獄。張磐於獄中證明自身清白，度尚因此受罪，因功得原。後為遼東太守，於延熹九年（166年）卒於任上。³⁵

《國志》，卷6，〈劉表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210。

³⁰ 《後漢書》，卷67，〈黨錮·陳翔傳〉，頁2213。

³¹ 《後漢書》，卷67，〈黨錮·孔昱傳〉，頁2213。

³² 《後漢書》，卷67，〈黨錮·苑康傳〉，頁2214。

³³ 《後漢書》，卷67，〈黨錮·檀敷傳〉，頁2215。

³⁴ 《後漢書》，卷66，〈陳蕃傳〉，頁2164。

³⁵ 《後漢書》，卷38，〈度尚傳〉，頁1284-1287。

- (29) 張邈(?~195)。東平壽張人。年少時以任俠聞名，經常賑濟士人，受到眾人愛戴。後受公府辟召，遷陳留太守。³⁶
- (30) 王考(?~?)。東平壽張人。曾任冀州刺史，《後漢書·黨錮列傳序》言其「位行不顯」。³⁷
- (31) 劉儒(?~168)。東郡陽平人。孝廉出身，三遷侍中。於漢桓帝時上疏十條諫議時政，但桓帝不能接納。³⁸
- (32) 胡母班(?~190)。泰山人。個性輕財赴義，以時常賑濟人士聞名。³⁹
- (33) 秦周(?~?)。陳留平丘人。曾任北海相，《後漢書·黨錮列傳序》言其「位行不顯」。⁴⁰
- (34) 蕃嚮(?~?)。魯國人。曾任郎中，《後漢書·黨錮列傳序》言其「位行不顯」。⁴¹
- (35) 王章(?~?)。東萊曲城人。曾任少府卿，《後漢書·黨錮列傳序》言其「位行不顯」。⁴²

從上述黨錮名士三十五人之事蹟來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許多人物與宦官有直接或間接的衝突、對抗，在中央者如(1)竇武、(2)劉淑、(3)陳蕃、(8)劉祐、(19)羊陟；在地方者則有(4)李膺、(5)荀翬、(6)杜密、(9)魏朗、(16)范滂、(18)蔡衍、(20)張儉、(21)岑晷、(23)陳翔、(25)苑康、(27)翟超，共有十六人，約佔46%；若扣除位行不顯的王考等四人，則黨錮名士中與宦官關係不佳者，約有52%。由此可見，獲得輿論標榜而獲得「三君」、「八俊」等稱號的天下名士，大半與宦官有直接或間接的衝突。因此，筆者認為，這些「天下名士」獲得標榜的衡量標準，主要是依據與宦官衝突的有無。至於「黨

³⁶ 《後漢書》，卷，〈呂布傳附張邈傳〉，頁2446。《三國志》，卷7，〈呂布傳附張邈傳〉，頁221。

³⁷ 《後漢書》，卷67，〈黨錮列傳序〉，頁2190。

³⁸ 《後漢書》，卷67，〈黨錮·劉儒傳〉，頁2215。

³⁹ 《後漢書》，卷74上，〈袁紹傳〉注引〈漢末名士錄〉，頁2376。《三國志》，卷6，〈袁紹傳〉注引〈漢末名士錄〉，頁192-193。

⁴⁰ 《後漢書》，卷67，〈黨錮列傳序〉，頁2190。

⁴¹ 《後漢書》，卷67，〈黨錮列傳序〉，頁2190。

⁴² 《後漢書》，卷67，〈黨錮列傳序〉，頁2190。

錮名士」三十五人的組成結構，容待下章再做詳細說明。其次，在上述與宦官關係不佳的十六人中，汝南郡出身者有（3）陳蕃、（16）范滂、（18）蔡衍、（23）陳翔；潁川郡出身者則有（4）李膺、（5）荀翌、（6）杜密，共有將近半數的七人。因此，似乎可以認為，汝南、潁川地區出身的名士應是反宦官之黨錮名士的核心人物。

漢桓帝時，宦官既見寵於皇帝，則黨錮名士與宦官的衝突，也隱含著名士們與皇權之間的緊張關係，從劉祐、岑晷因打擊宦官而惹怒漢桓帝的例子中便可見一斑。事實上，身為黨錮名士核心的汝南士人，其與東漢皇權的緊張關係乃是其來有自。學者劉蓉便指出，汝南士人在光武帝建武十五年（39年）時的歐陽歙事件中便與光武帝交惡，給予光武帝「汝南人易形成朋黨」的印象，甚至在不滿侍中汝南人戴憑的諫議時，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⁴³可見汝南士人在光武帝眼中有著不見容於皇權的一面，而這種緊張關係從光武帝起就一直延續至漢末。⁴⁴胡寶國也認為在歐陽歙事件後，汝南士風走向了「放縱不羈，敢為犯上」，⁴⁵與皇權產生了衝突性。至於潁川郡，其士風本身即有「高仕宦，好文法」，熱衷於政治活動的一面，又因地理位置與汝南相近，兩地士人來往關係密切、相互影響，逐漸形成士風相近的文化圈；汝南、潁川一帶甚至進一步成為東漢末至魏晉時期的學術、政治中心。⁴⁶汝南、潁川兩地的士人作為對抗宦官的核心群體而活躍於東漢晚期的政壇，第一次黨錮之禍的爆發，便是起因於潁川人李膺的嫉惡如仇；而在第二次黨錮之禍時，則可以看到大將軍竇武與汝南人陳蕃致力於翦除宦官的身影。

⁴³ 《後漢書》，卷 79 上，〈戴憑傳〉，頁 2553。

⁴⁴ 劉蓉，《漢魏名士研究》，頁 44-48。

⁴⁵ 胡寶國，〈漢晉之際的汝潁名士〉，《歷史研究》，1991 年第 5 期，頁 130。

⁴⁶ 黃宛峰認為除了汝南、潁川二郡外，南陽郡亦是當時的核心地區之一；胡寶國在後來的文章中亦有相近的觀點。筆者整理的反宦官十六人中的（21）岑晷為南陽人，亦可印證二氏的看法。參見胡寶國，〈漢晉之際的汝潁名士〉，《歷史研究》，1991 年第 5 期，頁 127-139。黃宛峰，〈東漢潁川、汝南、南陽士人與黨議始末〉，《中國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頁 128-137。胡寶國，〈漢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214-229。本文原為胡氏在日本大阪所舉行的「日本古代史研究會」之演講稿。

表 2-1-1 東漢末黨錮名士

序	姓名	籍貫	名士稱號	桓、靈時最高官職	原典/卷
1	竇武	扶風平陵	三君	大將軍	《後漢書》69
2	劉淑	河間樂成	三君	侍中	《後漢書》67
3	陳蕃	汝南平輿	三君	太尉	《後漢書》66
4	李膺	潁川襄城	八俊	長樂少府	《後漢書》67
5	荀翌	潁川潁陰	八俊	沛相	《後漢書》62
6	杜密	潁川陽城	八俊	太僕	《後漢書》67
7	王暢	山陽高平	八俊	司空	《後漢書》56
8	劉祐	中山安國	八俊	河南尹	《後漢書》67
9	魏朗	會稽上虞	八俊	河內太守	《後漢書》67
10	趙典	蜀郡成都	八俊	侍中	《華陽國志》10 《後漢書》67
11	朱寓	沛	八俊	司隸校尉	《後漢書》69
12	郭泰	太原界休	八顧	不仕	《後漢書》68
13	宗慈	南陽安眾	八顧	不仕	《後漢書》67
14	巴肅	勃海高城	八顧	潁川太守	《後漢書》67
15	夏馥	陳留圉	八顧	不仕	《後漢書》67
16	范滂	汝南征羌	八顧	太尉掾	《後漢書》67
17	尹勳	河南鞏	八顧	尚書令	《後漢書》67 《後漢書》69
18	蔡衍	汝南項	八顧	冀州刺史	《後漢書》67
19	羊陟	泰山梁父	八顧	河南尹	《後漢書》67
20	張儉	山陽高平	八及	山陽郡東部督郵	《後漢書》67
21	岑暄	南陽棘陽	八及	南陽郡功曹	《後漢書》67
22	劉表	山陽高平	八及	大將軍掾	《後漢書》74
23	陳翔	汝南邵陵	八及	揚州刺史	《後漢書》67
24	孔昱	魯國魯	八及	議郎	《後漢書》67
25	苑康	勃海重合	八及	泰山太守	《後漢書》67

26	檀敷	山陽瑕丘	八及	議郎	《後漢書》67
27	翟超	不詳	八及	山陽太守	《後漢書》66
28	度尚	山陽湖陸	八廚	遼東太守	《後漢書》38
29	張邈	東平壽張	八廚	陳留太守	《後漢書》75 《三國志》7
30	王考	東平壽張	八廚	冀州刺史	《後漢書》67
31	劉儒	東郡陽平	八廚	任城相	《後漢書》67
32	胡母班	泰山奉高	八廚	侍御史	《三國志》6
33	秦周	陳留平丘	八廚	北海相	《後漢書》67
34	蕃嚮	魯國	八廚	郎中	《後漢書》67
35	王章	東萊曲城	八廚	少府卿	《後漢書》67

(三) 第二次黨錮之禍與黨錮名士的敗亡

建寧元年（168年），年幼的漢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聽政，並以外戚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輔佐朝政，東漢朝廷似乎呈現出一番新氣象。兩人除了在第一次黨錮期間皆曾上書為黨人請願外，竇武「常有誅翦宦官之意」、⁴⁷陳蕃「志誅中官」，⁴⁸又同為輿論所稱道的「三君」，可說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因此兩人輔政後先以同為黨錮名士的尹勳為尚書令，並重新起用李膺、杜密、朱寓等人，將之召入中央為官，東漢朝廷儼然成為名士大展身手的舞台。

眾名士雖一心改革朝中弊政，但宦官王甫、曹節等仍能透過竇太后干涉朝政。竇武、陳蕃雖曾向竇太后建議罷去宦官，但竇太后念在曹節等人擁立靈帝有功，猶豫不決。於是，竇、陳兩人遂合議除去宦官。然而此事卻不慎洩漏，同年（168年）九月，宦官朱瑀、曹節等人立即發動政變，欲誅竇武、陳蕃。當時陳蕃年逾七十，仍率領太傅府諸生八十餘人衝入承明門，然終究寡不敵眾，被擒下獄，當日即遇害。竇武則入

⁴⁷ 《後漢書》，卷69，〈竇武傳〉，頁2241。

⁴⁸ 《後漢書》，卷66，〈陳蕃傳〉，頁2169。

步兵營欲起兵與宦官對抗，不料曹節等人矯詔讓剛回到洛陽，不知朝中局勢的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兵包圍竇武，竇武見大勢已去，遂自殺。竇武的宗親、賓客、姻親等皆被誅殺，陳蕃的家屬遭流徙，宗族、門生、故吏則遭到斥免、禁錮。此外，當時在朝中任官，且與竇、陳二人志同道合的黨錮名士亦受牽連，如（以下編號為前列黨錮名士號序）：

- （2）劉淑。侍中。被宦官指稱與竇武通謀，下獄自殺。⁴⁹
- （4）李膺。長樂少府。竇武、陳蕃事敗後，被廢。⁵⁰
- （8）劉祐。河南尹。竇武、陳蕃事敗後被罷黜歸家，卒於家中。⁵¹
- （14）巴肅。議郎。與竇武、陳蕃共謀誅宦官，遭禁錮歸鄉。⁵²
- （17）尹勳。尚書令。因竇武之事遭到連坐，下獄自殺。⁵³
- （31）劉儒。議郎。與竇武連坐，下獄自殺。⁵⁴

至此，黨錮名士在東漢朝廷中的勢力幾乎被一掃而空，不是遭坐事下獄就是被罷黜免官；宦官的聲勢在此時可說是達到顛峰，並且在不久後以「鉤黨」為名趁勝追擊，企圖一舉收捕黨錮名士及其親友賓客。

建寧二年（169年），家在山陽郡的宦官侯覽因母喪還家，並為此蓋了奢華的墳塚。郡督郵張儉上奏舉發侯覽之「貪侈奢縱」，⁵⁵雙方衝突一觸即發。事實上，張儉自延熹八年（165年）赴任以來，不斷向朝廷舉發、彈劾侯覽之母及其賓客的罪狀，但都被侯覽私自按下，雙方關係一直十分惡劣。就在此時，與侯覽有來往的山陽人朱並向朝廷上書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互相標榜結黨，意圖危害社稷，靈帝遂下令逮捕張儉。同年（169年）十月，侯覽、曹節趁勢以「鉤黨」之名，⁵⁶要求收捕其餘黨錮名士，大興大獄。在此時受到牽連之黨錮名士如下（以下編號為前列黨錮名士號序）：

⁴⁹ 《後漢書》，卷 67，〈黨錮·劉淑傳〉，頁 2190。

⁵⁰ 《後漢書》，卷 67，〈黨錮·李膺傳〉，頁 2196。

⁵¹ 《後漢書》，卷 67，〈黨錮·劉祐傳〉，頁 2200。

⁵² 《後漢書》，卷 67，〈黨錮·巴肅傳〉，頁 2203。

⁵³ 《後漢書》，卷 67，〈黨錮·尹勳傳〉，頁 2208。

⁵⁴ 《後漢書》，卷 67，〈黨錮·劉儒傳〉，頁 2215。

⁵⁵ 《後漢書》，卷 78，〈宦者·侯覽傳〉，頁 2523。

⁵⁶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卷 56，〈漢紀·靈帝建寧二年〉（北平：古籍出版社，1956），頁 1819。

- (4) 李膺。於朝廷收捕「鉤黨」時自行赴獄，遭拷問致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皆被禁錮。⁵⁷
- (5) 荀翌。與竇武共謀誅宦官，與李膺一同被殺。其弟荀曇遭禁錮終身。⁵⁸
- (6) 杜密。以「鉤黨」被朝廷徵召，自殺。⁵⁹
- (9) 魏朗。以「鉤黨」被朝廷徵召，行至途中自殺。⁶⁰
- (11) 朱寓。時為司隸校尉，遭指稱為「鉤黨」，收捕下獄處死。⁶¹
- (14) 巴肅。本禁錮在家，曹節得知巴肅與竇武、陳蕃共謀後欲收捕之。巴肅自行前往縣令處受縛，於是被害。⁶²
- (15) 夏馥。雖不交時宦，但聲名遭到宦官忌憚，與范滂、張儉一起被誣陷為「鉤黨」，遭到通緝。夏馥剪去鬚鬚，變更容貌，逃入林慮山中，隱姓埋名。在黨禁解除前即卒。⁶³
- (16) 范滂。收捕「鉤黨」時自行至縣令處受縛，下獄被害。⁶⁴
- (20) 張儉。遭收捕時逃亡，流轉各地，友人李篤將張儉送出塞外，使之得免。然而張儉所經之處遭重罪誅殺者以十數，宗親亦大多受牽連，郡縣為之殘破。⁶⁵
- (21) 岑晷。本藏匿於齊、魯之間，得知李膺、杜密死後再次逃竄，卒於江夏的山林之中。⁶⁶
- (22) 劉表。在朝廷下詔收捕黨人時，因逃亡而得以倖免於難。⁶⁷
- (27) 翟超。時為山陽太守，遭指稱為「鉤黨」，收捕下獄處死。⁶⁸

⁵⁷ 《後漢書》，卷 67，〈黨錮·李膺傳〉，頁 2197。

⁵⁸ 《後漢書》，卷 62，〈荀淑傳附兄子翌傳〉，頁 2050。

⁵⁹ 《後漢書》，卷 67，〈黨錮·杜密傳〉，頁 2198。

⁶⁰ 《後漢書》，卷 67，〈黨錮·魏朗傳〉，頁 2201。

⁶¹ 《後漢書》，卷 8，〈靈帝紀·建寧二年〉，頁 330。同書，卷 67，〈黨錮列傳序〉，頁 2188。

⁶² 《後漢書》，卷 67，〈黨錮·巴肅傳〉，頁 2203。

⁶³ 《後漢書》，卷 67，〈黨錮·夏馥傳〉，頁 2202。

⁶⁴ 《後漢書》，卷 67，〈黨錮·范滂傳〉，頁 2207。

⁶⁵ 《後漢書》，卷 67，〈黨錮·張儉傳〉，頁 2210。

⁶⁶ 《後漢書》，卷 67，〈黨錮·岑晷傳〉，頁 2213。

⁶⁷ 《後漢書》，卷 74 下，〈劉表傳〉，頁 2419。

⁶⁸ 《後漢書》，卷 8，〈靈帝紀·建寧二年〉，頁 330。同書，卷 67，〈黨錮列傳序〉，

除上述諸名士外，因「鉤黨」之名而被捕的百餘人皆死獄中，妻子遭徙邊，附從者則是五服之內的親屬⁶⁹皆被禁錮，牽連甚廣。

在第一次黨錮之禍時，諸名士或下獄、或禁錮在家，未曾見誅，尚能保有其性命。但在第二次黨錮之禍時，自竇武、陳蕃以下，李膺等十五位名士或逃竄、或自殺、或誅死，曹節、侯覽等宦官可說是對諸名士趕盡殺絕，意圖使黨錮名士群體再也無法翻身。甚至連不參與時政，始終以處士自居的郭泰，在聽聞竇武、陳蕃死訊後亦傷心痛哭，最後與遭收捕的諸名士相同，於建寧二年（169年）去世。至此，活躍於東漢晚期的黨錮名士可謂死絕，難以再與權勢如日中天的宦官抗衡。東漢朝廷對黨錮名士親屬宗族的禁錮直至光和二年（179年）才得以解除；至於遭羅織入罪成鉤黨者，則是要到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賊起事後，由於靈帝懼怕黨人勢力與黃巾勢力結合，因而聽從宦官呂彊的建議，大赦黨人，流徙者皆能回歸故郡。東漢桓、靈二帝時期歷經近二十年的黨錮之禍，到此時才終究告一段落。

從靈帝末年的黃巾之亂起，歷經董卓專政、軍閥割據，東漢王朝的氣息也逐漸衰落，奄奄一息。因局勢動盪而輾轉流離的士人或隱居不出，或投靠各大小軍閥，大多已無心事漢；甚至是自漢安帝以來一門四世五公的袁紹，在割據河北後也有了取代東漢王朝的想法。⁷⁰東漢獻帝時期（189~219年）的「知名之士」已非桓、靈時期的「天下名士」，而是縮小至地方性質的「荊州名士」、⁷¹「揚州名士」、⁷²「沔南名士」等，⁷³規模大不如前；在經過兩次黨錮之禍的打擊後，士人們互相標榜、

頁 2188。

⁶⁹ 即「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服。

⁷⁰ 《三國志·袁紹傳》注引《典略》：「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參見《三國志》，卷 6，〈袁紹傳〉注引《典略》，頁 194。

⁷¹ 見於《三國志》，卷 1，〈武帝紀〉，頁 30。

⁷² 見於《三國志》，卷 14，〈劉曄傳〉注引《傳子》，頁 444。

⁷³ 見於《三國志》，卷 35，〈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頁 928。此外，學界亦有將汝潁士人如荀彧、陳群等稱為「汝潁名士」，如胡寶國，〈漢晉之際的汝潁名士〉，《歷史研究》，1991 年第 5 期，頁 127-139。劉蓉，《漢魏名士研究》，頁 76-92、106-112。事實上，根據《三國志·郭嘉傳》載曹操之言乃是「汝、潁固多奇士」，因此，汝潁士人應以「奇士」稱之較為妥當。

排行的情況也幾乎不再出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到了東漢獻帝時期，與黨錮名士相似，具有群體性質且受到世人注目的名士團體已然消失，僅剩下以個別、零星姿態活躍於歷史舞台上的「知名之士」了。

第二節 曹魏名士的沈浮

（一）標榜風氣的再現與浮華案

東漢晚期，黨錮名士自第一次黨錮後受到輿論標榜，並獲得如「三君」、「八俊」等稱號。然而在發生第二次黨錮後，黨錮名士群體受到嚴厲的打擊，其成員幾乎死絕；其後東漢朝廷面臨黃巾起事、軍閥割據等社會動盪，大多數的士人已無心事漢，或輾轉流離、或委身於各大小軍閥之中，其中雖有少數在地方名聲顯著的「知名之士」如韓嵩、劉曄等，但在東漢末的漢獻帝在位時期，如同桓、靈之際時互相標榜、擁有稱號的名士群體則已不復見。

士人群體之間互相標榜、給予稱號的現象，一直要到曹魏明帝時（227~239年）才又再次出現。《三國志·諸葛誕傳》注引《世語》載：

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⁷⁴

又《三國志·曹真傳附子爽傳》注引《魏略》載：

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⁷⁵

⁷⁴ 《三國志》，卷28，〈諸葛誕傳〉注引《世語》，頁769。

⁷⁵ 《三國志》，卷9，〈曹真傳附子爽傳〉注引《魏略》，頁290。

作為「當世俊士」的夏侯玄、諸葛誕、李勝等人，共相題表，彷彿是在模仿東漢晚期黨錮名士的情況，提出了「四聰」（四窗）、「八達」、「三豫」的稱號；其下場，也如同黨錮名士一樣，受到朝廷的打壓、禁錮，一般被稱為「浮華案」。關於「浮華」之意，周一良認為「所謂浮華，非指生活上之浮華奢靡，而是從政治著眼，以才能互相標榜，結為朋黨，標舉名號如『四窗』、『八達』之類以自誇。」⁷⁶如此便與黨錮名士「共造部黨，自相褒舉」⁷⁷的情形相似，彷彿是東漢晚期士林輿論「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⁷⁸的延續。

關於此事件，史籍上對於這時候標榜風氣所參與的人物、時間皆不夠明確；人數方面，十五人之數明確者僅得七人，而時間也僅能得知是發生在魏明帝時期。學界在關於夏侯玄、諸葛誕諸人因浮華遭免官一事的研究上，歷來說法眾多，楊晏州在其碩士論文〈曹魏政權的結構及其滅亡原因研究〉中便整理出分別發生在太和四年（230年）、太和六年（232年）、青龍年間（233-236年）三種說法。楊氏在其文中贊同柳春新的看法，認為青龍年間最為可能，且進一步指出應在青龍三年至四年間（235-236年）。至於參與人員，除了史有名載的六人外，楊晏州亦另外考證出何晏以及從諸史料中可以間接推測的司馬師。⁷⁹如此一來，在魏明帝年間受到禁錮免官的浮華士人，可考者便有夏侯玄、諸葛誕、鄧颺、劉熙、孫密、衛烈、李勝、何晏、司馬師九人。由於史籍失載，在曹魏年間互相標榜稱號的浮華士人團體，在其「浮華」活動方面並沒有留下太多的紀錄，因而無法在此詳細說明他們當時的活動情況。然而從諸位浮華士人「共相題表」的行為來看，不禁令人想起昔日黨錮名士群體的盛況；而其結果也如同黨錮名士一般，受到皇帝的排斥，遭到廢錮。不同的是，黨錮名士在兩次黨錮之禍後或下獄自殺，或逃亡流竄，下場十分淒慘；但這批浮華士人並沒有因浮華案而喪失生命，反而是靜待時

⁷⁶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35。

⁷⁷ 《後漢書》，卷67，〈黨錮·范滂傳〉，頁2205。

⁷⁸ 《後漢書》，卷67，〈黨錮列傳序〉，頁2187。

⁷⁹ 參見柳春新，〈青龍浮華案析論〉，《漢末晉初之際政治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6），頁139-141。楊晏州，〈曹魏政權的結構及其滅亡原因研究〉（台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頁52-58。

機，等候機會重回曹魏的政治舞台。

（二）引領潮流的正始名士

景初三年（239年）正月，魏明帝曹叡病篤，乃立十七歲的齊王曹芳為皇太子，並以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懿輔政。當日，曹叡病逝，曹芳即皇帝位，隔年（240年）改元正始。先前因浮華案遭廢錮的士人，在正始時期再度進入曹魏朝廷，並且受到重用。《三國志·曹真傳附子爽傳》載：

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⁸⁰

《三國志·夏侯尚附子玄傳》載：

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⁸¹

《三國志·諸葛誕傳》載：

正始初，玄等並在職。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⁸²

事實上，丁謐、畢軌二人於魏明帝時並未遭到抑黜，已有楊耀坤、柳春

⁸⁰ 《三國志》，卷9，〈曹真傳附子爽傳〉，頁283。

⁸¹ 《三國志》，卷9，〈夏侯尚附子玄傳〉，頁295。

⁸² 《三國志》，卷28，〈諸葛誕傳〉，頁769。

新兩位前輩學者做出考證；⁸³而何晏、鄧颺、李勝、夏侯玄、諸葛誕則的確是在先前浮華案時受到禁錮的士人，在此時又獲得進用，再度浮出曹魏的政治檯面。上述諸人中的夏侯玄、何晏，再加上王弼，此三人被東晉袁宏視為風貌堪稱當時之表率的「正始名士」，列於其筆下網羅魏晉名士的《名士傳》之首。夏侯、何、王三人在正始時期的活動事蹟大致如下：

- (1) 夏侯玄 (209~254)。字太初，沛國譙人。於正始年間以散騎常侍起家。後轉任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與大將軍曹爽發動征蜀的駱谷之役，但以失敗告終。⁸⁴
- (2) 何晏 (?~249)。字平叔，南陽人。於正始年間擔任吏部尚書。何晏主典選舉，所用之人皆十分適任，時人傅咸讚曰：「內外之眾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⁸⁵
- (3) 王弼 (226~249)。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受何晏賞識，於正始中擔任臺郎。王弼喜好遊宴，擅長音律、投壺，但常以自身所擅長的事物取笑他人，因此被當時的士人所詬病。⁸⁶

表 2-2-1 曹魏正始名士

序	姓名	籍貫	正始時官職	原典/卷
1	夏侯玄	沛國譙	中護軍	《三國志》9
2	何晏	南陽宛	吏部尚書	《三國志》9
3	王弼	山陽	尚書郎	《三國志》28

從上述事蹟來看，此三人在正始時期的活動不盡相同，那麼為何袁宏會

⁸³ 參見楊耀坤，〈有關司馬懿政變的幾個問題〉，《四川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柳春新，〈青龍浮華案析論〉，《漢末晉初之際政治研究》，頁141-143。

⁸⁴ 《三國志》，卷9，〈夏侯尚附子玄傳〉，頁295-298。

⁸⁵ 《三國志》，卷9，〈曹真傳附何晏傳〉注引魚豢《魏略》，頁292。《晉書》，卷47，〈傅玄附子咸傳〉，頁1328。《魏略》雖言何晏「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但同書又載「(鄧)颺為人好貨，……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因此何晏選人之失乃是鄧颺之責，時人傅咸之語應為實情。鄧颺事參見《三國志》，卷9，〈曹真傳附子爽傳〉注引魚豢《魏略》，頁288。

⁸⁶ 《三國志》，卷28，〈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頁795。

將他們目為名士，置於其《名士傳》之首呢？原因在於夏侯玄、何晏、王弼三人與昔日的黨錮名士一樣，於曹魏時期受到時人的注目與讚譽，在學術成就上也開啟了新的學風，乃是日後玄學思潮的先行者。

時人對三位正始名士之風貌的讚譽極多，在此列舉如下：

(1) 夏侯玄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⁸⁷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廟，朗朗但見禮樂器。」⁸⁸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⁸⁹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⁹⁰

夏侯玄於《名士傳》中身居正始名士之首，友人何晏認為他思想深刻、長於分析，能「通天下之志」；⁹¹同時，夏侯玄亦受到後輩裴楷的景仰，認為其氣度、風範令人不禁肅然起敬，彷彿身處於朝堂或宗廟中。此外，其風貌姿態與出身車工的毛曾相比，更是有如「玉樹」般光彩奪目。張蓓蓓認為，「可以深信夏侯玄在當時必定見許為第一流的名士，甚至尚非何晏所能及。」⁹²也無怪乎袁宏會將夏侯玄置於正始名士，甚至於是魏晉名士的第一位。

(2) 何晏

⁸⁷ 《三國志》，卷9，〈曹真傳附何晏傳〉注引孫盛《魏氏春秋》，頁292。

⁸⁸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上〉，頁373。

⁸⁹ 《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上，〈容止第十四〉，頁527。

⁹⁰ 《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上，〈容止第十四〉，頁527。

⁹¹ 孔繁，《魏晉玄談》，頁33。

⁹² 張蓓蓓，〈夏侯玄學行考實〉，《魏晉學術人物新研》，頁73。原發表於《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3）。

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⁹³

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⁹⁴

曹爽常大集名德，長幼莫不預會。及欲論道，曹羲乃歎曰：「妙哉，平叔之論道，盡其理矣！」既而清京雅論，辨難紛紜，不覺諸生在坐。⁹⁵

由此來看，何晏可以說是正始時期流行風氣的領航者。在服藥方面，何晏自稱「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覺神明開朗。」⁹⁶而五石散即寒食散，在漢代時已有之，但服用者不多。然而在何晏服用且獲得神效後，五石散盛行於世，在魏晉南北朝的士人之間甚至形成一股服藥風氣；⁹⁷而何晏的口才及其對玄學思想的提倡亦成為當時之潮流。學者何啟民便認為，「由於他（何晏）的倡導，談風大盛，魏京師洛陽隱然成為談風的中心。」⁹⁸因此，何晏無論在服藥行為，或是言談思想上，都是曹魏正始年間時人爭相追隨、模仿的對象。

（3）王弼

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尋亦為傳嘏所知。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

⁹³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上，〈言語第二〉注引秦承祖《寒食散論》，頁 66。

⁹⁴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下，〈文學第四〉注引荀勗《文章敘錄》，頁 171。

⁹⁵ 唐·虞世南 著，清·孔廣陶 校注，《北堂書鈔》，卷 98，〈談講十三〉注引佚名《何晏別傳》（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頁 54。

⁹⁶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上，〈言語第二〉，頁 66。

⁹⁷ 參見余嘉錫，〈寒食散考〉，《余嘉錫文史論集》（長沙：岳麓書社，1997），頁 166-209。

⁹⁸ 何啟民，《魏晉思想與談風》，頁 95。

為高識所惜如此。⁹⁹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¹⁰⁰

裴徽、傅嘏皆為當時玄學、清談圈的知名人物，而王弼以年輕後輩之姿，卻能得到裴徽、傅嘏的青睞，實屬難得。而前述以「神況諸己」的何晏亦大力讚揚王弼，認為可以跟他談論「天人之際」之事；對於王弼的病卒，司馬師甚至嗟歎數日，為王弼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從這些曹魏名人對王弼的讚賞來看，王弼確實是受到時人注目的焦點。

從上述的情形來看，夏侯玄、何晏、王弼三人在正始時期時，無論是在風範與思想上都受到時人的讚許與景仰，堪稱一時之楷模。而三人的著作如夏侯玄的《本玄論》、何晏的《道論》與《無名論》、王弼的《老子注》和《周易注》提出且確立了正始玄學體系中「以無為本」的原則，其中王弼的《周易注》更是將「無」的原則貫徹到具體事例中，完成了具體到抽象又由抽象到具體的統一，最後建構起正始玄學的理論系統。¹⁰¹在政事方面，有學者認為夏侯玄僅是「貴戚名士」、「有位望，有權欲，而無其才」，乃是空有虛名而沒有實才的皇族貴戚。¹⁰²然而事實上，正始名士三人中除了王弼「事功雅非所長」外，¹⁰³夏侯玄、何晏身居朝廷高位，亦能用心在職務上，不愧其職。如夏侯玄為中護軍時，「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為後式。」¹⁰⁴、何晏擔任吏部尚書掌管官員選任時，「內外之眾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¹⁰⁵關於何晏的典選，何啟民更指出「由於他（何晏）

⁹⁹ 《三國志》，卷 28，〈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頁 795-796。

¹⁰⁰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下，〈文學第四〉，頁 171。

¹⁰¹ 康中乾，《魏晉玄學》，頁 61、76-81、86。

¹⁰²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台北：學生書局，1978），頁 72。

¹⁰³ 《三國志》，卷 28，〈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頁 795。

¹⁰⁴ 《三國志》，卷 9，〈夏侯尚附子玄傳〉，頁 295。

¹⁰⁵ 《晉書》，卷 47，〈傅玄附子咸傳〉，頁 1328。

的招納接引，正始一朝人才極盛，像阮籍、山濤、嵇康皆於這時始入仕。」¹⁰⁶因此，正始名士夏侯玄、何晏、王弼三人不僅在風範氣度上受人景仰、在學術思想上開一世之宗，在朝廷政事方面亦是可圈可點，值得後人仿效，的確堪稱當時士人之楷模。

以「正始」為名的正始名士，隨著曹魏正始年號的改換，名盛一時的何晏、王弼等人也逐漸走向凋零。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司馬懿趁曹爽跟隨皇帝前往高平陵時發動政變，收捕曹爽、曹羲、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人，並夷其三族。同年（249年）四月，改元嘉平，正始時期正式宣告結束。關於此次政變的各項相關問題，歷來有不少學者做出研究考據，筆者在此便不多做說明。¹⁰⁷正始名士之一的何晏，便是在此次政爭中遭到司馬懿的迫害而身逝；嘉平元年（249年）秋天，王弼則因染上疫疾而過世。在正始年號改換的這一年，何晏、王弼相繼離開人世，正始名士僅存夏侯玄一人。由於夏侯氏與司馬氏有著姻親關係，¹⁰⁸被司馬懿以「通家年少」看待，¹⁰⁹因此在正始末年的政爭中免於一死，但仍被調離握有一方兵權的征西將軍一職，改任較為閒散的大鴻臚、太常。夏侯玄回到洛陽後，「不交人事，不蓄華妍」，¹¹⁰行事十分低調。然而，夏侯玄始終躲不過司馬氏的迫害。嘉平六年（254年），在司馬懿死後接掌其權位而成為大將軍的司馬師以夏侯玄、李豐等人涉嫌謀反，將之收捕下獄。作為夏侯玄之「名敵」¹¹¹的司馬師，並沒有因為兩人昔日在浮華案的交情以及姻親關係而手下留情，反而痛下殺手，將夏侯玄等人處以夷三族之刑，親屬亦被遠徙邊地。臨刑前的夏侯玄，「顏色不變，舉動自若」，¹¹²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仍舊保有其令人肅然起

¹⁰⁶ 何啟民，《魏晉思想與談風》，頁 77。

¹⁰⁷ 此議題相關著作甚多，可參見萬繩楠，〈曹魏政治派別的分野及其升降〉，《歷史教學》，1964 年第 1 期。劉顯叔，〈論魏末政爭中的黨派分際〉，《史學彙刊》，9，1978，頁 17-46。盧建榮，〈魏晉之際的變法派及其敵對者〉，《食貨》，10：7，1980，頁 7-28。柳春新，《漢末晉初之際政治研究》。

¹⁰⁸ 夏侯玄之妹夏侯徽為司馬懿之子司馬師的妻子。

¹⁰⁹ 《三國志》，卷 9，〈夏侯尚附子玄傳〉注引孫盛《魏氏春秋》，頁 302。

¹¹⁰ 《三國志》，卷 9，〈夏侯尚附子玄傳〉注引魚豢《魏略》，頁 302。

¹¹¹ 王曉毅，〈正始名士夏侯玄〉，《孔孟月刊》，34：4（總 400），1995，頁 31。

¹¹² 《三國志》，卷 9，〈夏侯尚附子玄傳〉，頁 299。

敬的名士風範。夏侯玄、何晏、王弼三人雖皆死於非命，但其人格風範及學術思潮仍然受到後人的景仰與崇拜；¹¹³「粲然可觀」的正始時期，終究成為了後世名士群體間難以忘懷的輝煌時代。

（三）竹林名士的抉擇

在嘉平元年（249年）的高平陵事件之後，曹魏政權被司馬懿父子所把持，甚至隨意廢立皇帝。嘉平六年（254年），大將軍司馬師廢曹芳，立曹髦；甘露五年（260年），相國司馬昭之部屬成濟殺曹髦，立曹奂。短短十年左右的時間，曹魏歷經三任皇帝，政治局勢處於動盪不安的情況。袁宏筆下的「竹林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七人，雖然有少數人物如阮籍、嵇康、山濤已於正始年間出仕曹魏政權，但竹林名士真正受到世人重視、發光發熱的時期，正是如此不穩定的多事之秋。

關於「竹林名士」或「竹林七賢」，已有許多前輩學者對此七人群體做出討論，如陳寅恪、¹¹⁴何啟民、¹¹⁵王曉毅¹¹⁶等人對於「竹林七賢」的名稱及組成皆有細緻的研究。其實，無論「竹林」之有無，或是「七賢」之名是否是後人所加，竹林名士作為一個名士群體，在魏晉之交時確實互有往來，¹¹⁷並且為時人所注目，無礙於他們身為漢晉名士之一的身份。此七人在魏晉之際的活動大致如下：

- （1）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好《老》、《莊》，嗜酒能嘯，善彈琴。曹爽輔政時被召為參軍，同樣以疾辭官。於司馬懿掌政時為太傅府從事中郎，司馬師時為大司馬從事

¹¹³ 王曉毅指出，「夏侯玄死後，其聲望與日俱增，以至成為兩晉南朝時期士大夫的精神偶像。……從西晉的和嶠到東晉的庾亮，都將其視為終生效法的楷模。」參見王曉毅，〈正始名士夏侯玄〉，《孔孟月刊》，34：4（總400），1995，頁31。

¹¹⁴ 萬繩楠 整理，〈清談誤國（附「格義」）〉，《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頁43。

¹¹⁵ 何啟民，《竹林七賢研究》，頁4-15。

¹¹⁶ 王曉毅，《儒釋道與魏晉玄學形成》（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179-180。

¹¹⁷ 如何啟民雖主張「竹林七賢，名屬後起」，但亦認為「七賢生時固有所交往遇合也」。參見何啟民，《竹林七賢研究》，頁12。

中郎，後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又因步兵廚營人善釀酒，自求為步兵校尉。因魏晉之際時局動盪，故阮籍雖不拘禮教，但發言玄遠不涉時事，亦不臧否人物，以求自保。卒於曹魏景元四年（263年）。¹¹⁸

- (2) 嵇康（223～263）。字叔夜，譙國銍人。¹¹⁹好《老》、《莊》，其妻為沛王曹林之女，拜中散大夫。常諷議時政，引起當時掌權者司馬昭的不滿，後遭鍾會誣陷，於曹魏景元（260～263年）中被誅。¹²⁰
- (3) 山濤（205～283）。字巨源，河內懷人。好《老》、《莊》，被辟為河南從事，因感受到曹爽與司馬懿的政爭而去職，司馬師掌政時再度出仕。山濤深受司馬昭信任，在司馬昭西征鍾會時坐鎮於鄴。山濤曾三度任職吏部尚書，選舉皆得其人。後於太康四年（283年）過世。¹²¹
- (4)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好《老》、《莊》，曾為《莊子》作注。於嵇康被殺後，入洛陽為官。後為散騎侍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卒於任上。¹²²
- (5)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曾為建威參軍，在泰始（265～274年）初年的對策中提倡「無為之化」，不受重用。後以壽終。¹²³
- (6) 阮咸（？～？）。字仲容，阮籍之侄。善彈琵琶。曾任散騎侍郎，山濤曾推薦阮咸掌典選之職，但晉武帝不用。後出為始平太守，以壽終。¹²⁴

¹¹⁸ 《晉書》，卷49，〈阮籍傳〉，頁1359-1361。

¹¹⁹ 《晉書·嵇康傳》載：「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然何啟民認為奚姓乃譙國大姓，而嵇姓則為賤姓，故詭稱其先為奚姓，事實上嵇康之先世仍為嵇姓。參見何啟民，《竹林七賢研究》，頁60-65。

¹²⁰ 《晉書》，卷49，〈嵇康傳〉，頁1369-1374。

¹²¹ 《晉書》，卷43，〈山濤傳〉，頁1223-1227。

¹²² 《晉書》，卷49，〈向秀傳〉，頁1374-1375。

¹²³ 《晉書》，卷49，〈劉伶傳〉，頁1375-1377。

¹²⁴ 《晉書》，卷49，〈阮籍傳附兄子咸傳〉，頁1362-1363。

(7) 王戎(234~305)。字濬沖，¹²⁵琅邪臨沂人。曾參與伐吳之役，後被徵為侍中，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¹²⁶

表 2-2-2 曹魏竹林名士

序	姓名	籍貫	曹魏時最高官職	原典/卷
1	阮籍	陳留尉氏	散騎常侍	《晉書》49
2	嵇康	譙國銍	中散大夫	《晉書》49
3	山濤	河內懷	大將軍從事中郎	《晉書》43
4	向秀	河內懷	散騎常侍	《晉書》49
5	劉伶	沛國	不明	《晉書》49
6	阮咸	陳留尉氏	不明	《晉書》49
7	王戎	琅邪臨沂	相國掾	《晉書》43

從上述的經歷來看，處於動盪不安的魏晉交替期間的竹林名士，仍是難以超脫於政治之外，甚至與當時執曹魏政權牛耳的司馬家族亦有所往來。因此，大部分的學者會將竹林七賢分為三類：分別是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抗俗派」；以山濤、王戎為代表的「游世派」；以及以向秀、劉伶、阮咸為代表的「縱情派」。¹²⁷然而，無論他們個人在魏晉之際時的立場為何，「竹林名士」七人在當時皆頗受時人賞譽，無論是在容貌、器量、學術上，都擁有相當程度的聲望，筆者在此列舉如下：

(1) 阮籍

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為勝己，由是咸共稱異。

¹²⁵ 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曰「王濬沖」，此據王戎於晉書之本傳改。參見《晉書》，卷43，〈王戎傳〉，頁1231。

¹²⁶ 《晉書》，卷43，〈王戎傳〉，頁1231-1233。

¹²⁷ 此三派名稱參見王澍，《魏晉玄學與玄言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68-69。除了王澍外，康中乾、李建中、高華平等亦是做此分類。可參見康中乾，《魏晉玄學》，頁126-127。李建中、高華平，《玄學與魏晉社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76。

(2) 嵇康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¹²⁹

(3) 山濤

(裴令公)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¹³⁰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¹³¹

(4) 向秀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就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¹³²

(5) 劉伶

劉伶……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挾。¹³³

(6) 阮咸

¹²⁸ 《晉書》，卷 48，〈阮籍傳〉，頁 1359。

¹²⁹ 《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上，〈容止第十四〉，頁 527。

¹³⁰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上〉，頁 373。

¹³¹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上〉，頁 374。

¹³²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下，〈文學第四〉，頁 180。

¹³³ 《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上，〈容止第十四〉注引梁祚《魏國統》，頁 530。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¹³⁴
太原郭奕……見咸心醉，不覺歎焉。¹³⁵

(7) 王戎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¹³⁶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岩下電」。¹³⁷

從上述時人評鑑之語來看，竹林名士大多是因個人風範而為人所稱道，嵇康可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學術方面，則是有向秀著《莊子注》而使當時「大暢玄風」，成為學術風氣的引領者。事實上，若從史料中來看，嵇康更可能是當時年輕士人所景仰的對象。《世說新語》中載：「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¹³⁸鍾會出身於潁川鍾氏，乃是漢末以來的政壇名門，在士人中頗有聲望。然而如此的士族貴公子在完成新作品時不敢隨意發表，想請嵇康先行過目，但又怕被責難，最後丟書倉皇離去。除此之外，日後嵇康在臨刑前有三千名太學生為之請命，也可從中見到嵇康在當時年輕士人中的地位。

竹林名士身處於暗潮洶湧的魏晉之際，其心境是矛盾不安的。阮籍、嵇康、山濤懷抱著才能與志向，想要在朝廷中有一番作為，但當時曹魏朝廷被權臣司馬氏所把持，是否要投身於司馬氏的陣營，便成為他們所要面對的課題。嵇、阮、山三人面對當時的情況，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選擇：身為曹魏姻親且一身傲骨的嵇康，不願妥協於司馬氏，最後受到鍾會的誣陷而被司馬昭所殺；阮籍在司馬氏有意的庇護下，¹³⁹以大醉

¹³⁴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上〉，頁 375。

¹³⁵ 《晉書》，卷 49，〈阮籍傳附兄子咸傳〉，頁 1362。

¹³⁶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上〉，頁 371。

¹³⁷ 《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上，〈容止第十四〉，頁 528。

¹³⁸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下，〈文學第四〉，頁 170。

¹³⁹ 阮籍居喪無禮，何曾曾要求司馬昭處分之，但遭到司馬昭拒絕。此外，何啟民認為，在高貴鄉公即位時僅有阮籍、鍾會二人封爵，可見阮籍應該有參與廢立大事，

逃避混亂的時局；而山濤則是以司馬氏姻親的身份進入政壇，從此平步青雲。昔日「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¹⁴⁰的三人，在矛盾的時局之下，最終還是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結局。

竹林已逝，而玄風猶存。在正始時期，玄學是以《老子》、《周易》作為主軸，但竹林名士中的阮籍、嵇康、山濤皆好《莊子》，向秀更是寫了《莊子注》而大暢玄風，使得《莊子》得以與《老子》、《周易》並稱「三玄」，影響了西晉中朝名士的學術風氣；此外，阮籍、阮咸、劉伶不拘小節的作風，也開啟了西晉士人的任誕風氣。因此，何啟民便認為，「(竹林七賢)於晉宋之談論、玄學則至具貢獻。」¹⁴¹嵇康的〈廣陵散〉雖成為絕響，但竹林名士們得以暢談《老》、《莊》，悠遊自得的那片竹林，還存留在日後的士人們心中。

第三節 西晉「中朝名士」及其風貌

(一) 一世所宗的中朝名士

曹魏咸熙二年(265年)八月，司馬昭過世，其晉王、相國等職位由其嗣子司馬炎所繼承。同年十二月，魏元帝曹奂禪位予司馬炎，曹魏政權就此結束，開啟了西晉王朝。西晉士風承襲曹魏正始時期以來的風潮，崇尚清言玄談，因此在西晉時期也出現了一批名士群體，即為袁宏筆下的「中朝名士」裴楷、樂廣、王衍、庾敳、王承、阮瞻、衛玠、謝鯤八人。此八人於西晉至東晉初的事蹟大致如下：

- (1) 裴楷(237~291)。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弱冠知名，性情寬厚，精於《老》、《易》，且善於識人。歷任吏部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令，並參與《晉律》的制訂，深受晉武帝重用。¹⁴²
- (2) 樂廣(?~304)。字彥輔，南陽滄陽人，性情清心寡欲。曾

且與司馬氏的關係不淺。參見何啟民，《竹林七賢研究》，頁32-33。

¹⁴⁰ 《晉書》，卷43，〈山濤傳〉，頁1223。

¹⁴¹ 何啟民，《竹林七賢研究》，頁173。

¹⁴² 《晉書》，卷35，〈裴秀傳附從弟楷傳〉，頁1047-1050。

任吏部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因與成都王司馬穎有姻親關係，受到當時掌權的長沙王司馬乂猜忌，以憂卒。¹⁴³

- (3) 王衍 (256~311)。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初好縱橫之術，後來口不論世事。喜好何晏、王弼的學說，亦好《老》、《莊》。於趙王司馬倫掌政時，佯狂以自免。後又拜河南尹、中書令、尚書令、司空、司徒。最後在永嘉之亂時為石勒所殺。¹⁴⁴
- (4) 庾敳 (261~311)。字子嵩，潁川鄆陵人。好《老》、《莊》，歷任陳留相、吏部郎，參司馬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與王衍俱被石勒所殺。¹⁴⁵
- (5) 王承 (?~?)。字安期，太原晉陽人。弱冠知名，永寧 (301~302 年) 初年為驃騎參軍，時值動亂，南下避難，遷司空從事中郎，東海王司馬越以之為記室參軍。遷東海太守，不久後去官，渡江至建業，被譽為中興第一名臣。¹⁴⁶
- (6) 阮瞻 (?~312?)。字千里，陳留尉氏人。性情清虛寡欲，善彈琴。東海王司馬越以之為記室參軍，永嘉 (307~312 年) 中為太子舍人。¹⁴⁷
- (7) 衛玠 (286~312)。字叔寶，河東安邑人。年五歲即為人所知，好言玄理。歷任太傅西閣祭酒、太子洗馬。因天下大亂，移家南下至建業。積勞疾，卒於永嘉六年 (312 年)。¹⁴⁸
- (8) 謝鯤 (281~323)。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年少知名，好《老》、《易》，能歌、善鼓琴。東海王司馬越兩度徵辟之，謝鯤以時局動盪，避亂於豫章。¹⁴⁹

¹⁴³ 《晉書》，卷 43，〈樂廣傳〉，頁 1243-1245。

¹⁴⁴ 《晉書》，卷 43，〈王戎傳附從弟衍傳〉，頁 1235-1238。

¹⁴⁵ 《晉書》，卷 50，〈庾峻傳附子敳傳〉，頁 1395-1396。

¹⁴⁶ 《晉書》，卷 75，〈王湛傳附子承傳〉，頁 1960-1961。

¹⁴⁷ 《晉書》，卷 49，〈阮籍傳附兄子咸子瞻傳〉，頁 1363-1364。

¹⁴⁸ 《晉書》，卷 36，〈衛瓘附孫玠傳〉，頁 1067-1068。

¹⁴⁹ 《晉書》，卷 49，〈謝鯤傳〉，頁 1377。

表 2-3-1 西晉中朝名士

序	姓名	籍貫	永嘉之禍前最高官職	原典/卷
1	裴楷	河東聞喜	中書令	《晉書》35
2	樂廣	南陽涇陽	尚書令	《晉書》43
3	王衍	琅邪臨沂	太尉	《晉書》43
4	庾敳	潁川鄴陵	東海王府軍諮祭酒	《晉書》50
5	王承	太原晉陽	東海太守	《晉書》75
6	阮瞻	陳留尉氏	東海王府記室參軍	《晉書》49
7	衛玠	河東安邑	太子洗馬	《晉書》36
8	謝鯤	陳國陽夏	東海王府參軍事	《晉書》49

從上述經歷來看，中朝名士大多出仕於西晉朝廷，且有半數與東海王司馬越頗有淵源。若從中朝名士的出身來看，幾乎都來自名門望族，而這也是中朝名士與上述其他時期名士群體的不同之處。關於這項變化，在下一章將會做較為詳細的說明。

如同自東漢末以來的名士群體一般，中朝名士在當時頗受時人讚賞，彼此之間也會互相欣賞、品評。其中，又以樂廣、王衍二人為中心，中朝名士在西晉時期可說是時代風尚的領導者。筆者在此主要據《世說新語》中時人對中朝名士的賞譽，羅列如下：

(1) 裴楷

吏部郎闕，文帝（司馬昭）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¹⁵⁰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¹⁵¹

王太尉（王衍）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寵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¹⁵²

裴令公有俊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

¹⁵⁰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上〉，頁 371。

¹⁵¹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上〉，頁 376。

¹⁵²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上〉，頁 384。

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¹⁵³

(2) 樂廣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以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睹青天。」¹⁵⁴

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¹⁵⁵

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言天下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¹⁵⁶

(3) 王衍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¹⁵⁷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俊。」¹⁵⁸

(王)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¹⁵⁹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眾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¹⁶⁰

(王)衍……聲名藉甚，傾動當世。……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其為人所尚如此。¹⁶¹

(4) 庾敳

¹⁵³ 《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上，〈容止第十四〉，頁 530。

¹⁵⁴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上〉，頁 383-384。

¹⁵⁵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上〉注引孫盛《晉陽秋》，頁 384。

¹⁵⁶ 《晉書》，卷 43，〈樂廣傳〉，頁 1244。

¹⁵⁷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上〉，頁 378。

¹⁵⁸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下〉，頁 385。

¹⁵⁹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下〉注引顧愷之《夷甫畫贊》，頁 390。

¹⁶⁰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容止第十四〉，頁 531。

¹⁶¹ 《晉書》，卷 43，〈王戎傳附從弟衍傳〉，頁 1235-1238。

司馬太傅（司馬越）府多名士，一時俊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¹⁶²

（庾）敞不為辨析之談，而舉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¹⁶³

庾公（庾亮）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¹⁶⁴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托大，長於自藏。」¹⁶⁵

劉尹（劉惔）目庾中郎：「雖言不悖悖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¹⁶⁶

（5）王承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故王中郎（王坦之）作碑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¹⁶⁷

（王）承……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眾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¹⁶⁸

（6）阮瞻

林下諸賢，各有俊才子。……（阮）咸子瞻，虛夷有遠志。……凡此諸子，惟瞻為冠，（嵇）紹、（山）簡亦見重當世。¹⁶⁹

（阮）瞻……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太尉王衍亦雅重之。¹⁷⁰

¹⁶²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下〉，頁 387。

¹⁶³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下〉注引袁宏《名士傳》，頁 392。

¹⁶⁴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下〉，頁 392。

¹⁶⁵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下〉，頁 394。

¹⁶⁶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品藻第九〉，頁 464。

¹⁶⁷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品藻第九〉，頁 446。

¹⁶⁸ 《晉書》，卷 75，〈王湛傳附子承傳〉，頁 1960-1961。

¹⁶⁹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下〉，頁 386。

¹⁷⁰ 《晉書》，卷 49，〈阮籍傳附兄子咸子瞻傳〉，頁 1363。

(7) 衛玠

(衛)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壻有璧潤之望。」¹⁷¹

王平子邁世有俊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嘆息絕倒。¹⁷²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於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¹⁷³

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¹⁷⁴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俊爽有風姿，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¹⁷⁵

(8) 謝鯤

(謝)鯤有勝情遠概，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¹⁷⁶

溫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¹⁷⁷

除了上述的讚賞之詞外，在史料中也頻頻出現西晉時人對中朝名士十分欣賞的描述，如樂廣「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¹⁷⁸、衛玠「其為有識者

¹⁷¹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上，〈言語第二〉注引《衛玠別傳》，頁 84。

¹⁷²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下〉，頁 394。

¹⁷³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下〉，頁 397。

¹⁷⁴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品藻第九〉注引劉義慶《江左名士傳》，頁 458。

¹⁷⁵ 《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上，〈容止第十四〉，頁 531。

¹⁷⁶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品藻第九〉注引鄧粲《晉紀》，頁 450。

¹⁷⁷ 《晉書》，卷 49，〈謝鯤傳〉，頁 1378。

¹⁷⁸ 《晉書》，卷 43，〈樂廣傳〉，頁 1243。

所重若此。」¹⁷⁹王承「眾咸親愛焉。」¹⁸⁰等等，作為「天下風流之首」的王衍、樂廣，時人對他們的仰慕更是不在話下。因此，中朝名士確實堪稱西晉時期士人群體的代表與引領者。

（二）中朝名士與現實

對於西晉的中朝名士，後人大多指責他們放誕行事、不務政事，乃是逃避現實社會的無能者。¹⁸¹然而從史料中來看，事實上中朝名士們不但頗有才幹，且在擔任地方令長時亦能處理政務，甚至受到當地百姓的愛戴，並非無能之徒。如樂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¹⁸²；王衍「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¹⁸³；王承「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¹⁸⁴；謝鯤「使之郡，涖政清肅，百姓愛之。」¹⁸⁵更甚者如裴楷長期擔任中央要職，並曾參與《晉律》的制訂。如此來看，中朝名士治理地方事務的方法顯然不同於昔日黨錮名士之「嚴明」，乃是屬於「無為而治」的管理方式。王承擔任東海內史時的兩則逸事，便十分能表現出中朝名士治理地方的特色：

王安期為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圃，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¹⁸⁶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¹⁸⁷

¹⁷⁹ 《晉書》，卷 36，〈衛瓘附孫玠傳〉，頁 1068。

¹⁸⁰ 《晉書》，卷 75，〈王湛傳附子承傳〉，頁 1961。

¹⁸¹ 可參見（日）岡村繁 著，陸曉光 譯，〈六朝貴族文人的怯懦和虛榮——關於「清談」〉，《岡村繁全集·第三卷·漢魏六朝の思想和文學》，頁 396-411。

¹⁸² 《晉書》，卷 43，〈樂廣傳〉，頁 1244。

¹⁸³ 《晉書》，卷 43，〈王戎傳附從弟衍傳〉，頁 1236。

¹⁸⁴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下，〈政事第三〉注引袁宏《名士傳》，頁 152。

¹⁸⁵ 《晉書》，卷 49，〈謝鯤傳〉，頁 1379。

¹⁸⁶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下，〈政事第三〉，頁 152。

¹⁸⁷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下，〈政事第三〉，頁 153。

王承的清靜之政十足表現出寬厚、愛民的特色，因此能夠受到百姓與故吏的懷念與愛戴。可見身為名士的樂廣、王承等人對於現實社會並非一味的逃避，乃是有所作為且獲得相當程度的好評；而中朝名士們在地方事務上這種「清靜」的治理方式，或許可以說是日後東晉時王導、謝安「鎮之以靜」政策的先驅。¹⁸⁸

此外，《晉書》中亦有不少中朝名士在任職地方時，驅除當地妖異現象的記載。如樂廣「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多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¹⁸⁹；謝鯤「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愴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¹⁹⁰法國漢學家樂維（Jean Levi）認為，中國古代官吏以自身行動對民風習俗進行道德規範，他們以祓魔者的身份驅趕地方妖魔鬼怪，剷除潛藏的邪惡勢力。模範官吏一生中所做的最引人注目的事，便是為黎民百姓驅趕豺狼虎豹。¹⁹¹就此來看，中朝名士樂廣、謝鯤在地方上或許有過一番整飭地方風俗的作為，才會留下這類斬妖除魔、驅除妖異的逸事。

中朝名士除了在地方上有所作為，並受到百姓的愛戴外，對於國家亦懷有忠誠之心，不願意與亂臣賊子有所牽連。如王衍於八王之亂時「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為之拜，衍獨長揖焉。」¹⁹²衛玠、謝鯤則是不屑於與王敦共事：「（衛玠）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¹⁹³「（王）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

¹⁸⁸ 關於王導、謝安的「鎮之以靜」政策，可參考萬繩楠，〈論淝水戰前東晉的鎮之以靜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台北：雲龍出版社，1994），頁181-198。

¹⁸⁹ 《晉書》，卷43，〈樂廣傳〉，頁1245。

¹⁹⁰ 《晉書》，卷49，〈謝鯤傳〉，頁1377。

¹⁹¹ （法）樂維（Jean Levi）著，張立方譯，〈官吏與神靈——六朝及唐代小說中官吏與神靈之爭〉，《法國漢學》，3，1998，頁32-59。

¹⁹² 《晉書》，卷43，〈王戎傳附從弟衍傳〉，頁1237。

¹⁹³ 《晉書》，卷36，〈衛瓘附孫玠傳〉，頁1068。

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¹⁹⁴即使是被後人視為「清談誤國」代表的王衍，也曾於永嘉二年（308年）率軍擊退進犯洛陽的石勒、王彌，「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安眾心。」¹⁹⁵因此，中朝名士諸人雖不能力挽永嘉年間之狂瀾，但他們並非無能之人：做為地方郡守，樂廣、王承、謝鯤等人以無為而治的方式受到百姓的愛戴；做為朝廷重臣，王衍、衛玠等人忠心愛國，不願與亂臣賊子為伍。西晉中朝名士並非脫離現實，而是以其自身的方式在兩晉紛亂的時局中，尋求一條安身立命的道路。

第四節 結語

從東漢末年以來歷經曹魏、西晉，各自有一批受到當時世人所矚目的名士群體，即《後漢書》中的黨錮名士，以及袁宏《名士傳》中的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這些名士皆可說是當時社會的領導者，其共同的特點有二：

- 1、受到時人的賞譽與重視。
- 2、名士群體之間相互的品評、標榜。

這些名士引領著當時的時代風氣，堪稱該時代的代表，因此他們在漢晉之際的發展，是值得留意與關心的。

東漢時期，黨錮名士陳蕃、李膺等人視天下為己任，勇於對抗朝廷、打擊宦官，但也因此引來殺身之禍。兩次的黨錮之禍使得黨錮名士消失殆盡，也使得士人對東漢朝廷失去信心，造成東漢政權走向衰亡。到了曹魏明帝年間，「四聰」、「八達」等浮華士人的出現，標示著黨錮名士的標榜風氣猶存，然而卻受到曹魏政權的打壓，有如曇花一現般快速地消失在曹魏政壇。

曹魏正始時期，大將軍曹爽輔政，重新啟用曾被打壓的浮華士人，其中的夏侯玄、何晏再加上王弼，便是所謂的「正始名士」。夏侯、何、王三位正始名士無論是在人格風範、政治作為及學術著作上皆有相當大

¹⁹⁴ 《晉書》，卷 49，〈謝鯤傳〉，頁 1377-1378。

¹⁹⁵ 《晉書》，卷 43，〈王戎傳附從弟衍傳〉，頁 1238。

的影響力；此時期何晏等人談論《老子》、《周易》的「正始之音」，深受後世士人的懷念。然而，正始時代的結束，也宣告著正始名士的消逝。正始十年的高平陵事件後，司馬氏逐漸掌握曹魏朝政，何晏被殺，王弼病逝，夏侯玄雖低調行事，但仍不為司馬氏所容而見殺。曹魏政權籠罩在司馬氏的陰影下，親曹氏或親司馬氏，成為當時世人所需要面對的問題。矛盾的時局造成士人們矛盾的心理，曾經攜手共遊於竹林中的嵇康、阮籍、山濤等竹林名士們面對此課題，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也因此走向了不同的結局。

西晉中朝名士以往被視為「清談誤國」的代表，但若從史料中觀察，王衍、樂廣、王承、謝鯤等作為時代佼佼者的中朝名士，其實是以「無為而治」的方式維持著中央與地方的秩序，並且受到百姓的愛戴；而這種治理方式或許可以是為日後東晉時王導、謝安「鎮之以靜」政策的先驅。事實上，中朝名士並非逃避現實的無能者，只是有鑑於自東漢以來名士群體受到種種的打擊，試圖在兩晉的紛亂中追求一種安身立命的方式。

第三章 漢晉之際的名士結構

第一節 東漢晚期黨錮名士的複雜性

(一) 黨錮名士群體之結構

從史籍上看，名列《後漢書·黨錮列傳》的「黨錮名士」多達三十五人，並且有著「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特色、行為上的差別。¹若從他們的出身階層來看，便會發現這三十五位黨錮名士家世來歷亦大不相同。金發根在〈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一文中，探討了東漢黨人的家世、門生故吏關係、地域、出身途徑等相關事蹟，認為清流黨人的領袖人物大多數都是以經學傳家的世宦豪族。²唐長孺亦認為東漢末的黨人多出於大姓名士，而這些大姓名士是控制地方的力量、是漢末各個政權的統治基礎、是社會上最有活動力的集團。³以上兩位學者皆認為東漢末的黨錮名士多為官宦世家或是地方豪族，無論在地方或朝堂皆有雄厚的實力。筆者考察了東漢末黨錮名士及其往來的人物後，亦認同兩位前輩學者的觀點，但對於黨錮名士群體在出身、行為上是否有相當的一致性，則還有幾個可以討論的地方。

首先，就黨錮名士的出身來看，諸名士的身份背景可說是差異極大。筆者檢視史籍中對黨錮名士家世背景的描述，茲列表如表 3-1-1。

¹ 侯外廬認為這些稱號有其次第性，三君大致指三公以上的大官，八俊則是次一等的卿、尹，八顧是活動在京師的高名遊士，八及則是郡國名流。至於以財見稱的八廚，雖附於上述諸人之末，但實際上與次序排列無關。參見侯外廬等著，〈漢末統治階級的內訌與清議思想〉，《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 363。

² 金發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 下，1963，頁 505-558。

³ 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 25-52。

表 3-1-1 黨錮名士之家世背景

出身背景	名士	人數	比例
外戚	竇武	1 人	2%
宗室	劉淑、劉祐、劉表	3 人	9%
世代仕宦	尹勳、羊陟、孔昱	3 人	9%
三代仕宦	陳蕃、李膺	2 人	6%
兩代仕宦	趙典、張儉、岑暉、陳翔	4 人	11%
兩代仕宦、大族豪右	荀翌、王暢	2 人	6%
大族豪右	魏朗、宗慈、張邈、胡母班	4 人	11%
家貧	檀敷、度尚	2 人	5%
家世貧賤	郭泰	1 人	2%
不詳	杜密、朱寓、巴肅、夏馥、范滂、蔡衍、苑康、翟超、王考、劉儒、秦周、蕃嚮、王章	13 人	37%

從表中的情形來看，黨錮名士 35 人不完全是世宦豪族，上有外戚宗室，亦有家世貧賤者。而在上述黨錮名士中，有兩個人的出身背景值得一提，分別是「八及」之一的岑暉以及「八廚」之一的度尚。首先是岑暉的情況：

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父（像）〔豫〕，為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暉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暉非良家子，不肯見。暉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⁴

岑暉之父因貪叨受誅，造成其家庭背景在道德上有污點，使岑暉被視為「非良家子」，故同郡名士宗慈不肯相見。然而，在岑暉確有實才且以誠心感動宗慈的情況下，宗慈接受了他，並帶他到洛陽太學受業，增進學問。日後，岑暉受到郭泰、李膺、王暢的讚賞，揚名於世，甚至與宗、

⁴ 《後漢書》，卷 67，〈黨錮·岑暉傳〉，頁 2212。

郭、李、王四人一併受輿論稱許，獲得了「八及」的稱號。至於度尚的情況比起岑晷，或許還要更極端一些：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所推舉。積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⁵

度尚家貧，且不被鄉里人看重，在窮困的情況下為同郡的宦官侯覽看管田地。但也因為這層關係，度尚才有機會以山陽郡上計吏這條途徑出仕，進一步擔任郎中、上虞長。可見對度尚而言，他能夠進入東漢政界，很大一部份要歸因於與侯覽的關係。然而侯覽卻是在東漢晚期惡名昭彰的宦官，諸名士如張儉、岑晷、苑康都曾與侯覽結怨，是站在名士對立面的人物。如此於出仕背景上與宦官侯覽有淵源的度尚，在因緣際會下以平定南方動亂的戰功而顯名於朝廷，最後竟能獲得了「八廚」的稱號，令人不得不訝異黨錮名士群體對成員出身背景的包容性。

因此，從三十五位名士的出身背景來看，即使是父輩有污名的岑晷、家世貧賤的郭泰、檀敷，甚至是與宦官侯覽有淵源的度尚，都能以自身的才幹、學行獲得輿論與士人之間的讚許，成為獲得稱號的「天下名士」之一。由此看來，黨錮名士群體之成員在出身背景方面，其來源可以說是來自十分複雜、多元的面向，並非是單一情況背景成員的組成。⁶

其次，若從黨錮名士在東漢晚期的活動來看，也有許多的不一致之處。筆者在此亦整理黨錮名士的行為、活動，茲列表如表 3-1-2。

⁵ 《後漢書》，卷 38，〈度尚傳〉，頁 1284。

⁶ 參見拙著，〈度尚與「八廚」——試論黨錮名士的異質性〉，《史穗》，5，2012，頁 39-66。

表 3-1-2 黨錮名士之活動事蹟

活動事蹟	名士	人數
與宦官對立	竇武、劉淑、陳蕃、李膺、荀翌、杜密、劉祐、魏朗、朱寓、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張儉、岑晷、陳翔、苑康、翟超	20 人
在地方有政績	陳蕃、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范滂、尹勳、羊陟、岑晷*、苑康	12 人
教授弟子	劉淑、李膺、王暢、趙典、郭泰、蔡衍、檀敷	7 人
其他	宗慈、劉表、孔昱、度尚、張邈、胡母班、劉儒	6 人
不詳	王考、秦周、蕃嚮、王章	4 人
附註：姓名後方有*者，表示其政績包含與宦官子弟之衝突。		

如同本文在第二章第一節所述，與宦官直接或間接的衝突，似乎是黨錮名士成名的主要原因，因此其活動事蹟亦大多集中於與宦官對立的情況，約佔 57%。然而，其餘的十五位黨錮名士雖同受士林輿論標榜，但他們在史籍中的活動事蹟並未提及與宦官的衝突，有些名士甚至似乎未曾受到黨錮之禍的牽連。例如：

- (1) 王暢。於桓帝時曾「坐事免官」，但後來被太尉陳蕃推薦而復為尚書。陳蕃是在延熹八年（165 年）擔任太尉，因此王暢免官一事應是在延熹八年之前，與發生於延熹九年（166 年）的第一次黨錮之禍無關。後來王暢於建寧元年（168 年）擔任司空，因水災之事遭到策免，隔年（169 年）卒於家中。雖然王暢的卒年與第二次黨錮之禍的時間相同，但在其本傳中並未提及受禁錮或受鉤黨牽連之事，可見王暢雖在第一次黨錮之禍後獲得標榜，但其生平事蹟不僅不見與宦官之衝突對立，也並未受到禁錮。⁷
- (2) 趙典。趙典情況與王暢相似，雖然獲得標榜，卻不見與宦官之衝突。其事蹟可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之註 74。
- (3) 郭泰。第一次黨錮之禍時並未受害；建寧元年（168 年）時

⁷ 《後漢書》，卷 56，〈王龔附子暢傳〉，頁 1823。

為陳蕃、竇武之死而痛哭，隔年春季卒於家，故並未遭遇到同年十月收捕黨人之事。⁸

(4) 宗慈。受朝廷徵拜議郎，未到，在途中因病去世。其本傳並未提到宗慈與宦官對立，或是受黨錮牽連之事。⁹

(5) 檀敷。桓帝時不就徵，靈帝時為議郎，後補蒙令，因不認同郡守而棄官。年八十卒於家，本傳未曾言及黨錮相關事蹟。¹⁰

上述五人在其本傳與相關記載中皆無提到與宦官的對立、衝突，或是受到兩次黨錮之禍牽連之事。因此應該可以認為，此五人雖在第一次黨錮之禍後受到士林輿論的標榜並獲得稱號，但其活動事蹟並未涉及東漢晚期的兩次黨錮禍事，甚至有可能是置身事外。

除了上列名士之外，以度尚為首的「八廚」，也大多與黨錮禍事無關。除了劉儒受竇武之事牽連下獄自殺外，「八廚」中王考、秦周、蕃嚮、王章四人「位行並不顯」，¹¹其事蹟史籍無載；其餘度尚、張邈、胡母班三人亦不見與宦官之衝突對立。其中度尚如同前述，乃是因宦官侯覽而得以出仕，與宦官頗有淵源。度尚在黨錮名士群體中的特殊之處，不僅只有其出身背景，其活動事蹟亦值得一提。前面曾經提到，度尚因平定南方動亂有功而知名於朝廷後，兩度擔任荊州刺史。而度尚在此時竟為了自身的利害關係，誣陷同僚，造成交阯刺史張磐獲罪下獄：

復以尚為荊州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為己負，乃偽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可]乎？」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嬰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盡烏竄冒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夫

⁸ 《後漢書》，卷 68，〈郭太傳〉，頁 2225-2227。

⁹ 《後漢書》，卷 67，〈黨錮·宗慈傳〉，頁 2202-2203。

¹⁰ 《後漢書》，卷 67，〈黨錮·檀敷傳〉，頁 2215。

¹¹ 《後漢書》，卷 67，〈黨錮列傳序〉，頁 2190。

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德原。¹²

受到度尚誣陷的交阯刺史張磐，史載「以清白稱」，¹³應是受到士林輿論讚許的清流人物。度尚如此誣陷清流同僚，最後辭窮受罪，卻能在第一次黨錮之禍後成為獲得稱號的「天下名士」之一，名列「八廚」，十分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更值得一提的是，度尚乃是在與第一次黨錮之禍同年的延熹九年（166年）過世，且卒於任上。由於其本傳中不曾提及度尚受黨錮牽連的情況，因此度尚很有可能在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前就早已過世。如此一來，已過世的度尚竟能在第一次黨錮之禍後仍受士林輿論標榜而成為「八廚」之一，實在令人玩味，並更顯得度尚在黨錮名士群體中乃是一個特殊的存在。¹⁴

綜上所述，名列於《後漢書·黨錮列傳》中的三十五名黨錮名士群體，若從其出身家世背景來看，上至宗室外戚，下可至貧寒百姓；從行為活動事蹟來看，有因黨錮事件而下獄自殺者，亦有不受鉤黨牽連禁錮者；極端者如度尚，早年與宦官侯覽頗有淵源，又曾誣陷「以清白稱」的同僚，最後竟能成「天下名士」，獲得「八廚」之名，在黨錮名士群體確實是十分特別的人物。因此，或許可以認為，黨錮名士群體在組成結構上具有相當大的包容性，雖然其主要活動是以對抗宦官為主，但只要擁有一定程度的聲望，就會受到士林輿論的標榜，成為其中的一員，故黨錮名士乃是一個具有開放性，不侷限於某個出身階層、行為活動的群體；其成員的組成並非僅有單一來源，而是具有某個程度的複雜性結構。黨錮名士群體組成的複雜性，也能體現在他們所交遊、往來的友人身上。

¹² 《後漢書》，卷 38，〈度尚傳〉，頁 1286-1287。

¹³ 《後漢書》，卷 38，〈度尚傳〉，頁 1287。

¹⁴ 參見拙著，〈度尚與「八廚」——試論黨錮名士的異質性〉，《史穗》，5，2012，頁 39-66。

(二) 黨錮名士的交友與賞譽

關於黨錮名士 35 人群體組成的複雜性，已如前述，而這樣的複雜性也能在諸名士所往來的友人身上見到。筆者翻查史籍中 35 位黨錮名士的來往友人，得 36 人，茲列表如表 3-1-3。

根據此表，在黨錮名士群體所來往的友人中，不乏仕宦之家與大族豪右，其中仕宦之家有 12 人，約 33%；家世貧寒或單微者有 5 人，約佔 14%；若扣除家世不詳者 14 人，則在可判斷出身背景的 22 人中，家世貧寒者約佔 23%，可說是佔有相當程度的比例。換句話說，黨錮名士在交往友人的選擇上，並不排斥與不同背景出身的人物往來，與其群體組成相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與複雜性。此外，若細考東漢末名士的交遊往來與品評關係，則會發現在東漢末時受到時人關注、重視的人物，除了激烈抨擊宦官，「不畏強禦」的陳蕃、「天下模楷」的李膺外，還有出身貧寒的黃憲、郭泰二人。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其本傳稱其家世：「世貧賤，父為牛醫。」¹⁵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這個牛醫之子竟能得到當時許多士人的讚譽。《後漢書·黃憲傳》載：

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

¹⁵ 《後漢書》，卷 53，〈黃憲傳〉，頁 1744。

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¹⁶

據其本傳，當時賞識黃憲者計有荀淑、袁閔、戴良、陳蕃、周舉、¹⁷王龔、郭泰共七人。荀淑是「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¹⁸的人物，其八子被稱為「荀氏八龍」，其孫即為被譽為「王佐才也」的荀彧，為朝野知名的人物。其餘士人袁閔當世知名、戴良隱逸之士；陳蕃為黨錮名士「三君」之一、王龔為黨錮名士「八俊」之一的王暢之父，是山陽王氏由土豪步入士族的關鍵人物。¹⁹其擔任汝南太守時提拔陳蕃、黃憲，與汝南士人關係密切。郭泰以善於品評人物知名，乃是「名震京師」的名士。上述讚譽黃憲的諸人中，既有隱逸人物的戴良、袁閔，又有致力於打擊宦官的王龔、²⁰陳蕃，而黃憲集漢末兩種類型名士之賞譽於一身，可說是時人、名士注目的焦點。

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八顧」之一。其本傳曰「家世貧賤，早孤。」²¹郭泰與黃憲相同，都不是地方豪族或世宦出身，而是出身貧賤之家。然而，東漢末的士人對郭泰同樣賞譽有加，郭泰亦與當時的名士有所交遊往來。如：

（郭泰）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²²

郭林宗始入京師，時入莫識，（符）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

¹⁶ 《後漢書》，卷 53，〈黃憲傳〉，頁 1744。

¹⁷ 《世說新語》與袁宏《後漢紀》皆做周子居（周承）。

¹⁸ 《後漢書》，卷 62，〈荀淑傳〉，頁 2049。

¹⁹ 王曉毅，〈王龔與漢末汝南名士〉，《孔孟月刊》，35：1（總 409），1995，頁 45-51。

²⁰ 史載王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參見《後漢書》，卷 56，〈王龔傳〉，頁 1820。

²¹ 《後漢書》，卷 68，〈郭太傳〉，頁 2225。

²² 《後漢書》，卷 68，〈郭太傳〉，頁 2225。

優遊不仕，並以壽終。²³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²⁴

（岑）晷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²⁵

（苑康）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²⁶

以上賞識郭泰、與郭泰交友者，計有李膺、范滂、符融、田盛、賈彪、陳蕃、王暢、岑晷、苑康等九人。其中陳蕃為「三君」之一，李膺、王暢皆為「八俊」，范滂與郭泰同為「八顧」，岑晷、苑康亦為「八及」，可見郭泰不僅名列東漢末「天下名士」三十五人名單中，同時也與其他黨錮名士密切來往。此外，符融為李膺之弟子，以善於知人見稱，終身不仕官；賈彪與「荀氏八龍」之一的荀爽齊名，曾說服竇武聯名要求漢桓帝解除第一次黨錮。雖然郭泰本人終身未仕，但相較於黃憲，賞譽郭泰或與郭泰往來的人物中，大部分與宦官有著激烈衝突，如陳蕃、李膺、范滂等人，隱逸者如田盛、符融則為少數，與黃憲的情況較為不同。

黃憲、郭泰二人沒有任何門閥背景，也無任官官職，卻在當時士人社會日常生活中能夠得到高度的評論關注，受到尊敬讚賞。²⁷這在漢代，甚至是日後的魏晉時代也十分少見。這個現象也呼應了前面所提到的，東漢末的名士群體不僅包含了較低階層的人物，且在往來交遊時，貧寒出身的人物若有德行、才幹，不但不會遭受排擠，甚至能夠成為諸名士與時人景仰的對象。

²³ 《後漢書》，卷 68，〈符融傳〉，頁 2232。

²⁴ 《後漢書》，卷 67，〈黨錮列傳序〉，頁 2186。

²⁵ 《後漢書》，卷 67，〈黨錮·岑晷傳〉，頁 2212。

²⁶ 《後漢書》，卷 67，〈黨錮·苑康傳〉，頁 2214。

²⁷ （日）岡村繁 著，陸曉光 譯，〈後漢末期的評論風氣〉，《漢魏六朝の思想和文學》，頁 101。原文刊於《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22 輯，1960。

表 3-1-3 黨錮名士的交友圈

序	姓名	籍貫	出身家世	友好人物	典／卷
1	劉瑜	廣陵	宗室胤緒	竇武	《後漢書》57、69
2	劉猛	琅邪	不詳	竇武	《後漢書》37、69
3	周璆	臨濟	不詳	陳蕃	《後漢書》66
4	朱震	陳留	不詳	陳蕃	《後漢書》66
5	周乘	汝南安城	大族豪右	陳蕃	《世說新語》8
6	黃憲	汝南慎陽	家世貧賤	陳蕃、郭泰	《後漢書》53
7	徐穉	豫章南昌	家世貧賤	陳蕃	《後漢書》53
8	黃琬	江夏安陸	兩代仕宦	陳蕃、王暢	《後漢書》61
9	周昕	不詳	不詳	陳蕃	《三國志》51 注引《會稽典錄》
10	馮緄	巴郡宕渠	兩代仕宦	李膺	《後漢書》67
11	荀淑	潁川潁陰	大族豪右	李膺、苑康	《後漢書》62、67
12	陳寔	潁川許	家世單微	李膺	《後漢書》62、67
13	鍾皓	潁川長社	大族豪右	李膺	《後漢書》62
14	韓韶	潁川舞陽	仕州郡	李膺、杜密	《後漢書》62
15	賈彪	潁川定陵	仕州郡	竇武、李膺	《後漢書》67
16	何顯	南陽襄鄉	不詳	陳蕃、李膺、 郭泰	《後漢書》67
17	馮緄	巴郡宕渠	兩代仕宦	李膺	《後漢書》38
18	符融	陳留浚儀	不詳	李膺、郭泰	《後漢書》68
19	袁閔	汝南慎陽	不詳	郭泰	《世說新語》
20	謝甄	汝南召陵	不詳	郭泰	《後漢書》68
21	邊讓	陳留	大族豪右	郭泰	《後漢書》68
22	田盛	陳留	不詳	郭泰	《後漢書》68
23	申屠蟠	陳留外黃	家世貧賤	郭泰	《後漢書》53
24	衛茲	陳留襄邑	大族豪右	郭泰	《三國志》22 注引《郭林宗傳》
25	王允	太原祁	大族豪右 世代仕宦	郭泰	《後漢書》66

26	茅容	陳留	家世貧賤	郭泰	《後漢書》68
27	王柔	太原晉陽	不詳	郭泰	《後漢書》68
28	王澤	太原晉陽	不詳	郭泰	《後漢書》68
29	袁忠	汝南汝陽	世代仕宦	范滂	《後漢書》45
30	殷陶	汝南征羌	不詳	范滂	《後漢書》67
31	黃穆	汝南征羌	不詳	范滂	《後漢書》67
32	王儁	汝南	不詳	范滂、岑暉	《三國志》1 注引《逸士傳》
33	孔褒	魯國	世代仕宦	張儉	《後漢書》70
34	朱穆	南陽宛	三代仕宦	岑暉	《後漢書》43、67
35	曹操	沛國譙	宦官之後 兩代仕宦	張邈	《三國志》7
36	袁紹	汝南汝陽	世代仕宦	張邈	《三國志》7

註：「出身家世」一欄中，若其家族三代以上仕宦者，以「世代仕宦」稱之，以下列表皆同。

(三) 小結

綜合上述，在出身背景方面，黨錮名士的家世雖然不乏世宦之家或是地方大族豪右，但亦有出身貧賤的人物。出自較低階層者憑藉著自身的努力，仍然有機會成為「天下名士」的一員；在行為事蹟方面，黨錮名士的活動雖是以對抗宦官為主要的成名方式，但亦有不少人物並未有與宦官衝突的記載，甚至可能未曾受到兩次黨錮之禍的牽連。「八廚」之一的度尚，早年經歷還跟宦官侯覽頗有淵源。因此，從上述兩個方面來看，由「天下名士」三十五人所組成的黨錮名士群體，其成員結構上有著相當程度的包容性，這些名士並非出自單一階層，其行動目標也不是完全一致，而是多元且複雜的情況；而這樣的情況也能體現在黨錮名士所往來的友人之中。

此外，若觀察當時的人物品評情形，可以發現在社會風氣上，出身貧賤者並不會受到士林輿論的輕視；相反地，有德行、才能如黃憲、郭泰者，甚至會受到朝野名士的關注與賞譽，成為眾人景仰的對象。如此

看來，東漢晚期的「名士」是個能夠向社會各個階層開放的群體。要成為「名士」，不會有出身世宦之家或大族豪右與否的限制，只要擁有相當的德行或才能，能夠受到朝野士人的讚賞，就能成為名士群體的一員。正是因為這樣的開放性，使得黨錮名士並非是一個具有同質性的群體，而是擁有相當程度的異質性——東漢晚期的「名士」成員來自各種階層，活動行為也各有不同，乃是一個具包容性且複雜多元的群體。

第二節 曹魏名士的上層化

（一）曹魏時期的名士結構

進入曹魏時期後，名士群體的成員結構開始出現變化，無論是正始名士或竹林名士，其參與成員之身分背景大多為官宦子弟。仇鹿鳴便認為，以夏侯玄為首的名士圈，包含了大量曹氏貴戚子弟參與其中，是曹魏功臣後裔互相交游的重要網絡。²⁸就此來看，相較於黨錮名士結構的開放性，曹魏時期的名士結構表現出往上階層（即官宦階層）發展的趨勢，即為本節標題所稱的「上層化」。筆者整理曹魏時期正始名士、竹林名士的家世背景，茲列表如表 3-2-1。

表 3-2-1 曹魏（正始、竹林）名士之家世背景

出身背景	名士	人數	比例
曹氏親族或姻親	夏侯玄、何晏、嵇康	3 人	30%
世代仕宦	王弼	1 人	10%
三代仕宦	王戎、阮咸	2 人	20%
兩代仕宦	阮籍、山濤	2 人	20%
不詳	劉伶、向秀	2 人	20%

從上表來看，曹魏時期的名士在「曹氏親族或姻親」方面多達 30%，

²⁸ 仇鹿鳴，〈漢魏時代的河內司馬氏〉，《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74。

佔有相當的比例。其中，夏侯玄出身於譙郡夏侯氏。根據史料記載，曹操之父曹嵩本姓夏侯氏，²⁹因此在曹操起兵之初，除了同姓的曹仁、曹洪之外，夏侯氏的夏侯惇、夏侯淵亦前來相助，可見兩家關係密切。陳壽在為曹操親族人物立傳時，便將夏侯氏與曹氏並於一傳，稱為「諸夏侯曹傳」。陳壽在《三國志》中雖然沒有明說曹操的血緣身世，但這樣的立傳方式也可看出其背後的用心與深意。夏侯玄之父夏侯尚與魏文帝有「布衣之交」，³⁰關係非同一般；而夏侯玄本人則年少知名，弱冠即為散騎黃門侍郎。³¹此職在曹魏多為將相大臣子弟擔任，乃是曹魏政權用來培養新秀人才的職位。³²據此，夏侯尚一族在魏文帝時期便與曹魏皇室關係匪淺，而夏侯玄在魏明帝時期更可說是夏侯氏在曹魏政權的明日之星，前景十分看好。王永平認為，魏晉之際是世族門風轉變的關鍵時期，而夏侯玄的出現及其文化活動，對譙郡夏侯氏而言，具有標誌性的意義。以軍功發跡的夏侯氏，隨著曹氏的發展而其家族地位不斷上升，其子孫雖多從事軍旅，但亦受到上層文化風尚的薰染；其中，夏侯玄本人已有明顯的文化與身份的某種自覺。³³關於這種「文化自覺」，王曉毅指出夏侯玄將儒家的綱常禮教與道家人性自然融為一體。他一方面是清談領袖，宏揚《老子》的學說，鼓吹人性自然，同時又是一個十足的禮法之士。而這正是夏侯玄人格的巨大吸引力，以及他在當時獲得盛譽的重要原因。³⁴如此一來，作為曹氏親族又擁有文化自覺及人格吸引力的

²⁹ 《三國志》，卷1，〈武帝紀〉注引佚名《曹瞞傳》、郭頒《世語》，頁1。

³⁰ 《三國志》，卷9，〈諸夏侯曹傳〉注引王沈《魏書》，頁293。

³¹ 黃惠賢認為，「散騎黃門侍郎」指的是先任散騎侍郎，不久遷任黃門侍郎，是二官的聯稱。此聯稱只出現於魏文帝黃初二年至晉武帝太康中期，集中於魏明帝太和、青龍年間，為一具有時代特徵的官稱。參見黃惠賢，〈曹魏中後期散騎諸官的變化——散騎諸官研究資料之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17，2000，頁11-18。

³² 可考者如華表為太尉華歆之子（黃初二年）、王肅為司空王朗之子（黃初中）、杜恕為尚書僕射杜畿之子（太和中）、夏侯惠為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太和、景初間）。可參見《三國志》，卷13，〈華歆傳〉注引華嶠《譜敘》，頁406。同書，卷13，〈王朗傳附子肅傳〉，頁414。同書，卷16，〈杜畿傳附子恕傳〉，頁498。同書，卷9，〈夏侯淵傳〉注引荀勗《文章敘錄》，頁273。

³³ 王永平，〈夏侯玄之政治活動、思想表現及其與司馬氏之衝突〉，《漢晉間社會階層升降與歷史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301-304。

³⁴ 王曉毅，〈正始名士雙重人格特點及其形成〉，《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夏侯玄，自然能夠成為當時名士群體的領袖人物。

何晏成為曹氏親族的情況則不同於夏侯玄。何晏為漢末大將軍何進之孫，但由於何晏之母尹氏被曹操納為妾室，因此何晏成為曹操的養子，視如己出，因此可以視為曹氏的親族。何晏「少以才秀知名」、³⁵「明惠若神」，³⁶年紀輕輕便展現出其才華，相當受到養父曹操的喜愛。成年後的何晏也具備了學者風範，方詩銘認為，從何晏著《論語集解》並且為《孝經》注述來看，其人對於儒家思想應該具有相當深厚的造詣，同時又宗奉《老子》一書的道家思想，成為「玄學」的創始人。³⁷王曉毅則進一步指出何晏的思想性格是由儒、道兩個鮮明的思想構成：政治態度上的儒家傾向與人生態度上的道家傾向，既追求人性自由，又恪守封建禮教，力求二者的和諧與統一。這種人格心理的雙重化，不僅是以何晏為代表的正始玄學名士，也是爾後魏晉正統玄學人物的基本思想特徵。³⁸因此，學識豐富又能調和儒道思想的何晏與夏侯玄二人，不僅成為了洛陽士子所景仰的對象，在當時的名士群體中，也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

除了夏侯玄、何晏之外，竹林名士中的嵇康之妻為曹魏沛王曹林的孫女長樂亭主，³⁹因此與曹魏宗室關係親近，亦可算是曹氏親族。前章所述嵇康在魏晉之際的境遇，也和他身為曹氏姻親這個特殊身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上述三人，夏侯玄、何晏二人在言行風範、清談學術上，於正始時期的士人之間具有領導性的地位，而嵇康則與阮籍、山濤一同被視為竹林名士中的主要人物。⁴⁰由此可見，曹魏時期的名士群體逐漸上層化的過程中，出自曹氏親族者在當時的名士乃至於士人之間，有著

1989年第4期，頁22。

³⁵ 《三國志》，卷9，〈曹真傳附何晏傳〉，頁292。

³⁶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夙惠第十二〉，頁510。

³⁷ 方詩銘，〈何晏〉，《方詩銘論三國人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226-230。

³⁸ 王曉毅，《王弼評傳附何晏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69。

³⁹ 《嵇氏譜》言：「嵇康妻，（曹）林子之女也。」參見《三國志》，卷20，〈武文世王公傳·武帝子〉注引佚名《嵇氏譜》，頁582。又，荀勗《文章敘錄》載：「康以魏長樂亭主壻遷郎中，拜中散大夫。」可知嵇康之妻為曹操的曾孫女長樂亭主。參見《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上，〈德行第一〉，頁17。

⁴⁰ 何啟民，《竹林七賢研究》，頁12。

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曹魏時期名士群體的「上層化」趨勢，除了反映在核心人物與曹魏皇室有關外，也反映在其他成員的身上——這些人多半為官宦子弟，或地方豪族——家世不詳者，僅有劉伶、向秀二人。關於除了曹魏親族三人外的曹魏名士父祖經歷，茲列表如表 3-2-2。

表 3-2-2 曹魏名士父祖輩任官經歷

序	姓名	父	父官職	祖	祖官職	高祖	高祖官職	典／卷
1	王弼	王業	謁者僕射	王凱	不詳	王謙 漢大將軍長史		《三國志》 28
				王粲	侍中			
2	王戎	王渾	涼州刺史	王雄	幽州刺史			《晉書》43
3	阮咸	阮熙	武都太守	阮瑀	丞相掾			
4	阮籍	阮瑀	丞相掾					《晉書》49
5	山濤	山曜	宛句令					《晉書》43
6	向秀	父祖任官情形不詳						《晉書》49
7	劉伶	父祖任官情形不詳						《晉書》49

在正始名士中，夏侯玄、何晏二人出身曹氏親族，地位尊貴；另一位同樣名列正始名士的王弼雖與曹魏皇室無關，但其出身乃是漢末以來的名人輩出的新興士族——山陽王氏，社會地位亦非同一般。山陽王氏「世為豪族」，⁴¹漢末時王龔為太尉，龔子王暢為黨錮名士「三君」之一，暢孫王粲為「建安七子」之一。由於王粲無後，魏文帝曹丕命王粲族兄之子王業成為繼承人，而王業之子即為王弼。王業既嗣王粲之後，全家遂定居洛陽，因此王弼自幼便生活於洛陽上層士族文化的環境中，⁴²無疑是洛陽上層士族的一員。

出身官宦子弟的還有王戎、阮籍、阮咸。王戎出身瑯邪王氏，祖父王雄為幽州刺史，父親王渾⁴³為涼州刺史，父祖皆任要職。王戎年幼時

⁴¹ 《後漢書》，卷 56，〈王龔傳附子暢傳〉，頁 1819。

⁴² 王曉毅，《王弼評傳附何晏評傳》，頁 184。

⁴³ 魏晉之際有兩個王渾。一個出身太原王氏，為王昶之子；另一個則是出身瑯邪王氏，為王雄之子。

曾至宣武場觀戲，猛獸在前而神色自若，受到魏明帝的讚賞。王戎能出入曹魏宮廷並受明帝青睞，可見他應是生活於洛陽的上層士族圈中。二阮為「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後，阮籍為阮瑀之子，阮咸則為阮瑀之孫。阮瑀與曹氏父子交情深厚，其族兄弟阮武則與曹魏重臣杜恕、王昶頗有往來，⁴⁴可知陳留阮氏亦是曹魏時期洛陽上層士族的一份子。

山濤的情況則較為特別。山濤之父山曜曾任宛句令，為地方小官，且《晉書·山濤傳》言「濤早孤，居貧」，⁴⁵可見山濤的家族雖然在其父輩曾出仕，但不同於王弼、王戎、阮籍、阮咸等生活於洛陽上層士族圈的官宦子弟，早年乃是過著較為貧苦的生活；有學者便認為正是早年這種「孤貧」的背景，使得山濤日後表現出「中和儉素」的性格。⁴⁶然而，關於山濤的家世，還可以從史料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虞預《晉書》載：「（山濤）祖本，郡孝廉。」⁴⁷可知山濤之祖山本為河內郡孝廉。邢義田在〈東漢孝廉的身份背景〉一文中指出「（孝廉）多來自傳經之家，或曾教授經學，……顯示經學、仕宦和家族勢力三者相依相存的關係。」又言「東漢孝廉必習經學」⁴⁸可見曾被舉為孝廉的山本應該有相當程度的經學造詣，而河內山氏可能便是以經學傳家。

接著，若從河內山氏的家族婚姻關係來看，《晉書》載：

（山濤）與宣穆后有中表親。⁴⁹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皋人也。父汪，為粟邑令；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⁵⁰

可知山濤出身的河內懷縣山氏與同郡平皋張氏有姻親關係，而張氏又與

⁴⁴ 王建國，〈魏晉陳留阮氏及其家學家風考論〉，《天中學刊》，19：4，2004，頁 56-57。

⁴⁵ 《晉書》，卷 43，〈山濤傳〉，頁 1223。

⁴⁶ 張谷良，〈試論山濤的政治思想與態度之起由〉，《東華人文學報》，6，2004，頁 114。

⁴⁷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下，〈政事第三〉注引虞預《晉書》，頁 146。

⁴⁸ 邢義田，〈東漢孝廉的身份背景〉，《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301、325。

⁴⁹ 《晉書》，卷 43，〈山濤傳〉，頁 1223。

⁵⁰ 《晉書》，卷 31，〈后妃上·宣穆張皇后〉，頁 948。

同郡溫縣司馬氏聯姻，可見此三家在河內郡的家族地位應該不會相差太遠，堪稱河內郡中地方性的士族，此婚姻網絡則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徵。然而虞預《晉書》又載：

（山濤）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⁵¹

「宣帝」即司馬懿，「景、文」則是指司馬懿之子司馬師、司馬昭兄弟。據此，徐高阮便認為司馬懿此語表現出當時「士大夫中的不同門戶的對立。」⁵²仇鹿鳴則考察河內司馬氏的發展歷程後，認為「隨著司馬氏家族在政治上的日益顯貴……其婚姻圈有了明顯的拓展，曹魏親貴、兩漢名族成了其聯姻的主要對象，而同郡的家族由於司馬氏在政治、社會地位上的落差日益明顯，不再被視為理想的通婚對象，河內舊姻有時甚至受到鄙視與揶揄。」⁵³依據仇氏的觀點，則山濤的「小族」乃是相對於曹魏親貴、兩漢名族而言；在河內郡，曾出現孝廉且婚姻網絡呈現地域特徵的河內山氏，應該仍可稱得上是地方性的士族。

綜上所述，曹魏時期的名士中，除了家世不詳的劉伶、向秀之外，夏侯玄、何晏、嵇康來自曹魏親族新貴；王弼、王戎、阮籍、阮咸則是洛陽上層士族子弟；山濤早年生活雖「孤貧」，但其家世仍可說得上是河內郡的地方士族。據此，則可看出曹魏時期的名士群體出現了「上層化」的傾向，名士成員多半來自當朝親貴或官宦子弟，不同於東漢末黨錮名士群體的多元性。而這樣的「上層化」趨勢，也同樣反映在曹魏名士所往來交遊的友人之中。

（二）洛陽貴公子：曹魏名士的交友圈

曹魏時期，名士成員大多出身於曹魏親族或洛陽上層士族子弟，呈

⁵¹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下，〈政事第三〉注引虞預《晉書》，頁 146。

⁵² 徐高阮，〈山濤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1，1969，頁 89。

⁵³ 仇鹿鳴，〈漢魏時代的河內司馬氏〉，《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頁 57。

現出「上層化」的現象；而這樣的現象同時也出現在曹魏名士的友人圈中。就正始名士而言，當時與夏侯玄、何晏等人所交遊往來者，大多是曹魏政治勢力的新生代、曹魏政權的官宦子弟，被視為「當世俊士」，⁵⁴較知名者如曹操重臣荀彧之子荀彧、「建安七子」之一的應瑒之侄應貞等，筆者考察史籍中正始名士之往來友人得 24 人，茲列表如表 3-2-3。

從表中來看，在正始名士的友人中，官宦子弟計有 18 人，佔了全部的 75%，其中又以兩代仕宦的家庭居多，佔了官宦子弟中的 67%。王曉毅便認為，正始名士及其友人「父輩都是曹魏帝國的新貴」；⁵⁵王蕊則指出他們是「功臣貴戚的子弟」；⁵⁶王永平認為他們是「曹魏政治勢力中的新生代」，⁵⁷可見學界對於曹魏正始名士及其友人的出身階層頗有共識，皆認為他們來自曹魏政權的功臣新貴之家，並非一般百姓家庭。

承上所述，正始名士所往來的友人大多是曹魏官宦子弟，出自「寒微」者僅有鄭沖一人，因此正始名士的交友圈與其結構相同，出現了「上層化」的趨勢。類似的情形也同樣出現在竹林名士的交友圈中。筆者整理史籍中竹林名士所往來之友人，茲列表如表 3-2-4。

⁵⁴ 《三國志》，卷 28，〈諸葛誕傳〉注引郭頒《世語》，頁 769。

⁵⁵ 王曉毅，《王弼評傳附何晏評傳》，頁 83。

⁵⁶ 王蕊，《漢魏名士研究》，頁 178。

⁵⁷ 王永平，〈諸葛誕之活動與琅邪諸葛氏「姓族」形成之關係〉，《漢晉間社會階層升降與歷史變遷》，頁 264。

表 3-2-3 正始名士的交友圈

序	姓名	籍貫	出身家世	友好人物	典／卷
1	陳本	廣陵	兩代仕宦	夏侯玄	《世說新語》5
2	李豐	馮翊	兩代仕宦	夏侯玄	《三國志》9
3	許允	高陽	兩代仕宦	夏侯玄	《三國志》9
4	荀粲	潁川潁陰	世代仕宦	夏侯玄	《三國志》10
5	應貞	汝南	世代仕宦	夏侯玄	《三國志》21
6	李勝	荊州(?)	兩代仕宦	夏侯玄	《三國志》9
7	諸葛誕	琅邪陽都	大族豪右	夏侯玄	《三國志》28
8	鄧颺	南陽	大族豪右	夏侯玄	《三國志》28
9	劉熙	涿郡	兩代仕宦	夏侯玄	《三國志》28
10	孫密	太原	兩代仕宦	夏侯玄	《三國志》28
11	衛烈	陳留襄邑	兩代仕宦	夏侯玄	《三國志》28
12	毋丘儉	河東聞喜	兩代仕宦	夏侯玄	《三國志》28
13	司馬師	河內溫	世代仕宦	夏侯玄、何晏	《晉書》2
14	鄭沖	滎陽開封	起自寒微	何晏	《晉書》33
15	孫邕	不詳	不詳	何晏	《晉書》33
16	曹羲	沛國譙	曹魏宗室	何晏	《晉書》33
17	荀顗	潁川潁陰	世代仕宦	何晏	《晉書》33
18	衛瓘	河東安邑	兩代仕宦	何晏	《晉書》43
19	裴徽	河東聞喜	兩代仕宦	王弼、何晏	《三國志》28
20	鍾會	潁川長社	兩代仕宦	王弼	《三國志》28
21	傅嘏	北地泥陽	三代仕宦	王弼	《三國志》28
22	王黎	高邑	不詳	王弼	《三國志》28
23	荀融	潁川潁陰	世代仕宦	王弼	《三國志》28
24	劉陶	淮南成惠	兩代仕宦	王弼	《三國志》28

表 3-2-4 竹林名士的交友圈

序	姓名	籍貫	出身家世	友好人物	典／卷
1	呂安	東平	兩代仕宦	嵇康、向秀、 山濤	《晉書》43、49
2	呂巽	東平	兩代仕宦	嵇康	《嵇康集》
3	趙至	代郡	士家	嵇康	《晉書》92
4	張邈	鉅鹿	兩代仕宦	嵇康	《三國志》11
5	阮种	陳留尉氏	大族豪右	嵇康	《晉書》52
6	阮侃	陳留尉氏	兩代仕宦	嵇康	《世說新語》19
7	袁準	陳郡扶樂	三代仕宦	嵇康	《晉書》49
8	孫登	汲郡共	不詳	嵇康	《晉書》94
9	郭遐周	不詳	不詳	嵇康	《嵇康集》
10	郭遐叔	不詳	不詳	嵇康	《嵇康集》
11	劉昶	沛國	不詳	阮籍	《晉書》43 《世說新語》24
12	王渾	琅邪臨沂	兩代仕宦	阮籍	《晉書》43
13	和適	汝南西平	兩代仕宦	山濤	《晉書》43
14	鍾會	潁川長社	兩代仕宦	山濤	《晉書》43
15	裴秀	河東聞喜	三代仕宦	山濤	《晉書》43
16	石鑿	樂陵厭次	寒素	山濤	《晉書》43、44
17	郭奕	太原陽曲	世代仕宦	山濤、阮咸	《晉書》45、49
18	李重	江夏鍾武	兩代仕宦	王戎	《晉書》46
19	任愷	樂安博昌	兩代仕宦	向秀	《晉書》45
20	阮脩	陳留尉氏	三代仕宦	阮咸	《晉書》49

首先可以發現，由於劉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⁵⁸在史料中所往來者主要即為竹林名士其餘六人，因此表 3-2-4 中無法列入劉伶在竹林名士外的其他友人。接著從表中來看，竹林名士所往來的友人圈中，出身官宦之家者計有 13 人，約佔 65%，仍佔有相當高的比例。初步看來，

⁵⁸ 《晉書》，卷 49，〈劉伶傳〉，頁 1376。

竹林名士友人圈的「上層化」趨勢，似乎不如正始名士明顯。然而表中家世不詳的四人中，孫登乃是汲郡山中的隱逸之士，嵇康曾與之同遊三年，郭遐周、郭遐叔二人亦是於此時與嵇康結識。⁵⁹因此，此三人雖與嵇康往來友好，但並非在嵇康的生活圈中所結識，而是其特為之的結果，實屬特例。若扣除此三人，嵇康的友人則多為曹魏官宦子弟，如呂安、阮侃、袁準等。其中袁準之父為曹魏功臣袁渙，祖為東漢司徒袁滂，堪稱曹魏新貴子弟的代表之一。如此一來，竹林名士的友人圈事實上亦是以曹魏政權的官宦子弟為大多數，仍表現出「上層化」的趨勢。

整體而言，曹魏時期名士的友人圈 44 人中，有 31 人出身自官宦家庭，約佔 70%，與東漢時期黨錮名士友人圈中世宦之家的比例（約 33%）相較，增加了一倍有餘。就此看來，曹魏時期的名士雖不排斥與出身寒微者如鄭沖、石鑿，或是隱逸者如孫登、郭遐周、郭遐叔為友，但其交友圈仍集中在曹魏政權功臣新貴子弟，或是洛陽上層士人子弟的範圍內，明顯地呈現出「上層化」的情況。

（三）小結

漢晉之際的名士群體，自東漢末到曹魏時期，其結構逐漸發生改變，呈現出從開放多元走向「上層化」的趨勢。

從曹魏名士群體來看，核心成員如夏侯玄、何晏、嵇康皆與曹魏皇室有關，引領著當時的時代風氣；其他成員則多半出身洛陽上層士族，或是曹魏功臣新貴，為兩代以上仕宦之家的子弟，甚者如王弼更是出身於漢魏時期名人輩出的山陽王氏，有著自東漢末以來的家族淵源。與東漢末黨錮名士多元且複雜的出身結構相較，曹魏名士群體的結構逐漸改變，來自曹魏政權上層士族的子弟佔了大多數，成為此時期名士結構的特點。

同樣地，在曹魏名士的交友圈中，也能發現這種「上層化」的趨勢。正始名士、竹林名士的友人們多半亦是曹魏上層士族、功臣新貴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出身官宦家庭。因此曹魏時期名士來往友人的出身結構，

⁵⁹ 何啟民，《竹林七賢研究》，頁 103。

與名士群體自身結構的發展相同，呈現出上層化的情況。

需要注意的是，曹魏名士及其交友圈雖出現「上層化」的傾向，但仍不排斥與出身寒微者或隱逸之士來往，如何晏與「起自寒微」⁶⁰的鄭沖為友、嵇康與隱逸之士孫登同遊等，其結構仍具有部分的開放性，並非完全封閉於上層士族階層之中。司馬氏在逐漸侵奪曹魏政權的過程中，便是同時拉攏具有能力的寒微之士以及具有聲望的高門士族，最後成功取代了曹魏政權。⁶¹

第三節 西晉貴族名士

（一）名門匯集的中朝名士

享譽天下的名士群體歷經東漢末、曹魏時期的變化，其出身背景呈現逐漸向上階層發展的趨勢；到了西晉，名士群體「上層化」的趨勢更加強化，受到輿論讚頌的「中朝名士」皆出身於官宦之家，家族中父祖三代以上在漢晉之際任官者更是不在少數。關於中朝名士之出身背景，茲列表如表 3-3-1。

表 3-3-1 中朝名士之家世背景

出身背景	名士	人數	比例
世代仕宦	王承、阮瞻、衛玠	3 人	37.5%
三代仕宦	裴楷、王衍、庾敳、謝鯤	4 人	50%
兩代仕宦	樂廣	1 人	12.5%

從表中的比例上來看，中朝名士中家族三代以上有仕宦經歷的官宦子弟佔了絕大多數，僅有樂廣一人家族兩代仕宦。可知相較於東漢末與曹魏時期的名士，西晉中朝名士的父祖輩在漢晉之際多有任官，甚至發展為地位顯赫的家族，如河東裴氏、琅邪王氏等。筆者整理中朝名士父祖輩

⁶⁰ 《晉書》，卷 33，〈鄭沖傳〉，頁 991。

⁶¹ 柳春新，〈司馬氏「作家門」的歷史考察〉，《漢末晉初之際政治研究》，頁 189-198。

在漢晉之際的任官經歷，茲列表如表 3-3-2。

表 3-3-2 中朝名士父祖輩任官經歷

序	姓名	父	父官職	祖	祖官職	高祖	高祖官職	典／卷
1	王承	王湛	汝南內史	王祖	魏司空	王澤	漢代郡太守	《晉書》45
2	阮瞻	阮咸	散騎侍郎	阮熙	武都太守	阮瑀	魏丞相掾	《晉書》49
3	衛玠	衛恒	黃門郎	衛瓘	司空	衛覬	魏尚書	《晉書》36
4	裴楷	裴徽	魏冀州刺史	裴茂	漢尚書令			《晉書》35
5	王衍	王乂	平北將軍	王雄	幽州刺史			《晉書》43
6	庾敳	庾峻	侍中	庾道	不仕 ⁶²			《晉書》50
7	謝鯤	謝衡	國子祭酒	謝纘	典農中郎將			《晉書》49
8	樂廣	樂方	參魏征西將軍 夏侯玄軍事					《晉書》43

從表中可以看到，除了樂廣之父樂方為職位較低的夏侯玄參軍外，其餘中朝名士的父祖輩無論在中央或地方多為要員，出將入相。其中王承出身太原王氏、阮瞻出身陳留阮氏、衛玠出身河東衛氏、裴楷出身河東裴氏、王衍出身琅邪王氏，皆為當時的士族名門。可見時至西晉，名士群體的成員來源已縮小為官宦之家與名門貴族所出；從東漢晚期黨錮名士的開放性，經歷曹魏時期正始、竹林名士結構出現「上層化」的趨勢，到了西晉，中朝名士的成員結構則呈現出階層窄化與來源單一化的現象。這樣的現象，或許可稱之為名士群體的「貴族化」。

日本學界自內藤湖南以來，便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中世是「貴族」政治的時代，⁶³其中川勝義雄便指出關於「貴族」的資格有兩點：「一是強大的政治力量，具體來說是擔任中央政府的重要職位，一是在國家事

⁶² 庾道雖不仕，但其兄庾嶷為魏太僕，因此庾敳家世亦可視為三代仕宦。參見《晉書》，卷 50，〈庾峻傳〉，頁 1391。

⁶³ 關於日本學界對於中國中世貴族制的研究，可參見（日）川合安，〈日本的六朝貴族制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回顧與探索——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頁 111-113。

務上，累代都擁有發言權。」⁶⁴渡邊義浩則認為「貴族」具有「世襲性獨佔高官」的屬性。⁶⁵就川勝氏的標準來看，在中朝名士中，王承之祖王昶曾擔任曹魏司空、衛玠之祖衛瓘為晉司空、裴楷官至中書令，其祖裴茂於東漢時擔任過尚書令、王衍官至太尉，族祖王祥為晉太保、庾敳之父庾峻為侍中，此五人無論是父祖或自身皆曾經擔任重要職位，並在國家事務上亦擁有發言權，其家族確實足以堪稱「貴族」。其中，河東裴氏出身的裴楷，以及琅邪王氏出身的王衍，「二族盛於魏晉之世」，⁶⁶可說是名士群體在西晉時期「貴族化」的兩名代表人物。

因此，漢晉之際的名士群體發展至西晉時期，其成員的出身結構已幾乎來自官宦之家，三代以上的仕宦家族更是不在少數，其中如琅邪王氏、河東裴氏等家族歷任中央要職，使得西晉中朝名士出現了「貴族化」的情形——這可以說是曹魏時期名士結構「上層化」現象的進一步延續。中朝名士群體出身官宦家庭，甚至是「貴族」之家，這樣的結構變化也出現在其交友圈之中：中朝名士的友人來自仕宦之家的情況可說是更加地顯著。

（二）名士家族：中朝名士的交友圈

西晉時期的中朝名士群體，出現了成員來源縮小至世宦之家與名門貴族的現象，而這種情況也同樣發生在中朝名士的交友圈中。筆者考察史籍中中朝名士的往來人物得二十五人，茲列表如表 3-3-3。

表 3-3-3 中朝名士的交友圈

序	姓名	籍貫	出身家世	友好人物	典／卷
1	傅祗	北地泥陽	世代仕宦	裴楷	《晉書》35
2	司馬亮	河內溫	西晉宗室	裴楷	《晉書》35

⁶⁴（日）川勝義雄 著，徐谷芄、李濟滄 譯，〈貴族政治的成立〉，《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頁 4。

⁶⁵（日）渡邊義浩 著，王啟發 譯，〈西晉的五等爵制與貴族制的確立〉，《第三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 176。

⁶⁶《晉書》，卷 23，〈裴秀傳附從弟楷傳〉，頁 1052。

3	王渾	太原晉陽	三代仕宦	裴楷	《晉書》35
4	衛瓘	河東安邑	兩代仕宦	裴楷 樂廣	《晉書》35、43
5	楊準	弘農華陰	世代仕宦	樂廣	《晉書》43
6	楊髦	弘農華陰	世代仕宦	樂廣	《世說新語》9
7	裴頠	河東聞喜	世代仕宦	樂廣	《晉書》35
8	諸葛玄	琅邪	兩代仕宦	王衍	《世說新語》4
9	劉渙	沛國	不詳	王衍	《世說新語》8
10	王敦	琅邪臨沂	世代仕宦	王衍	《晉書》43
11	王澄	琅邪臨沂	三代仕宦	王衍 衛玠	《晉書》36、43
12	阮脩	陳留尉氏	三代仕宦	王衍 衛玠	《晉書》43
13	光逸	樂安	小吏出身	王衍	《晉書》49
14	胡毋輔之	泰山奉高	三代仕宦	王衍	《晉書》49
15	郭象	河南	不詳	王衍 庾數	《晉書》50
16	溫嶠	太原祁	世代仕宦	庾數	《晉書》50、67
17	司馬越	河內溫	西晉宗室	王承 阮瞻	《晉書》49、75
18	山簡	河內懷	三代仕宦	衛玠	《晉書》36
19	嵇紹	譙國銍	三代仕宦	謝鯤	《晉書》49
20	畢卓	新蔡銅陽	兩代仕宦	謝鯤	《晉書》49
21	王尼	成陽 (河內?)	兵家子	謝鯤	《晉書》49
22	阮放	陳留尉氏	三代仕宦	謝鯤	《晉書》49
23	阮孚	陳留尉氏	世代仕宦	謝鯤	《晉書》49
24	羊曼	泰山南城	世代仕宦	謝鯤	《晉書》49
25	桓彝	譙國龍亢	三代仕宦	謝鯤	《晉書》49、74

據此表，在中朝名士的往來交友的人物中，兩代仕宦者約有 12.5%、三代仕宦者約有 33%、世代仕宦者亦約有 33%。因此在中朝名士的交友圈中，出身於官宦之家的人物高達 78.5%，將近八成；其中亦不乏名門貴族，如北地傅氏、河東衛氏、弘農楊氏、河東裴氏、琅邪王氏、陳留阮氏、泰山羊氏等。可見名士群體及其交友圈的出身結構在歷經曹魏時期向上階層發展後，逐漸窄化，受到天下輿論稱頌的「名士」不再是來自各階層的人物，而成為官宦之家或名門貴族的所有物。

進一步來看，在中朝名士及其往來的交友圈中，有許多人物是曹魏時期諸名士或其交友圈的親屬及後裔。如裴楷之父裴徽、從兄裴秀是王弼、山濤的好友；衛玠之祖是與何晏親善的衛瓘；阮瞻、阮脩、阮放、阮孚為阮籍之同族子弟，且與王衍、謝鯤關係密切，多有往來；⁶⁷山濤之子山簡與衛玠為友，嵇康之子嵇紹與謝鯤往來；而與王弼、裴楷相友的傅嘏、傅祗則同為北地泥陽傅氏等。可見中朝名士群體及其往來友人與曹魏時期的正始、竹林名士或是其友人圈有著一定程度的傳承與連結，其中如河東衛氏、陳留阮氏、琅邪王氏等部分名門世家，甚至可以說隱然形成了「名士家族」。

「名士家族」的特色，「是家門父祖兄弟之間的相互讚譽。……西晉士人一改前代舉賢避親的禁忌，家門父祖兄弟之間都互相讚譽，極力營造一種名門望族的氛圍。」⁶⁸如琅邪王氏中，身為竹林名士的王戎，曾經讚揚過自己的堂弟王衍：

王戎曰：「太尉（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⁶⁹

而作為中朝名士的王衍，也曾公開讚譽自己的手足：

（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王）澄及王敦、

⁶⁷ 王建國，〈魏晉陳留阮氏及其家學家風考論〉，《天中學刊》，19：4，2004，頁 60。

⁶⁸ 張愛波、徐傳武，〈「清談」與中朝名士〉，《理論學刊》，2007 年第 4 期，頁 106。

⁶⁹ 《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賞譽第八上〉，頁 378。

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⁷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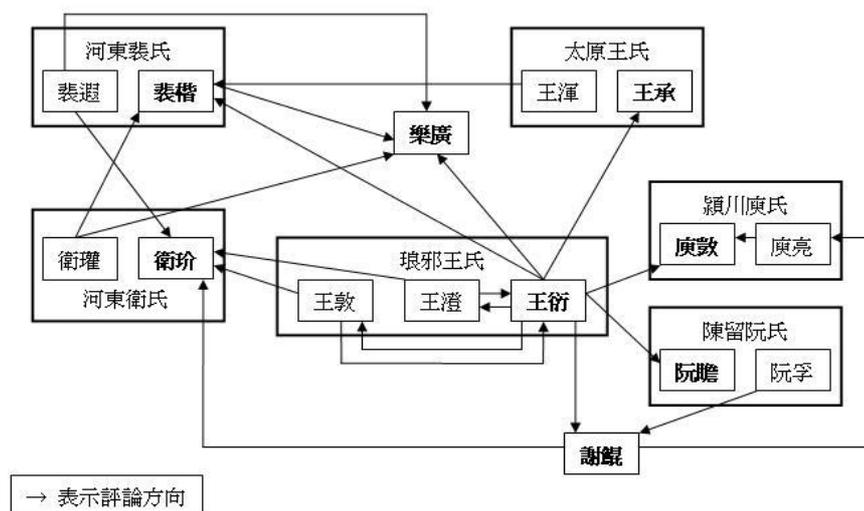
阿平即是王澄，為王衍之弟；處仲則是王敦，為王衍族弟，兩人皆為琅邪王氏族人。王戎、王衍身列名士之林，在自身家族中「通過相互稱譽，由單個名士造就出一幫名士」，⁷¹不僅提升了自己的名氣，也提升了家族的聲望。此外，陳留阮氏中，阮籍、阮咸為竹林名士、阮瞻則為中朝名士，阮籍堂侄阮脩與衛玠、王衍友好；阮籍族弟阮放、侄孫阮孚則與謝鯤關係密切。魏晉時期的陳留阮氏一族與當時的名士群體息息相關，也堪稱「名士家族」的代表之一。

事實上，除了「名士家族」內部族人的互相賞譽外，西晉幾個「名士家族」之間，也存在著彼此讚揚、品評的情形。筆者嘗試以中朝名士為中心，繪製西晉時期名士與其友人之間的品評關係，如圖 3-3-1。

⁷⁰ 《晉書》，卷 43，〈王戎傳附從弟澄傳〉，頁 1239。

⁷¹ 張愛波、徐傳武，〈「清談」與中朝名士〉，《理論學刊》，2007 年第 4 期，頁 107。

圖 3-3-1 中朝名士品評關係



圖中以粗體字呈現者為中朝名士。從此圖中可以看到，中朝名士大多來自名門望族。根據田餘慶的研究，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屬於具有「舊族淵源」的家族；潁川庾氏以及謝鯤所屬的陳郡謝氏，則是魏晉時期的「新出門戶」。⁷²至於河東裴氏、河東衛氏皆為「當代軒冕」，地位顯赫，乃是西晉時期的「勢族」。⁷³這幾個「名士家族」之間互相品評，提高彼此家族的聲望，更進一步鞏固了自身家族的社會地位。

綜上所述，在西晉中朝名士所往來的友人之中，有將近八成的比例來自官宦之家，家族三代以上仕宦者更是不在少數。可見西晉時期名士群體「貴族化」的現象，在其交友圈中也同樣可以發現。這些出身貴族的名士互相賞譽對方及其家族成員，品評對象集中於幾個家族的結果，便是「名士家族」的出現——此現象可說是漢晉名士群體發展至西晉的一大特色。

⁷² 田餘慶，〈後論〉，《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271-272。

⁷³ 「勢族」是指當朝掌權人物之家族。參見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 55-57。

(三) 小結

從東漢末的開放性，經歷了曹魏時期的「上層化」，漢晉之際名士群體的結構到了西晉再次出現變化，而這次的變化可以說是曹魏時期名士結構「上層化」的延續——西晉中朝名士不僅出身官宦之家，部分人物如裴楷、王衍、王承等，其父祖或家族成員歷任中央要職，並在國家事務上能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因而成為「貴族」，使得西晉時的名士結構出現了「貴族化」的現象。而這也是本節標題「西晉貴族名士」的意涵所在。

接著，從中朝名士的交友圈來看，其往來友人有將近八成為官宦子弟，家族三代以上任官者約有六成，且有不少人出身同樣歷任中央要員的名族，如弘農楊氏、北地傅氏、泰山羊氏等，顯示中朝名士的交友圈與其自身結構相同，都出現了「貴族化」的情況。此外，中朝名士的友人圈與曹魏時期名士群體的友人圈有著相當程度的關連性，部分名士本身或是其友人來自同一個家族，且家族成員之間互相品評、賞譽，進而提升家族整體的聲望，形成「名士家族」。這樣的「名士家族」可以王戎、王衍出身的琅邪王氏，以及阮籍、阮咸、阮瞻出身的陳留阮氏作為代表。「名士家族」之間又會對彼此的成員品評、賞譽，如此便進一步鞏固了這些名門貴族的社會地位。

第四節 結語

漢晉之際的社會與政治的劇烈變動，使得此時期的名士結構也出現了很大的轉變。學者孫明君曾注意到此現象，並指出「同樣是名士，漢末名士並不看重家庭出身，而兩晉名士特別講究門第。……兩漢社會是一個以『天下士』為中心的社會，和個人出身於什麼家族沒有直接關係。而兩晉時代則是一個以『家族士』為中心的社會，活躍在這個時代的大名士無不出身於門閥士族之家。」⁷⁴可惜孫氏並沒有提出進一步的佐證，因此本章所呈現的內容，便是對孫氏觀點的進一步闡述。

⁷⁴ 孫明君，〈漢晉士族的發展歷程〉，《文史知識》，2009年第8期，頁23-24。

東漢末年，黨錮名士群體的出身結構複雜而多元，從外戚出身的竇武、家世冠族的羊陟、仗義任俠的張邈，到家世貧賤的郭泰，無論貧富貴賤，都能因學術或行為而成為受到賞譽的「天下名士」之一員。此外，黨錮名士雖稱「清流」，但家世背景有污點的岑暉、與宦官侯覽有關連的度尚，皆能以其在經學上的努力獲得認同，因而躋身黨錮名士之列。若從黨錮名士的交友與賞譽來看，其交友不侷限於固定階層，不問家世；對有才者的賞譽也不因出身背景而有所增減，牛醫之子黃憲、家世貧賤的郭泰皆是當時黨錮名士與其友人所欣賞重視的對象。因此，東漢末年的名士群體對家世出身並不重視，其組成乃是具有包容性且複雜多元的結構。

曹魏時期，名士群體結構已出現變化，無論是正始名士或竹林名士，其核心成員如夏侯玄、何晏、嵇康皆與曹魏皇室有關，其他成員則多半為曹魏政權的官宦子弟——即洛陽上層士族。因此曹魏時期的名士結構，出現了「上層化」的趨勢，其成員大多為曹魏政權的上層人物或士族。這樣的「上層化」現象，也同樣出現在曹魏名士的交友圈中。與曹魏名士往來的友人大多是官宦子弟，可說是一批「洛陽貴公子」，其父輩多為曹魏政權的功臣新貴，自身則是曹魏政權的新生代，前途不可限量。因此，在曹魏時期，不論是名士群體本身，或是其往來交遊的友人，很大一部份是出身自曹魏政權的官宦之家，與東漢末年名士群體的開放性截然不同，呈現出「上層化」的傾向。

到了西晉，名士群體結構在曹魏時期「上層化」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貴族化」的情況。西晉中朝名士已不僅僅是出身於官宦之家，甚至是來自河東裴氏、琅邪王氏這種家族成員歷任中央要職的「貴族」之家；名士成員的家世縮小為官宦家庭與名門貴族，來源逐漸單一化。而這樣的現象在中朝名士的交友圈中更為顯著，在中朝名士往來交遊的人物中，將近八成是官宦家庭的子弟，家族三代以上仕宦者更是不在少數。這些家族多半是漢魏以來的仕宦之家，與曹魏時期的正始、竹林名士亦多有來往、賞譽，形成了如琅邪王氏、陳留阮氏這樣家族中既出名士，又與名士群體關係密切的「名士家族」。「名士家族」彼此之間互相稱頌、賞譽，不僅提升了家族的聲望，也能維持其社會地位；

出身貧賤又能受到名士群體或其友人圈欣賞讚譽者，在西晉時期已經幾乎是看不到了。

綜上所述，漢晉名士群體結構自東漢末到西晉初，經歷了從多元性到「上層化」，最後走向「貴族化」的轉變，其成員出身逐漸窄化、單一化，甚至隱約有「非貴族不得為名士」的傾向。如此劇烈的轉變，理應有其原因，下章要探討的，便是漢晉名士結構轉變的幾個可能因素。

第四章 漢晉時期名士結構轉變的因素

前章論述了名士群體在漢晉之際時，無論是在其組成結構或交友圈結構，都出現了從東漢末的多元、開放走向西晉初逐漸「貴族化」的趨勢。這種趨勢的出現，必然有其內在及外在的因素。本章欲從漢晉時期思想與士風的改變、人物品評圈的內縮，以及九品官人法的保障這三個方面，探討漢晉之際名士群體結構轉變的可能原因。

第一節 思想與士風的改變

關於漢晉時期士人思想的改變，前輩學者多有留意，如余英時在〈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一文中，認為「東漢中葉以後儒學之發展，自馬（融）、鄭（玄）以至荊州，皆以鄙章句之煩瑣而重經典之本義，為其間一貫線索。其流變所及則漸啟捨離具體事象而求根本原理之風，正始玄音乃承之而起，此學術思想將變之候也。……故東漢學術自中葉以降，下迄魏晉玄學之興，實用之意味日淡，而滿足內心要求之色彩日濃。」¹何啟民則認為曹操破壞了漢代的經學傳統，使漢魏時期的學術思想獲得解放，「前此數百年來在獨尊儒術政策的陰影下，諸子之學不過是一道暗流，而今得以重見天日。」²據此，可知在東漢末的戰亂打破了漢代經學獨尊的局面，使得諸子之學再次興起，士人對新思想的探索成為一股熱潮，最後醞釀了玄學的出現；當漢晉之際的名士大力提倡玄風之時，其價值觀也從漢代的重經學轉為魏晉時期貴玄談。³

¹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287-288。

² 何啟民，〈漢晉變局中的中原士風〉，《中古門第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78），頁 14。

³ 孔毅，〈漢晉名士價值觀念的演變〉，《齊魯學刊》，1995 年第 2 期，頁 60。

若從史料中來看，確實能夠從漢晉名士群體的學術成就中，看到漢晉之際時學術思潮的轉變趨勢。在東漢末，黨錮名士大多通讀經學，無論其學問來自家學或太學，主要都是以儒家經學為主。如竇武「少以經行著稱」⁴、劉淑「少學明五經」⁵、劉祐「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⁶、魏朗「詣太學受五經」⁷、蔡衍「少明經講授」⁸、岑晷「詣太學受業」⁹、孔昱「少習家學」¹⁰、苑康「少受業太學」¹¹、度尚「通《京氏易》、《古文尚書》」。¹²顯然嫻熟經學對於黨錮名士來說，是他們成名的條件之一。然而到了曹魏時期，正始名士開始偏好《老子》之學，如何晏「好老莊言」¹³，且數次與裴徽「共說《老》、《莊》及《易》」¹⁴、王弼「好老氏」。¹⁵而竹林名士則是在《老子》之外，對《莊子》也產生了興趣，如阮籍「博覽群籍，尤好《老》、《莊》」¹⁶、嵇康「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¹⁷、山濤「性好《莊》、《老》」¹⁸、向秀「雅好《老》、《莊》之學」。¹⁹可見到了曹魏時期，正始、竹林名士已不再以經學為重，他們所關注的學術思想，乃是在《老》、《莊》之學。最後，西晉時的中朝名士承襲曹魏名士的思潮，對《易》、《老》、《莊》三玄的

⁴ 《後漢書》，卷 69，〈竇武傳〉，頁 2239。

⁵ 《後漢書》，卷 67，〈黨錮·劉淑傳〉，頁 2190。

⁶ 《後漢書》，卷 67，〈黨錮·劉祐傳〉注引謝承《後漢書》，頁 2199。

⁷ 《後漢書》，卷 67，〈黨錮·魏朗傳〉，頁 2201。

⁸ 《後漢書》，卷 67，〈黨錮·蔡衍傳〉，頁 2208。

⁹ 《後漢書》，卷 67，〈黨錮·岑晷傳〉，頁 2212。

¹⁰ 《後漢書》，卷 67，〈黨錮·孔昱傳〉，頁 2213。

¹¹ 《後漢書》，卷 67，〈黨錮·苑康傳〉，頁 2214。

¹² 《後漢書》，卷 38，〈度尚傳〉注引司馬彪《續漢書》，頁 1284。

¹³ 《三國志》，卷 9，〈曹真傳附何晏傳〉，頁 292。

¹⁴ 《三國志》，卷 29，〈方技·管輅傳〉注引管辰《輅別傳》，頁 820。

¹⁵ 《三國志》，卷 28，〈鍾會傳附王弼傳〉注引何劭《王弼傳》，頁 795。

¹⁶ 《晉書》，卷 49，〈阮籍傳〉，頁 1359。

¹⁷ 《晉書》，卷 49，〈嵇康傳〉，頁 1369。

¹⁸ 《晉書》，卷 43，〈山濤傳〉，頁 1223。

¹⁹ 《晉書》，卷 49，〈向秀傳〉，頁 1374。

偏好則因人而異。如裴楷「尤精《老》、《易》」²⁰、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²¹、謝鯤「好《老》、《易》」²²、庾敳「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²³。從上述的情況來看，漢晉之際學術思潮的改變，也同樣反應在漢晉之際名士成員的學術喜好上；而漢晉名士之所以受到時人注目、景仰，有部分原因便是由於他們是當時思潮的引領者，進而在士人之間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然而，漢晉之際的學術思想及風氣雖然由經學轉向玄學，但這股玄風卻無法吹向平民百姓，只能限縮於上層士族之間，導致玄學名士多半出身上層士族，難以見到家世貧賤，出身寒素的人物。為何平民出身的知識份子無法接受玄學思潮？原因在於魏晉太學承襲漢代傳統，教授的課程乃是以傳統經學為主，而並非玄學。

東漢末年，太學因戰亂而逐漸荒廢，直至曹操、曹丕父子掌權後，才開始重振教育。曹魏大臣高柔曾說：

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陳為務，遂使儒林之群，幽隱而不顯。太祖（曹操）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曹丕）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²⁴

根據高柔所言，曹操先成立郡縣學官，曹丕即位後才復立太學。曹丕復立太學的時間是在黃初五年（224年）：

²⁰ 《晉書》，卷 35，〈裴秀傳附從弟楷傳〉，頁 1047。

²¹ 《晉書》，卷 43，〈王戎傳附從弟衍傳〉，頁 1236。

²² 《晉書》，卷 49，〈謝鯤傳〉，頁 1377。

²³ 《晉書》，卷 50，〈庾峻傳附子敳傳〉，頁 1395。

²⁴ 《三國志》，卷 24，〈高柔傳〉，頁 685。

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²⁵

據此可知曹丕所立的太學仍以五經為主要的傳授科目。然而曹魏時期的太學生素質良莠不齊，造成太學成效不彰，引起了曹魏大臣的批判。如劉靖曾上疏道：

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²⁶

曹魏太學の入學資格沒有嚴格限制，²⁷太學生來源複雜，既有官家子弟，也有民間學子，²⁸結果形成了「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竈竦，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²⁹的情況。出身平民的太學生只是為了避役而無心學習，在經學的素養上沒有成效，無法進一步入朝為官，自然難以接觸到上層士族所流行的玄學思潮；即使是魏晉時頗為盛行的私學，³⁰亦是以儒家經典為其主要的教育內容，³¹一般平民幾乎沒有學習玄學的機會。然而上層士族子弟的情形則有所不同，即使他們不入太學，也有其家學可供學習，如琅邪王氏以《孝經》傳家，³²弘農楊氏世習《歐陽尚書》³³等，自有儒學傳統，

²⁵ 《三國志》，卷2，〈文帝紀〉，頁84。

²⁶ 《三國志》，卷15，〈劉馥傳附子靖傳〉，頁464。

²⁷ 李旭傑、馬琳，〈曹魏教育平民化現象探析〉，《青年文學家》，2011年第24期，頁112。

²⁸ 皮朝霞，〈曹魏高等教育的擴張與沉淪〉，《現代大學教育》，2007年第4期，頁30。

²⁹ 《三國志》，卷13，〈王朗傳附子肅傳〉注引魚豢《魏略》，頁420-421。

³⁰ 楊承彬，〈魏晉教育制度研究〉，收入於楊亮功等著，《中國教育史研究》（台北：漢苑出版社，1977），頁152。

³¹ 毛禮銳、沈灌群主編，〈魏晉南北朝的教育〉，《中國教育通史·第二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頁334-335。

³² 王汝濤，〈隋、唐以前琅邪王氏興衰回顧〉，《琅邪王氏考信錄》（北京：群言出版社，

因此並不在意太學的興衰；³⁴此外，由於玄學思潮而盛行的「談坐」，也成為上層士族子弟接受教育的場所。何啟民便認為，在「談坐」的過程中，除了主、客之外，「談坐中其他大多數人，不僅是抱著欣賞的心情，且亦懷著學習的態度」，³⁵使得上層士族子弟能夠沾染玄風，培養玄學素養，而這也是一般平民或太學生較難以參與的學習場合。

綜上所述，漢晉之際由儒轉玄的學術思潮與風氣，造成了名士群體結構發生改變：東漢末名士多以經學通才成名，³⁶不擅學術者亦能以任俠活動而成為名士，如「八廚」的張邈、胡母班等人。然而，在曹魏時期，學術思想逐漸走向玄學，高門士族舉行清談活動、鑽研玄學，「談坐」的場合成為士族子弟學習的場所，而一般平民或太學生卻沒有接觸玄學的管道，無法沾染玄風。玄學成了魏晉名士揚名的必要條件，但非士族出身者卻沒有學習玄學的機會，因此造成「名士」逐漸成為上層階級的所有物，其成員難以再見到出身貧寒的人物，其結構也因而走向了「上層化」、「貴族化」的趨勢。

第二節 人物品評圈的內縮

從上章各時期名士組成結構來看，從東漢末到西晉初，名士群體及其友人圈的組成呈現出逐漸縮小於上層士族或官宦子弟，甚至是某些特定家族，如琅邪王氏、陳留阮氏的情況；事實上，各時期名士的品評情形，也出現了這種逐漸窄化的現象。劉增貴認為，東漢士人在經歷董卓之亂後「鄉邑秩序破壞，社會基礎既不存，其人物評論也就失去社會影響力，僅成朝士薦才、談論之活動。……漢末廣泛流行於社會上的人物

2007)，頁 179。

³³ 《後漢書》，卷 54，〈楊震傳〉，頁 1759。

³⁴ 胡克森，〈西晉國子學建立原因初探〉，《晉陽學刊》，2003 年第 6 期，頁 61。

³⁵ 何啟民，〈漢晉變局中的中原士風〉，《中古門第論集》，頁 20。

³⁶ 劉增貴，〈論後漢末的人物評論風氣〉，《成功大學歷史學報》，10，1983，頁 194-195。

評論風氣於是轉衰，退縮於在朝貴族之間，而其內容也產生轉變。」³⁷劉氏的意見十分值得重視，不僅點出了評論轉衰的原因，還直指人物評論退縮於「在朝貴族」之間。

在東漢末，士人對人物的品評並不受限於被評者的身份，而是注重其才能。川勝義雄即認為「儘管當時的鄉論易受掌控鄉邑的豪族操縱，但鄉人基本上卻是傾向於支持賢者、有德者，……參預鄉邑社會鄉論者遠遠超越了階層之差。」³⁸因此，東漢末的人物品評重視的不是身份地位，而是當事人的德行、才能。如前章所提到的黃憲、郭泰二人，雖然家世貧賤，但仍能受到時人的賞譽和注目。此外，受到鄉里品評而獲得仕進機會的士人，亦會回過頭來品評家鄉的傑出人物，劉增貴便指出「同鄉士人同仕同舉，形成地域生活圈，在離鄉出仕後也常相互援引，甚至形成政治集團。」³⁹以汝南、潁川出身之人物為核心的黨錮名士，便相當能體現這種同鄉，甚至同郡士人互相援引的情況。

然而，隨著東漢末的戰爭動亂愈演愈烈，士人被迫離開鄉里，紛紛流亡到相對安定的地區以求自保。如荀彧：

（荀彧）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至冀州。……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⁴⁰

當時的冀州是許多中原士人的避難之所，袁紹手下謀士如辛毗、荀諝、

³⁷ 劉增貴，〈論後漢末的人物評論風氣〉，《成功大學歷史學報》，10，1983，頁182。

³⁸ （日）川勝義雄著，徐谷芄、李濟滄譯，〈魏、西晉的貴族層與鄉論〉，《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頁44。

³⁹ 劉增貴，〈漢魏士人同鄉關係考論（下）〉，《大陸雜誌》，84：2，1992，頁39。

⁴⁰ 《三國志》，卷10，〈荀彧傳〉，頁308。

郭圖等人皆為潁川人，出身汝南的袁紹亦積極招徠同郡士人：「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⁴¹可見冀州是東漢末遷徙流亡士人的集散地之一。除了冀州外，位於南方因而幾乎不受董卓之亂影響的荊州，更是接納了大批從中原南遷的士人，其中較知名者如：

- (1) 王粲。「山陽高平人也。……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⁴²
- (2) 和洽。「汝南西平人也。……與親舊俱南從（劉）表。」⁴³
- (3) 杜襲。「潁川定陵人也。……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⁴⁴
- (4) 趙儼。「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⁴⁵
- (5) 裴潛。「河東聞喜人也。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⁴⁶
- (6) 司馬芝。「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⁴⁷

由此可見荊州確實成為東漢末中原士人的避難場所，流亡士人來自東漢帝國的各個地區。不過上述諸人並未久留荊州，而是在曹操平定北方亂事及南下荊州時，紛紛回歸鄉里並且進入曹操政權中任職；唐長孺便認為「對於他們，歸朝，仕州郡，還鄉完全一致」，⁴⁸乃是這些流亡士人不願長留荊州的原因。然而當他們回歸鄉里時，其故鄉早已殘破，鄉人四散，不復以往。以潁川郡為例，前引〈荀彧傳〉中提到潁川鄉人「多見殺略」，能舉族遷徙的多半是當地豪族，因此當潁川郡逐漸安定後，能夠受到品評、舉薦的，也往往是這些回歸鄉里的豪族。從荀彧舉薦給曹操的人才中，便可以見到上述先是逃離故里，之後再回歸的人物：

⁴¹ 《三國志》，卷 23，〈和洽傳〉，頁 655。

⁴² 《三國志》，卷 21，〈王粲傳〉，頁 597-598。

⁴³ 《三國志》，卷 23，〈和洽傳〉，頁 655。

⁴⁴ 《三國志》，卷 23，〈杜襲傳〉，頁 664-665。

⁴⁵ 《三國志》，卷 23，〈趙儼傳〉，頁 668。

⁴⁶ 《三國志》，卷 23，〈裴潛傳〉，頁 671。

⁴⁷ 《三國志》，卷 12，〈司馬芝傳〉，頁 386。

⁴⁸ 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 43。

（荀彧）前後所舉者，……及引致當世知名郝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⁴⁹

杜襲、辛毗、趙儼三人同為潁川人，分別逃往荊州和冀州，回歸鄉里後受到同郡人荀彧的推薦而任職於曹魏，後來皆成為曹魏政權的上層骨幹。⁵⁰如此一來，便可以發現東漢在經歷董卓之亂後，同郡士人在品評、推舉人物時已失去較為廣泛的選擇對象，只能從有能力逃離鄉里的豪族中做選擇，造成品評圈愈趨狹隘。川勝義雄認為，由於基層（也就是縣、鄉等鄉邑社會）在長期的戰亂中受到嚴重破壞，加上處於上層鄉論圈的士人構成了新政府的重要組成人員，因此這種「上層游離於基層之外，開始獨立運轉的傾向」日趨明顯，⁵¹最後的結果便是前引劉增貴文所說的，人物評論「退縮於在朝貴族之間」；而受到時人評論、賞譽的名士，其出身結構的開放性也縮小，難以見到家世貧賤、出身底層的人物。

這樣的轉折在曹魏明帝時已明顯出現——與東漢末名士相似，擁有品題名號的「四窗八達」等浮華士人，大多便是由曹魏大臣的子弟所組成。史載「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⁵²可見他們彼此之間確實有賞譽、品評的行為，與東漢末的風氣相似，但夏侯玄出身與曹魏皇室關係密切的夏侯氏；諸葛誕、鄧颺則為大族豪右，三人出身家世皆非一般平民；此外，還有劉熙、孫密、衛烈三人才能雖不比「四窗八達」，但「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⁵³很顯然地，曹魏浮華士人雖有意效仿東漢末士人相互品題，塑造名士的風氣，但其品題的對象與原因已與東漢末不同。與鄉里評論失去連結的曹

⁴⁹ 《三國志》，卷 10，〈荀彧傳〉注引《彧別傳》，頁 318。

⁵⁰ 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 44。

⁵¹ （日）川勝義雄 著，徐谷芄、李濟滄 譯，〈魏、西晉的貴族層與鄉論〉，《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頁 47。

⁵² 《三國志》，卷 28，〈諸葛誕傳〉注引《世語》，頁 769。

⁵³ 《三國志》，卷 28，〈諸葛誕傳〉注引《世語》，頁 769。

魏士人，看重的竟是品評人物的家世，而非其德行；劉熙、孫密、衛烈三人之父由於擔任中央要職的中書監與吏部尚書，因此得以參與夏侯玄等人的標榜活動，這種「以父居勢位」而獲得品評的情況，在東漢末幾乎是看不見的。可見這種人物品評對象的內縮與窄化，確實影響了名士與其友人圈組成結構的改變。

在曹魏政權中，這種「內縮的人物品評」，使得其功臣子弟得到選用、仕進的機會，⁵⁴如應貞為「建安七子」之一應瑒之侄，受到夏侯玄的賞識後「舉高第，歷顯位」⁵⁵；阮籍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獲得王昶的嘆賞後被太尉蔣濟徵辟，後任尚書郎。⁵⁶曹魏士族、官宦之家在人物品評時不再重視鄉邑裡具有德行、才能的人物，反而聚焦於彼此家族中的後進子弟，相互提攜，在上層士族或仕宦家庭中形成循環，便出現了名士結構「上層化」的趨勢。到了西晉，這種趨勢更為強化，在第三章中所提到的「名士家族」便是因此種風氣而產生，也進一步造成西晉時期名士結構「貴族化」的現象。岡村繁在探討文學評論風氣的發展時，也提到了這種「貴族性」。岡村氏認為，「後漢末期主要興起流行於民間人士中的人物評論之風，經由孔融而轉入宮廷，急遽變化呈現為貴族性、閑暇性的談論。」⁵⁷名士結構的「上層化」與「貴族化」，便是這種具有「貴族性」的人物品評所帶來的結果。

綜上所述，在東漢末原本不問階層、出身的人物品評風氣，在戰亂造成鄉里殘破後，無法再從鄉里中推舉出出身貧寒的有才人物；殘存下來的士人即使推舉同郡人物，對象也多半是有能力避亂的大族豪右，並進一步成為新政權的功臣。在這種情況下，東漢末以來的人物評論對象逐漸窄化，內縮在同一政權的士族或官宦之家；而這些家族相互提拔彼

⁵⁴ 黃少英，《魏晉人物品題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11。

⁵⁵ 《三國志》，卷21，〈王粲傳附應璩傳〉注引荀勗《文章敘錄》，頁604。

⁵⁶ 《三國志》，卷21，〈王粲傳附阮瑀傳〉注引孫盛《魏氏春秋》，頁604。

⁵⁷ （日）岡村繁 著，陸曉光 譯，〈後漢末期的評論風氣〉，《岡村繁全集·第三卷·漢魏六朝の思想和文學》，頁159。

此的後進子弟，使得人物賞譽集中於上階層士族之中，導致名士結構的「上層化」與「貴族化」。如此一來，漢晉之際人物評論風氣內縮，亦有可能是「名士」成為高門貴族之所有物的原因。

第三節 九品官人法的保障

漢代的鄉邑社會在東漢末飽經戰亂，鄉里殘破，「鄉舉里選」的人才選拔方式受到破壞，造成東漢末選用人才時出現困難。如鄭欽仁即認為「因地方之破壞，人物之遷徙，建立在地方自治體的「鄉舉里選」之選舉制無法施行，故有創造新制之必要。」⁵⁸在這種背景條件下所產生的新制，便是曹魏時期所制訂的「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制定於魏文帝曹丕即位前的延康元年（220年），乃是由尚書陳羣所創立，其運作過程大致如下：在選舉作業中，郡中正官所訂之品（稱「鄉品」）送州之大中正，⁵⁹經評定之後再送中央之司徒府，司徒府所決定者為最後決定之鄉品。⁶⁰司徒府將人事資料送到另一職官系統之尚書省中的吏部尚書，由該機構依鄉品等資料，授給實官，官有「官品」。⁶¹中正在評定人物的標準有三項：簿世、輩、目；「簿世」是指被評者的家世資料，「輩」是指中正官比較郡內士人德行、才能後，列為幾個層次，「目」則是個人行狀，對被評者的道德、能力做出具體

⁵⁸ 鄭欽仁，〈九品官人法——六朝的選舉制度〉，《中國文化新論：立國的宏規》（台北：聯經，1982），頁219。

⁵⁹ 九品官人法初創時有郡中正而無州大中正。州大中正乃是司馬懿於嘉平元年（294年）所設立。參見吳慧蓮，〈九品官人法制定的原因及背景〉，〈九品官人法——六朝時期的選任制度〉（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頁34-54。

⁶⁰ 鄉品分為九品。渡邊義浩認為，這與漢代董仲舒學派所創立的「性三品說」的進一步發展有關。參見（日）渡邊義浩，〈九品中正制度與性三品說〉，《新哲學》，8，2008，頁163-175。

⁶¹ 鄭欽仁，〈九品官人法——六朝的選舉制度〉，《中國文化新論：立國的宏規》，頁223。

的描述。⁶²事實上，九品官人法重視「人物品評」的這個特色乃是承襲東漢末以來的風氣，只是在曹魏時收歸至中央掌控。唐長孺便認為，九品官人法保留了鄉閭評定的特色，又讓士人的選舉權轉為政府所有。⁶³然而九品官人法重視譜牒家世這點卻成為其弊病所在，受到評定的士人若是沒有良好的家世，便很難獲得較為高階的鄉品，在其仕宦之路也會變得困難許多。當時所謂的「良好家世」並非完全是漢代以來的經學世家，更多時候指的是曹魏政權功臣新貴的家族。因此，曹魏時期的九品官人法在人才選拔的目的上雖立意良善，但在重視家世這點上淪為曹魏功臣、新貴士族的工具，導致「實質上就是保證當朝顯貴的世襲特權」。⁶⁴

如此一來，在九品官人法的保障之下，便出現了宮崎市定所說的「高官的子弟無論其才德如何，都能獲得高的鄉品，並因高品而身居高官之列。」⁶⁵之現象，如魏明帝時司空陳羣之子陳泰、太傅鍾繇之子鍾毓，皆以五品的散騎侍郎起家，在任官的出發點上已優於其他人。此外，吳慧蓮認為，由於郡中正多以中央官兼任，遂使士族子弟聚集京師，以交遊為業，互相標榜題表，博取名譽，形成魏明帝年間的浮華風氣。浮華士人的行為雖然類似漢末黨錮名士的標榜風氣，但並不具有社會批判、對抗強權的性質，純粹只是貴族子弟間高抬聲譽，以求獲得中正官青睞的手段。⁶⁶

九品官人法的制定，保障了曹魏政權的士族及功臣新貴子弟更多參

⁶² 吳慧蓮，〈九品官人法制定的原因及背景〉，〈九品官人法——六朝時期的選任制度〉，頁 29-30。

⁶³ 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91-92。

⁶⁴ 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 54。

⁶⁵ （日）宮崎市定 著，韓昇、劉建英 譯，〈緒論——從漢到唐〉，《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8。

⁶⁶ 吳慧蓮，〈九品官人法制定的原因及背景〉，〈九品官人法——六朝時期的選任制度〉，頁 35-36。

與政權的機會，也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發展新思潮、新學風。閻步克認為，九品官人法是「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的結合與制度化；在入仕管道受到保障的情況下，士族出身的名士成為知識群體的主體，可以自由發展精神文化。當時的士族名士，往往能夠主導一世之士風。⁶⁷曹魏時，何晏雖非士族，但他身為曹操養子，「長于宮省，又尚公主」，⁶⁸乃是當時皇室新貴，不必擔心仕官問題。因此以才秀知名又好《老》、《莊》的他「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⁶⁹，引領著當時的學術風氣；西晉初，琅邪王氏出身的王衍以太子舍人起家，「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⁷⁰主導一時風氣，與樂廣並稱為天下風流之首。由此可見，受到九品官人法保障入仕管道的士族及其子弟在仕宦無虞的情況下，較能夠發展其精神文化的一面，引領、主導當時的學術風氣，累積名聲。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漢晉之際的名士及其往來友人自然逐漸集中在士族階層，較少見到出身貧寒的底層人物了。

第四節 結語

本章試圖從學術風氣、人物品評圈、九品官人法三個方面探討漢晉之際名士結構轉變的原因，並認為上述三者皆對漢晉名士結構的改變有所影響。

首先，在學術風氣方面，漢晉之際的學術風氣打破了獨尊儒術的局面，從瑣碎的經學轉向了較為抽象的玄學，名士群體的主流思想也從五經轉向了三玄。然而，一般底層百姓無論是從太學或私學所學習到的仍舊是經學，並非《老》、《莊》，難以有接觸玄學思潮的機會。在仍重視

⁶⁷ 閻步克，〈察舉制與九品中正制〉，《察舉制度變遷史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頁137-142。

⁶⁸ 《三國志》，卷9，〈曹真傳附何晏傳〉，頁292。

⁶⁹ 《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下，〈文學第四〉注引荀勗《文章敘錄》，頁171。

⁷⁰ 《晉書》，卷43，〈王戎傳附從弟衍傳〉，頁1236。

經學的東漢末，爛熟五經者便有機會成為名士；然而在士風改變的魏晉時期，口吐玄言才是成為名士的要件之一。因此，在士風與學風改變的魏晉時期，較難以接觸玄學思潮的底層百姓自然無法成為名士行列的一員。

其次，在人物品評圈方面，由於東漢末的戰亂，使得鄉邑秩序受到破壞，有能力遷徙避難者多是一郡之大族，一般人則多半歿於戰爭之中。回歸鄉里的大族成為了新政權的功臣新貴，在品評、舉薦同郡人才時也多以同郡大族為對象，因此逐漸與鄉里社會脫離，其品評圈逐漸內縮、窄化，品評對象縮小為同朝士人的後進子弟，甚至形成幾個家族之間彼此互相提拔、賞譽。在此情況下，出身低微的人物難以受到上層士族品評圈的青睞，無法獲得聲名，也難以打入名士的交遊圈中。

最後，在九品官人法方面，由於曹魏時所制定的九品官人法保障了官員子弟的入仕管道，使其得以有較多的時間發展其精神文化，快速累積名聲，進而主導當時的士風、學風，成為時人所景仰的名士；而這也是入仕管道不穩定的底層平民較難以達成的情況。

事實上，上述三個方面的因素並非是單獨發生作用，而是會彼此交互影響。如受到九品官人法保障的士族子弟以玄言清談為風尚，主導了士風的轉變，而士風的轉變又會影響人物品評對象的選擇。當賞譽與評論集中於某些士族家庭時，成為當朝顯貴的士族又能受到九品官人法的保障。因此這三項因素乃是相輔相成，呈現出動態交織影響的情況。綜上所述，漢晉之際名士結構的轉變並非是單一因素所造成，而是東漢末以來政治與社會環境不斷變動之下所形成的結果；經過這些內在或外在因素不斷的影響之下，漢晉名士結構便逐漸一步一步走向了「貴族化」的趨勢。

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正文三章論述了漢晉名士自東漢末到西晉初的發展，並指出這段時期的名士群體在出身結構上的變化，最後進一步探討其轉變的可能原因。今將正文各章所得歸納為下列三點。

一、

東漢末年，以汝南、潁川士人為核心的黨錮名士陳蕃、李膺等人以天下為己任，勇於抨擊時政，對抗宦官，雙方鬥爭的結果便是兩次黨錮之禍的爆發。兩次的黨錮之禍使黨錮名士遭受沉重打擊，也讓士人對東漢朝廷失去信心；士人群體間互相標榜、賞譽的風氣也一時消沈。

曹魏時期，試圖恢復東漢末標榜風氣的浮華士人受到曹魏明帝的打壓，使得標榜風氣的再興有如曇花一現；然而到了正始年間，輔政的大將軍曹爽重新啟用浮華士人，造就了正始名士的出現。正始名士無論在人格風範、政治作為及學術著作上皆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當時何晏等人談坐論玄的「正始之音」，深深受到後代士人的懷念。然而，隨著曹魏政權逐漸為司馬氏所掌控，名士群體於是面臨著親近曹氏或依附司馬氏的抉擇。曾經攜手共遊於竹林中的嵇康、阮籍、山濤等竹林名士，面臨動盪不安的政治局勢，做出了各自的選擇，也因而走向了不同的發展與結局。

西晉中朝名士自東晉以來，一直受到後人「清談誤國」的指責，然而若對中朝名士的行為事蹟做進一步的檢視，可以發現作為時代佼佼者的他們，是在混亂的政局中以「無為而治」的方式維持著中央與地方的秩序，並且往往能受到地方百姓的懷念與愛戴。事實上，中朝名士並非

是終日清談、逃避現實的無能者，只是有鑑於自東漢末以來名士群體所受到的種種打擊，因此試圖在兩晉紛亂的時局中，尋求一條保存家族、安身立命的道路。

二、

漢晉之際的名士結構，在政治與社會的劇烈變動下，出現了很大的轉變。東漢末年，黨錮名士群體的出身結構多元且複雜，除了一般士族階層外，出身低微、貧賤者能夠以自身的德行或學行受到世人的認同與賞譽，進而成為「天下名士」的一員。此外，名士的交友圈也與其自身結構相同，並不侷限於特定階層，可見東漢末的名士群體注重的是德行、才能而非家世出身，因此其組成結構呈現出具有包容性且複雜多元的情況。

在曹魏時期，名士結構顯然出現了變化，無論是正始名士或竹林名士，其核心成員皆與曹魏皇室有關，其他成員則多半是曹魏政權的官宦子弟或上層士族。曹魏時期名士群體的交友圈也大多是官宦子弟，其父執輩為曹魏政權的功臣新貴，自身則是曹魏政權的新生代，前途看好。因此，不同於東漢末名士群體及其往來對象的多元性，曹魏時期的名士群體與友人圈多為上層士族出身，出現了「上層化」的趨勢。

西晉的名士結構則是曹魏時期「上層化」的進一步發展，出現了「貴族化」的情況。西晉中朝名士幾乎來自世代仕宦的高門貴族，已不見出身寒微平民者，來源逐漸單一化；其友人圈亦以官宦子弟居多，三代以上仕宦的家族更是不在少數。部分士族如琅邪王氏、陳留阮氏家族中名士輩出，可說是形成了「名士家族」，這些家族彼此之間互相提拔、賞譽，既提升了家族聲望，也維持了其社會地位。到了這個階段，已經是幾乎看不到出身貧寒又能身列名士之林的人物了。

三、

如上述所言，名士結構在漢晉之際出現了很大的轉變，其轉變的原因，可從思想與士風的改變、人物品評圈的內縮，以及九品官人法的保障這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首先是思想與士風的改變。東漢末的黨錮名士大多以嫻熟經學聞名，無論其學問是來自家學或太學，皆有其經學傳統。然而漢代經學發展至東漢末，已逐漸流於章句瑣碎之學，已有部分士人亟思改變；加上東漢末的戰亂打破了經學獨尊的局面，開始了士人探索新思想的熱潮。曹魏時期，正始名士與竹林名士開始偏好《老子》、《莊子》之學；西晉時的中朝名士則是在《老》、《莊》、《易》三玄上各有所好。顯然地，魏晉時期的名士已不再以經學為重，而是表現出對於玄學的喜好。高門士族舉行清談活動，「談坐」的場合成為士族子弟學習新思潮的場所，然而向平民傳授知識的太學或私學仍是以經學為主要學科，使得平民出身的知識份子無法沾染玄風。以玄學造詣作為名士揚名條件之一的魏晉時期，在非士族出身者沒有機會學習玄學的情況下，「名士」逐漸成為上層階級的所有物，難以再見到出身低微、貧寒的人物，其結構也自然走向「上層化」、「貴族化」的趨勢。

接著是人物品評圈的內縮。在東漢末，人物品評注重的是個人的德行、能力，並不受限於被評者的身份，因此如出身貧賤的黃憲、郭泰皆能受到時人的重視；同鄉士人的互相援引，也讓出身較低的賢者、有德者獲得了揚名的機會。然而隨著東漢末戰爭的劇烈化，同郡士人在品評、推舉人物時失去了可以廣泛選擇的對象，只能從有能力逃離鄉里的豪族中做選擇，造成品評圈逐漸內縮。這種「內縮的人物品評」成為曹魏政權功臣子弟獲得選用、仕進的管道；曹魏的士族、宦宦之家在人物品評時不再重視自己家鄉裡的賢才，而是聚焦於彼此家族中的後進子

弟，並且互相提攜。如此一來，人物品評在上層士族或宦宦家族中形成循環，甚至出現了「名士家族」；漢晉名士結構的「上層化」與「貴族化」，便是這種內縮的人物品評所帶來的結果。

最後是九品官人法的保障。曹魏時期九品官人法的制定，保障了上層士族與功臣新貴子弟有更多參與政權的機會，也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發展新思潮、新學風，進而主導一世之風氣，如作為曹操養子的何晏、琅邪王氏出身的王衍在其仕宦管道無虞的情況下，皆成為當時學風的引領者。如此情況下，名士群體及其友人圈逐漸集中於士族階層，幾乎難以見到出身貧寒的底層人物了。

事實上，上述造成漢晉名士結構轉變的三個因素並非是單獨發生作用，而是會交互影響，相輔相成；漢晉名士結構的轉變乃是自東漢末以來，政治與社會環境不斷變動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結果。在這些內外因素的交織影響下，漢晉之際的名士結構便一步步走向了「貴族化」的趨勢。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正史置於前，其他以朝代順序排列）

- 晉·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65。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清·畢沅校正，余翔標點，《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收錄於《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
- 晉·常璩撰，嚴茜子點校，《華陽國志》，收錄於《二十五別史》，濟南：齊魯書社，2000。
- 劉宋·劉義慶撰，蕭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儀、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11。
- 唐·虞世南著，清·孔廣陶校注，《北堂書鈔》，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
-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北平：古籍出版社，1956。

二、近人著作（依姓名筆劃多寡為序，譯著均置於後）

（一）專書

中文著作

- 孔毅，《魏晉名士》，成都：巴蜀書社，1994。
- 孔繁，《魏晉玄談》，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
- 毛禮銳、沈灌群 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二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
- 王汝濤，《琅邪王氏考信錄》，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 王葆珖，《正始玄學》，濟南：齊魯書社，1987。
- 王澍，《魏晉玄學與玄言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 王曉毅，《王弼評傳附何晏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王曉毅，《儒釋道與魏晉玄學形成》，北京：中華書局，2003。
-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何啟民，《竹林七賢研究》，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 何啟民，《魏晉思想與談風》，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7。
- 李建中、高華平，《玄學與魏晉社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 李修建，《風尚——魏晉名士的生活美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李清筠，《魏晉名士人格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
-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周滿江、吳全蘭，《玄思風流——清談名流與魏晉興亡》，濟南：濟南出版社，2002。
- 侯外廬等 著，《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柳春新，《漢末晉初之際政治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6。

-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康中乾，《魏晉玄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許抗生，《魏晉思想史》，台北：桂冠，1992。
- 陳寅恪 著，萬繩楠 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
- 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黃少英，《魏晉人物品題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
- 劉蓉，《漢魏名士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
- 蕭箏父、李錦全，《中國哲學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日）川勝義雄 著，徐谷芄、李濟滄 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日）宮崎市定 著，韓昇、劉建英 譯，《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

日文著作

- （日）渡邊義浩，《三國政權の構造と「名士」》，東京：汲古書院，2004。

（二）期刊及單篇論文

中文著作

- 仇鹿鳴，〈漢魏時代的河內司馬氏〉，收入氏著《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孔毅，〈漢晉名士價值觀念的演變〉，《齊魯學刊》，1995年第2期。
- 方立天，〈玄學的範圍、主題和分期〉，《文史哲》，1985年第4期。
- 方詩銘，〈何晏〉，收入氏著《方詩銘論三國人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王永平，〈夏侯玄之政治活動、思想表現及其與司馬氏之衝突〉，收入氏著《漢晉間社會階層升降與歷史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王永平，〈諸葛誕之活動與琅邪諸葛氏「姓族」形成之關係〉，收入氏著《漢晉間社會階層升降與歷史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王建國，〈魏晉陳留阮氏及其家學家風考論〉，《天中學刊》，19：4，2004。
- 王曉毅，〈王龔與漢末汝南名士〉，《孔孟月刊》，35：1（總409），1995。
- 王曉毅，〈正始名士夏侯玄〉，《孔孟月刊》，34：4（總400），1995。
- 王曉毅，〈正始名士雙重人格特點及其形成〉，《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
- 皮朝霞，〈曹魏高等教育的擴張與沉淪〉，《現代大學教育》，2007年第4期。
- 牟宗三，〈魏晉名士及其玄學名理〉，收入氏著《才性與玄理》，台北：學生書局，1978。
- 何啟民，〈漢晉變局中的中原士風〉，收入氏著《中古門第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78。
- 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收入氏著《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1980。
-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收入氏著《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1980。
- 余嘉錫，〈寒食散考〉，收入氏著《余嘉錫文史論集》，長沙：岳麓書社，

1997。

李旭傑、馬琳，〈曹魏教育平民化現象探析〉，《青年文學家》，2011年第24期。

邢義田，〈東漢孝廉的身份背景〉，收入氏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1。

金發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下，1963。

胡克森，〈西晉國子學建立原因初探〉，《晉陽學刊》，2003年第6期。

胡寶國，〈漢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收入氏著《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胡寶國，〈漢晉之際的汝穎名士〉，《歷史研究》，1991年第5期。

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9。

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11。

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11。

孫明君，〈漢晉士族的發展歷程〉，《文史知識》，2009年第8期。

徐高阮，〈山濤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1，1969。

馬以謹，〈漢末至南朝間「名」之內涵和標準的移轉及其與士風之關係〉，《中國中古史研究》，6，2006。

馬良懷，〈兩漢宦官考〉，收入氏著《士人 皇帝 宦官》，長沙：岳麓書社，2003。

高晨陽，〈論魏晉玄學派系之別與階段之分〉，《山東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

張谷良，〈試論山濤的政治思想與態度之起由〉，《東華人文學報》，6，

2004。

張愛波、徐傳武，〈「清談」與中朝名士〉，《理論學刊》，2007年第4期。

張蓓蓓，〈夏侯玄學行考實〉，《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3。另收入氏著《魏晉學術人物新研》，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

張蓓蓓，〈袁宏新論〉，《臺大中文學報》，14，2001。另收入氏著，《魏晉學術人物新研》，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

賀昌群，〈英雄與名士〉，收入氏著《魏晉清談思想初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黃宛峰，〈東漢潁川、汝南、南陽士人與黨議始末〉，《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4期。

黃惠賢，〈曹魏中後期散騎諸官的變化——散騎諸官研究資料之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17，2000。

楊承彬，〈魏晉教育制度研究〉，收入於楊亮功等著，《中國教育史研究》，台北：漢苑出版社，1977。

楊耀坤，〈有關司馬懿政變的幾個問題〉，《四川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萬繩楠，〈曹魏政治派別的分野及其升降〉，《歷史教學》，1964年第1期。

萬繩楠，〈論淝水戰前東晉的鎮之以靜政策〉，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台北：雲龍出版社，1994。

趙文義，〈度尚與「八廚」——試論黨錮名士的異質性〉，《史穗》，5，2012。

劉增貴，〈漢魏士人同鄉關係考論（下）〉，《大陸雜誌》，84：2，1992。

劉增貴，〈論後漢末的人物評論風氣〉，《成功大學歷史學報》，10，1983。

劉顯叔，〈論魏末政爭中的黨派分際〉，《史學彙刊》，9，1978。

- 鄭欽仁，〈九品官人法——六朝的選舉制度〉，收入於鄭欽仁 主編，《中國文化新論：立國的宏規》，台北：聯經，1982。
-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收入於《魯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 盧建榮，〈魏晉之際的變法派及其敵對者〉，《食貨》，10：7，1980。
- 錢穆，〈記魏晉玄學三宗〉，收入氏著，《莊老通辨·下卷》，台北：東大圖書，1991。
- 閻步克，〈察舉制與九品中正制〉，收入氏著《察舉制度變遷史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 （日）川合安，〈日本的六朝貴族制研究〉，收入於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 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回顧與探索——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
- （日）岡村繁 著，陸曉光 譯，〈六朝貴族文人的怯懦與虛榮——關於「清談」〉，收入於《岡村繁全集·第參卷·漢魏六朝의思想和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日）岡村繁 著，陸曉光 譯，〈後漢末期的評論風氣〉，收入於《岡村繁全集·第參卷·漢魏六朝의思想和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日）渡邊義浩，〈九品中正制度與性三品說〉，《新哲學》，8，2008。
- （日）渡邊義浩 著，王啟發 譯，〈西晉的五等爵制與貴族制的確立〉，收入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日本東方學會、武漢大學三至九世紀研究所 編，《第三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 （法）樂維（Jean Levi） 著，張立方 譯，〈官吏與神靈——六朝及唐代小說中官吏與神靈之爭〉，《法國漢學》，3，1998。

日文著作

(日) 安部聰一郎,〈清流・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中國史學》,14,2004。

(日) 安部聰一郎,〈黨錮の「名士」再考〉,《史學雜誌》,111-10,2002。

(三) 學位論文

吳慧蓮,〈九品官人法——六朝時期的選任制度〉,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

張瑀琳,〈遊與友:漢晉名士交往行動探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8。

黃偉修,〈「名士」——魏晉以前歷史上一個特殊知識階層之發展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5。

楊晏州,〈曹魏政權的結構及其滅亡原因研究〉,台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

三、表及工具書(依姓名筆劃多寡為序)

中文著作

方詩銘 編著,《中國歷史紀年表》(修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孫永都、孟昭星,《中國歷代職官知識手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張舜徽 主編,《後漢書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4。

日文著作

(日)矢野主稅 撰，《魏晉百官世系表》，長崎：長崎大學史學會，1960。

四、電子資料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